

# 吉尔·德勒兹

〔瑞典〕 芙丽达·贝克曼 著 夏开伟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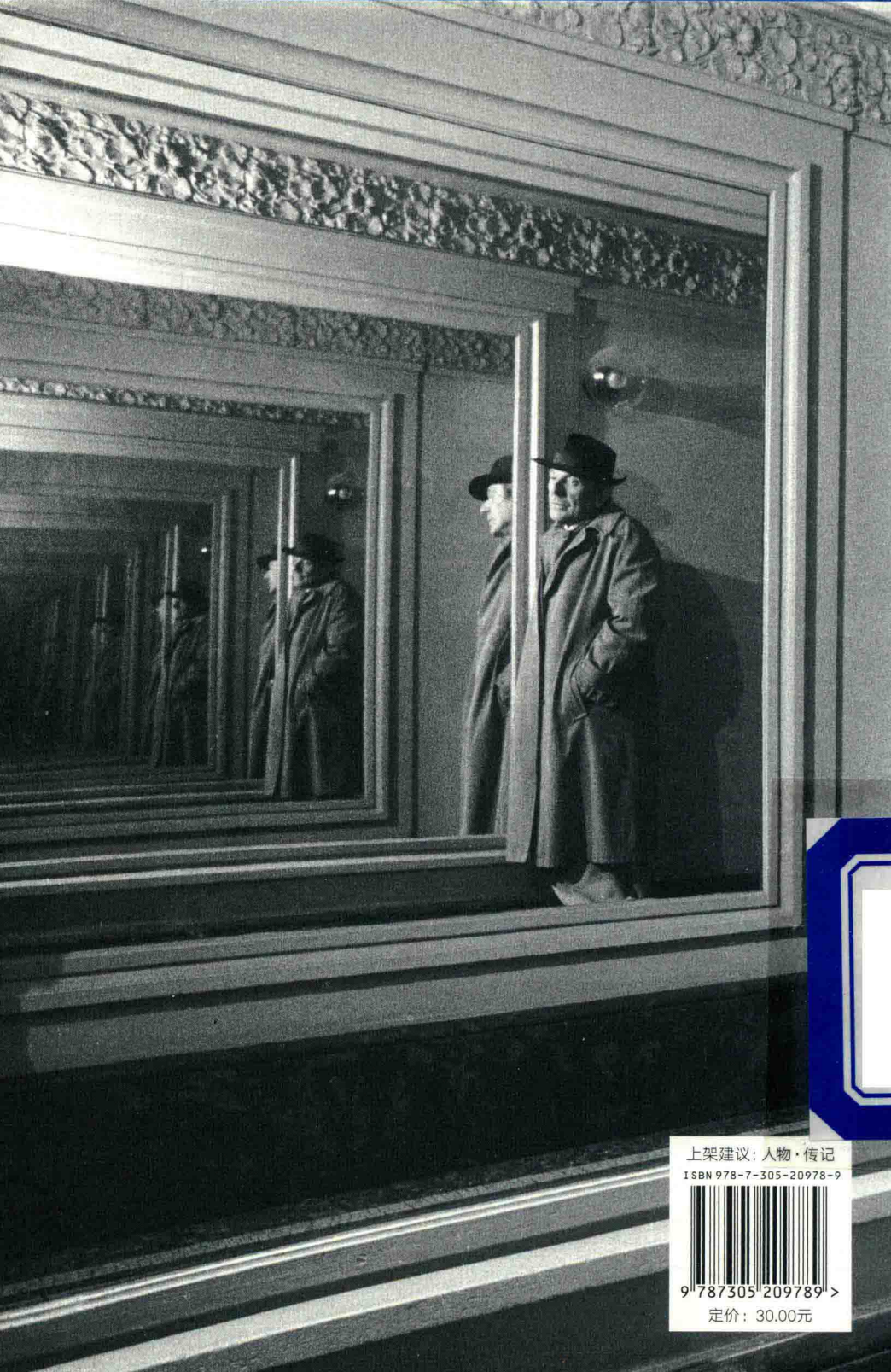
南京大学出版社

Frida Beckman

Gilles Deleuze

兼外借





上架建议：人物·传记

ISBN 978-7-305-20978-9



9 787305 209789 >

定价：30.00元



吉尔·德勒兹

〔瑞典〕芙丽达·贝克曼 著 夏开伟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Frida Beckman

Gilles Deleuz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吉尔·德勒兹 / (瑞典) 芙丽达·贝克曼著; 夏开伟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1

书名原文: Gilles Deleuze

ISBN 978-7-305-20978-9

I. ①吉… II. ①芙… ②夏… III. ①吉尔·德勒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9667 号

*Gilles Deleuze* by Frida Beckman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 2017, in the Critical Lives series.

Copyright © Frida Beckman, 2017.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7-110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吉尔·德勒兹  
著 者 (瑞典)芙丽达·贝克曼  
译 者 夏开伟  
责任编辑 付 裕 陈蕴敏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徐州绪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40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20978-9  
定 价 3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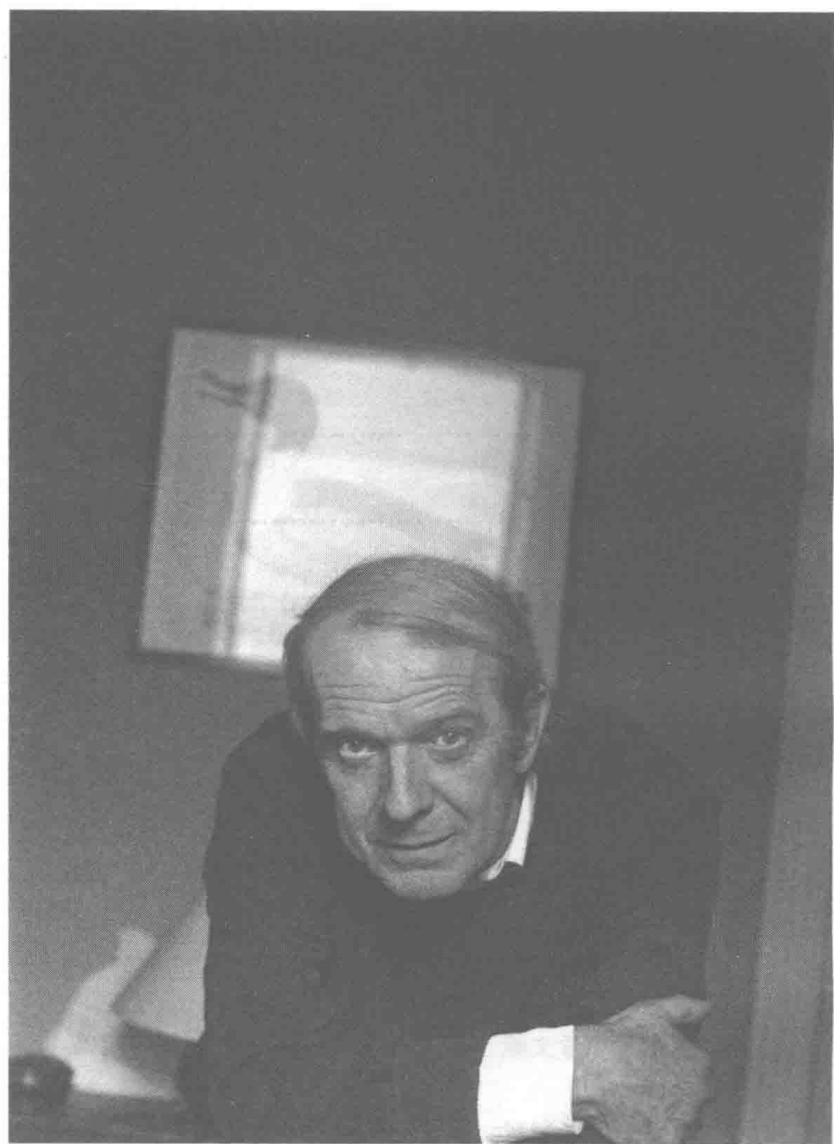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目 录

前言 .....	001
1 一个孩童 .....	010
2 一名学徒 .....	022
3 一段友谊 .....	041
4 一次实践 .....	070
5 一种生命 .....	097
结论 .....	113
参考文献 .....	127
参考书目 .....	163
鸣谢 .....	176

## 前 言

一生中总不乏笨拙的行为、易损的健康、孱弱的体质，以及构成人之魅力所在的口吃(stammering)。正如风格乃是写作之魂，魅力正是生命之源。<sup>1</sup>

一谈作者的生平，吉尔·德勒兹总要摆一副意味索然的样子。或者换个没那么极端的说法，通常而言，作者的生平多少都会映射在他们的作品里，德勒兹却认为，作家与作品之间鲜有关联。其实，对二者之间的关联不感兴趣的还大有人在。作为二十世纪最富影响力的欧陆哲学家之一，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把亚里士多德的一生总结得如同浮光掠影，轻描淡写了这位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的生平：“他出生，他思索，他逝世。”与很多哲学家一样，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家的一生不过是一些琐碎轶事。假若如此来回顾海德格尔的生平，这就不免显得有些讽刺。海德格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纳粹的关联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位哲学家的生平与其哲学的关系，不敢忽略任何细枝末节。在当时的情况下，还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尽管国际研究界详悉海德格尔与纳粹的“意气相投”，2014年出版的“黑色笔记本”



(Black Notebooks)却还是迫使他们思考:海德格尔的政治信念不仅是其个人、其事业上的污点,也是其哲学思想上的污点。鉴于这一系列笔记本皆指向了海德格尔根深蒂固的反犹思想,在哲学家的生平和著作间划界便饱受诟病。这足以让人质疑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信念,即我们在阅读柏拉图或海德格尔的作品时,是否真能做到什么都无所谓,任由“时代之风暴将他们席卷四处”。就阿伦特看来,他们的思想并非源自其所处的历史环境,而是来自某个完美的永恒居所。<sup>2</sup>

以上所关切的问题展现了,从具体生活之紊乱中抽身而出的缜密哲思,该如何在男性主导的哲学传统中继续留存。女性哲学家很少能拥有这种脱离具体生活的完美。确实,对阿伦特其人的关注,以及后世对她与海德格尔短暂私交的关注,最好地说明了人们对于女性思想家,还是更加关注其私人的具体生活。当然,也有人质疑这种对哲学家生平和作品进行区分的做法。弗里德里希·尼采曾声称他逐渐意识到“至今所有伟大的哲学,要么是其作者的私人声明,要么就是一类未被意识到的非自愿式自传”。<sup>3</sup> 雅克·德里达援引了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生平的草率描述,但他不赞同海德格尔的做法,而是对此加以否定。德里达建议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是否应该把作者的生平当作“经验性偶然事件的汇编”加以排斥。他主张哲学家的传记必须“被重新纳入考量”。在德里达看来,哲学家们的政治信念尤其重要,但更广义而言,他们的具体生活也同样重要:“哲学家为什么要将自己无性别地呈现于作品之中?他们又为何要将自己的私人生活从作品中抹去?”<sup>4</sup> 德里达并不是说作者生平与其作品之间存在直接关系,就好像前者可以用于解释后者;而是说,思考纯粹的文本是不可能的,即不存在一种毫无踪迹的文本。自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正式宣布“作者

已死”，米歇尔·福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又对此进一步阐释，此后，将作者与文本直接关联起来的情况是越来越罕见了。巴特坚信作者绝不会超前或超出写作，相反，作者诞生于文本。作者的诞生并非一次性的，而是伴随读者每次的阅读经历而诞生。因为文本从现存的诸文本中涌现而出，所谓作者也并非在表达“自己”，而是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文本汇集起来，使各种文本遭际彼此。这么看来，给予一个文本以作者就是“为文本强行设限，以一个终极所指来粉饰文本，从而终结写作”。<sup>5</sup>

对德勒兹而言，聚焦于人物生平并以编年史的方式将其记录，这份记录不仅定义了还不可避免地限定了它所表达的一切，这有悖于德勒兹对于作者生平的看法，也有悖于他整体的哲学思考。通过为个体设限并赋予其一个具体的形态和一个终极所指，创造一个被定义的个体以及一个有始有终的故事，人生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关闭”。然而，对我们而言，仅仅知道德勒兹出生、思索、逝世的事实还远远不够；我们渴望知道更多。受邀写作这本书之前，我曾试图告诫自己一些事项，其中有四点和我要写的这本书尤为相关。第一点，也是最为核心的一点，那就是德勒兹他本人所秉持的怀疑主义，他质疑将个体视为一个既定的统一体的做法。当然，我也可以勉强接受为个体写一部历史。事实上，从古至今人们一直这么做，但至少我们现在书写的这本传记不是这个类型。通常，这类传记书写都有其依托的前提，而且鲜有人觉得有必要去质疑这些前提，例如个体、身体、时间性和历史这些最为核心的概念。同样，人们对于生活的基本组成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一直暗暗怀揣着先入之见。不可否认，先入之见的确有其实用性，它们能让传记的作者和读者更加易于辨认手头的意义单元和逻辑联系。然而，我注意到，为哲学家作传还应另当别论。原因在于，当我们把

哲学等同于最有名的哲学家时，我们便趋于认同了解他们的生平与理解他们的思想之间并无关联。尽管总有人认为哲学家的生平与其思想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联，但如彼得·奥斯本(Peter Osborne)所示，我们依旧难以找到一本令人满意的传记来反思二者之间的关联。<sup>6</sup>为了做到这一点并从而为德勒兹写出一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他哲思的传记，我不能或者至少绝对不应该重拾关于个体、身体、时间性和历史的先入之见。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些观念，即捕捉一个人的一生，并将其以线性叙事的方式呈现；聚焦于“人”；认为我们可以设法按时间顺序组织、理解并“认识”生命。实行这些想法的传记书写必遭德勒兹本人的极力排斥。

第二点，也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前提，就是那本厚达 650 页的传记，它记录了德勒兹与其屡次合作者菲利克斯·瓜塔利(Félix Guattari)二人的生平。尽管弗朗索瓦·多斯(François Dosse)的这本《吉尔·德勒兹与菲利克斯·瓜塔利：交错人生》(*Gilles Deleuze et Félix Guattari: Biographie croisée*, 2007 年出版；英译本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Intersecting Lives*, 2010 年出版)存有些许争议，但对任何一位迫切想要了解德勒兹生平巨细的读者而言，他们的渴望还是能够从中得到满足。然而，多斯的那本浩繁巨制和我这本传记有诸多不同，篇幅长短并非唯一的区别，二者在方法论、目的和信念上都不尽相同。其中有两点不同之处我还需要给予特别说明，因为它们对于理解我写此书的志向和局限至关重要。显然，这两本书的相异之处首先在于：多斯的书对德勒兹和瓜塔利二人的生平都给予了关注，而我的著作只聚焦于德勒兹的生平。多斯对瓜塔利的关注在很多层面上都很重要，因为瓜塔利常常被置于德勒兹的阴影下。在批评话语中，人们提到德勒兹的时候其实往往就是在说他们二人的合著之作。这种



倾向并非仅仅限于“后德勒兹-瓜塔利”语境，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德勒兹自己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正如他在给瓜塔利的一封信中所写：“人们把你抹去，还让我变得抽象。”<sup>7</sup> 尽管这种倾向至今依旧存在，但瓜塔利本人的著作因其自身的价值近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该语境下，加利·格诺斯科(Gary Genosko)是一位核心人物。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格诺斯科就一直在努力强调和阐明瓜塔利作品的重要性。多斯的传记很好地印证了奥斯本的判断：“这是对德勒兹-瓜塔利思想第二次新兴的接受：瓜塔利思想研究；或者用哲学家埃里克·阿利耶(Eric Alliez)的话来说，这就是‘瓜塔利-德勒兹效应’。”<sup>8</sup> 换言之，对瓜塔利的关注大受欢迎。

我们两人所作传记的第二个重大差异在于，多斯的研究大部分基于访谈资料，其中既包括他自己的，也有别人的。因而，他的传记翔实地呈现了德勒兹生活中众多不同的事件，促成了一本如此繁博详尽的双人传记，并丝毫不损读者的阅读兴致。你们将会看到，我会多次提醒读者参阅多斯所写的传记，以获得德勒兹生平中各色事件的详尽描述。<sup>9</sup> 基于以上考虑，的确会有些读者选择研读多斯的版本。您现在捧在手心的这本书，囿于篇幅之限，必然无法如此关注细节；再者，这也并非撰写本书的意图。对于此书，我的愿景在于将德勒兹的生平和著作共置于一个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讨论之中，这种讨论首先便是试图消除追求此目标所招致的哲学性摇摆。<sup>10</sup>

撰写该传记的第三点问题就在于，我敏锐地意识到钻研德勒兹著作的专家不在少数，他们也都精通详悉其作品；他们肯定会注意到我遗漏的细节，可能也会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我所写的内容。基于本书的框架，我肯定无法满足所有读者的要求；我必定无法事无巨细地还原德勒兹的生活，也不能全面地展现其哲学思考。这

本“小书”肯定无法囊括德勒兹所有的概念——因为他创造的概念确实不少。相反，在这本书中，我仅将焦点汇聚于德勒兹的部分概念，即一些似乎能与德勒兹生活的方方面面建立起最富有成效的联系的概念。为成功找出德勒兹生平与其著作之间的关联，我决定先从其一个概念入手。<sup>11</sup> 这个概念就是**配置**（the assemblage [agencement]）。该概念缘起自德勒兹与瓜塔利，他们利用该概念重新思考个体（the individual）这个观念。他们二人认为，**一次陈述绝非是个体的，相反，它总是集体的。力、身体、客体和界域（territories）共同组成由欲望驱动、具有特殊功能的暂时性配置**。当组成这些力的成分加入了机器性（machinic），这些力便形成了配置。机器性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它在强调配置的非个人性（nonpersonal）与非人性（nonhuman）的同时，还揭示出配置是动态的。配置运作的动力不在于个体，而在于个体作为机件的联合。对此，德勒兹和瓜塔利解释道，配置具有双面性：“它一面是集体发声的配置；另一面则是欲望的机器配置。”<sup>12</sup> 配置这个概念排斥个体和个人这样的观点，它表明发声并不会反身指向一个主体，“而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共同体（community）应具备的功能”。<sup>13</sup>

如果我们在德勒兹的传记中勾勒出其生平和著作，以此获悉它们是何以浮现、聚集并成为具有集体性功能的配置，那么，我们便有可能描述其一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借此阐释他的哲学。德勒兹声称，我们有办法用一个名称来表示贯穿个体的力度与多样性，而不是用它来指涉自我（ego）、个人（person）抑或主体（subject）。这并不是建立在屈服之上的哲学史之去个人化（depersonalization），相反，这种去个人化建立在爱之上，承认“独特性、字词、名字、指甲、事物、动物和小事件”，这些都聚集于这个名称之下。<sup>14</sup> 通过聚焦于这一系列的力、客体、身体和界域，我们才有可能

找到起作用的配置，找到配置的时间性和驱动它的欲望，才有可能知道它们如何诞生并不断出现、环复于德勒兹的一生与其著作。这本书因此可划分为若干配置：第一部分题为“一个孩童”(A Child)，这一章主要记录德勒兹早年的生活；最后一部分题为“一种生命”(A Life)，这一章节主要写德勒兹的逝世；中间部分为三章，分别是“一名学徒”(An Apprenticeship)、“一段友谊”(A Friendship)和“一次实践”(A Practice)。这三章分别对应德勒兹著作的三个阶段：一开始，德勒兹的写作主要集中于早期的几位哲学家；随后，他开始与人合著，其中，瓜塔利就是他主要的合著伙伴；在最后一个阶段，德勒兹的创作主要专注于艺术和电影。我有意把每一章的标题都写成单数形式。其作用是强调每一部分所勾勒出的德勒兹的私人生活和学术生涯都是一个更大的背景中的奇点。

我的最后一丝忧虑就在于，我于此所作出的关于他人一生的诸多断言。对于德勒兹的一生，我的了解远谈不上完整，而且这些了解还全都源自一些二手资料。德勒兹的一生为其家人和朋友所珍视，他们必定知晓更多本书未能记载的内容。因此，我想强调，这部批评性传记并非基于对德勒兹亲朋好友的采访，其目的也不在于对其一生刨根问底，而是致力于在德勒兹的生平和作品之间建立一些成功的对话。不可否认，为德勒兹写这么一本传记其本身就有点“变味”，整本书所囊括的方方面面都与德勒兹的哲学观念相悖——用巴特的话来说，我的写作是在试图“封闭”(close)；倘若用德勒兹自己的话来说，我则是在“捕获”(capture)。这可能恰恰是引起我写作兴趣的原因。我将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所说的对“嬉戏空间”(room for play)的寻找视作一次挑战。只有当我们试图去理解一位思想家的时候，这种空间才会显



露。这并非要与其“思想要义相吻合”，而是要“将这位思想家引向另一条小径，并在那里消解他的声音”，以此来创造德勒兹所力求的语言中的异邦语言 (foreign-language-within-a-language)<sup>15</sup>。艾丽诺·考夫曼 (Eleanor Kaufman) 认为与德勒兹同行本身就是一次“精心的背道”，受此启发，我试图使这嬉戏空间成为可能。考夫曼指出，走进德勒兹的著作还有另外一条离经叛道却又屡试不爽的途径，那就是：老实地读他的文本，矢志不渝地运用他的概念，不过这却在根本上背离了他的哲学<sup>16</sup>。德勒兹认为，紧随他人无异于把创造、遭际和生成拒之门外，这三者是人生与哲学的要义所在。因此，这部批评性传记指出，德勒兹的思想并非来自某个完美的永恒居所，最为理想的应该是去关注德勒兹生平与其作品中的那些创造、遭际和生成。德勒兹是非常具体的存在，而其具体化又十分艰辛，一次又一次地不断诞生于其文本、遭际和友谊之中。这



德勒兹：创造、遭际、生成。于突尼斯豪迈特苏格 (Houmt Souk) 的涂鸦肖像画。

便是我著书的愿景——我并不打算将这本书写成一本生平纪年或是“一个终极能指”以完结写作；我希望能绘制一张地图，上面标记了德勒兹一生的遭际。如此按图索“迹”，我们方能一览其人，一窥其思。

## 一个孩童

依靠总角岁月进行文学创作通常就将文学写成了细微的私人琐事，这十分令人厌恶……也纯属胡说八道……因此，作者的任务并非去挖掘家族史……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成为一个孩童，以孩童的身份去感触世界，并让世界重归孩提时代。这才是文学的任务。<sup>1</sup>

人们通常认为，吉尔·德勒兹平淡无奇地过完了一生。1925年1月18日，他出生于巴黎的第七区。除去青年时的一段岁月，他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在这里度过。德勒兹的父亲是一位保守的右翼工程师，名叫路易·德勒兹；其母亲奥黛特·加玛穆尔(Odette Camaüer)则是一名家庭主妇。德勒兹说，他母亲无法和工人阶层共享诺曼底的海滩，他回忆起母亲曾把工人阶层称为“那种人”。<sup>2</sup>直到十四岁，德勒兹都一直在打网球，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他就不打了。1940年战火燃及法国，而当时德勒兹一家正在诺曼底度假。德勒兹正值十五岁，他的父母决定将他与哥哥乔治留在诺曼底。兄弟俩最后在那里的廉租屋寄宿，还读了一年书。他可能是觉得这段往事有些不堪回首，但也有可能是觉得这段经历

不值一提，总之，德勒兹并不觉得他的童年有什么值得谈论的。

为了解这一点以便开始认识德勒兹，我们也许要质问一下“不堪回首”和“不值一提”之间的张力关系。毕竟，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意义非凡。在多斯所作的传记中，他发现德勒兹之所以抗拒其童年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德勒兹的双亲都是资产阶级。他们右倾又没教养，这很难让他找到归属感。事实上，与德勒兹的朋友和哲学同侪相比，他本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并算不上政治积极分子，但其父母的保守主义和反动思想铸就了他今后哲学的隐性（有时候甚至是显性）的批评目标。其二，德勒兹成长于其兄长之死的阴影之下。乔治在战争期间参与抵抗运动时为德军所俘，在前往集中营的路上便不幸逝世。乔治因此成为受人崇拜的英雄，与之相比，吉尔则暗淡无光。尽管德勒兹随后对此表示释怀，但他曾有一次向作家兼好友的米歇尔·图尼埃（Michel Tournier）坦言，他永远都无法原谅自己父母的这次叛离。多斯因此注意到这位不在场的兄长在德勒兹童年的塑形中意义非凡。<sup>3</sup>的确，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孩子不仅失去了他的兄长，而且还要在其阴影下感受相形见绌，这也难怪他将自己的童年视为“不堪回首”的往事。但是，倘若要将这段童年谎称作“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性质又完全不同了。那德勒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里强调的并非“童年”这个概念本身，而是一个人“自己”的童年。在德勒兹的哲学中，孩童大体象征着一种建构功能。它反复出现，遍布于德勒兹的写作之中，并具有不同的功效。值得注意的是，其功效也并不一定全都是纯粹积极的。<sup>4</sup>一个孩童既是脆弱的，同时又孤立无助，但德勒兹经常提到的还是孩童的这个层面：孩童还未完全被纳入稳定（或者说克分子）的结构。对德勒兹而言，克分子结构便是生成的对立面，正如其结构所示，它具有清晰

明了的边界。<sup>5</sup>相反,在德勒兹的哲学中,生成是一个核心概念。他利用这个概念将关注的焦点从存在转移到生成。倘若存在是一个固定点以开始或结束,生成则是整个生命的过程。德勒兹并未将存在看作生成这个过程所瞄准的靶子,而是将生成自身强调为所有生命的基本状态。这么一来,重心就落在了一个不断流动变化的世界里的临时组织之上。这种持续的变化和差异在孩童的形象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但成人世界很快便用**克分子结构**对本质上实验性的身体、性征与主体进行超编码(overcode)。因此,孩童的形象蕴涵将成年的固化结构解域化(或扰乱)的潜能。**解域化**(deteritorialization)对德勒兹而言是个十分重要的术语,在其与瓜塔利的合著之中尤为重要。**它是对界域化(即更加固化)的身体、空间或关系的解放,以展示它们视作自身固有特征的差异。**故而,孩童自身就具有一种生产性的功能,该功能有助于我们认识生命不受个人情感影响和具有创造力的侧面。

一位重构童年记忆或事件的作家或传记作家,都有可能在克分子还未结构之前投射出一种克分子逻辑。因此,具有实验性的事物被夺走并被驯服成非实验性的东西。我们目之所及,毫无生成可言。故而,写作不應該是一件个体的私事,也不是回归一个人自己的童年。**对德勒兹而言,这样的写作使生活残缺不全,是对生活的一种贬低和辱没。**相反,写作应该是一种生成——**“随便成为什么,但就是不要成为作者”**。<sup>6</sup>为了让这种生成成为可能,你的写作必须让你走出神经官能症(neurosis),而不是深陷其中。这么一来,**你可能想要写一段童年往事,但这绝不是你自己的童年。通过将写作转化为一种生成-孩童的过程,**具有实验性的东西重新回归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为实验和生成创造了空间。这似乎意味着将自身排除在那个决定身份的结构之外,而非将自己写入其中。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审视多斯对德勒兹拒斥童年和家庭性的解释,这种家庭性直接联系着德勒兹的童年和他的家庭经历(也是其哲学的一个方面,我们稍后会于第三章进一步阐释)。对其童年和家庭进行过于直接的私人描述不仅会限制我们了解德勒兹生活的可能,从更广的层面上来说,也限制了我们对其同时代机制的了解。如果我们因为德勒兹自己有过一段艰苦的童年,而选择从这一角度去看待他对于家庭因素的批判,我们则陷入一种盲目之中。这是因为在更大的层面上,我们忽视了社会、政治和哲学层面对于童年和家庭的建构。我们也未能看到很多其他可组成童年的机器配置。我们并不需要进一步研究,仅仅看看德勒兹的首要灵感源泉——年轻的文学教授皮埃尔·哈布瓦赫(Pierre Halbwachs)——便会知晓,将理解停留在家庭层面还远远不够。

在《吉尔·德勒兹入门》(克莱尔·帕尔内于1988年至1989年之间拍摄的电视采访系列节目)中,德勒兹讲述道:在来到诺曼底之前,他还一直都是一个百无聊赖的年轻小伙,学习成绩也不拔尖。但在这段时间内,他从其日常生活中跳脱出来,还遇见了哈布瓦赫(因为其健康欠佳而免于服役参战),这成了德勒兹求知欲的起点,并从此影响了他的一生。<sup>7</sup>哈布瓦赫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兼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之子,其父为盖世太保所捕并毙于布臣瓦尔德(Buchenwald)。我们可以于此为之后爆发的事情做些铺垫:战争、友谊、疾病、健康和文学之间的联系在德勒兹生命的早期就已初现端倪。当我们依然驻足于德勒兹与其挚友漫步过的诺曼底沙丘之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最初点燃其思想火花的是文学,而不是哲学。虽然德勒兹显然谈不上是一位文学学者,但其哲学思考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文学的影响,并且,他对文学的旁征与其对哲学的博引并驾齐驱。<sup>8</sup>德勒兹处理文学尤为

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并非将文学文本视作生命的表象，而是将其看作生命的积极方面，对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在第四章再回头细说。他在诺曼底和哈布瓦赫的交谈助其形成了一种哲学，在这种哲学中，文学与生命如胶似漆。顺便提一句，在诺曼底时，德勒兹和哈布瓦赫交流得十分热切，这不免让操心过重的房东太太设法提醒德勒兹与其双亲：哈布瓦赫可能有恋童癖。

然而，没过多久，德勒兹对哲学的痴迷胜过了他对文学的迷恋。休战后，德勒兹离开了诺曼底，回到巴黎。即使高中头几年他还一直处于占领区的阴影之下，但他还是深受朋友与老师的启发，在他们的帮助下，德勒兹发现了哲学，还为之兴致勃勃，这都为其未来的事业奠定了基础。在德勒兹的描述中，一位名叫维阿勒(Vialle)的先生开设的哲学课开启了其哲学生涯。在他的课上，德勒兹立刻爱上了哲学，并将其视作毕生的挚爱：“当我获悉竟然有那类被称作‘概念’的奇怪事物存在，它对我的影响就如同其他人邂逅一本瑰丽的小说，其中的角色深深影响着他们。”如果哈布瓦赫是德勒兹早期灵感的一个源头，那么，维阿勒先生无疑成了其灵感的另外一个源头。德勒兹津津有味地回忆他们是如何一起走路上学、回家，他们一路上话语不停。“哈布瓦赫带领我浅尝了文学之所是，然而，自我上过第一堂哲学课后，我便已然知晓，这正是我以后要做的事。”<sup>9</sup>尽管这次哲学的入门对德勒兹而言意义非凡，但有趣的是，德勒兹是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维阿勒班上的；与此同时，在卡诺高中(Lycée Carnot)教授另一门哲学课的正是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这不禁使人好奇，倘若德勒兹经由梅洛-庞蒂之手接触哲学，这位年轻人的未来又会有何不同。

从德勒兹高中的最后一年到其随后于索邦大学(the

Sorbonne)的哲学学习,有三个核心因素影响了他早期的学术生涯。第一个因素便是睿智,德勒兹的睿智得到了其身边人的一致认可,在他们看来,他十分出类拔萃。他的好友图尼埃声称,将德勒兹领进哲学也有他的几分功劳,因为是他将德勒兹带入了他的哲学课堂,德勒兹很快便徜徉其间。图尼埃回忆说,在课堂上,他与同学漫不经心地辩论,彼此间的论据就像“棉花或橡胶球”一样扔来掷去。一旦德勒兹参与辩论,他一张嘴就好似向他们砸来了“铁铸钢造的炮弹”。图尼埃写道:“我们很快就开始对他的天赋发怵,因为但凡德勒兹从我们的话语中抓住了一个破绽,他便会以此来暴露我们的平庸、愚蠢和溃思。”<sup>10</sup>尽管图尼埃将德勒兹描绘成一个令人敬畏角色,但他还是告诉了我们,德勒兹是如何成为这群青年学生的灵感之源:

如果一个人从未知晓一种狂热的需求——要钻研得更深,要思考得更系统,要开发心智至臻,如果一个人从未体验过一种对绝对的痴狂热恋,那么,我恐怕要说,这个人将永远无法明白思考到底意味着什么。<sup>11</sup>

通过图尼埃(后来也受到了其老师莫里斯·德·冈蒂亚克[Maurice de Gandillac]之邀),德勒兹才有机会参加玛丽-玛格德琳·戴维(Marie-Magdelein Davy)在巴黎外郊庄园举办的聚会,正是在这里,戴维女士举办了大量文化和政治色彩浓郁的活动。当时的德勒兹还在上高中,但在这里,他有幸接触到了当时赫赫有名的作家和哲学家,包括皮埃尔·克罗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让·波朗(Jean Palhan)、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在这种环境中，年轻的德勒兹身上所体现的第二个特征便是自信与无畏。他似乎不大在意学科的水平体系，也不在乎哲学传统。在多斯的描述中，德勒兹总是抓住任何机会与老师和教授们谈论哲学，即使他当时还不过为一名高中生，他似乎可以自如地与年长他二十岁的克罗索斯基谈论尼采。<sup>12</sup> 德勒兹的同学、他随后终生的挚友弗朗索瓦·沙特莱(François Châtelet)回忆起另一个场景，即当着一位严肃又严谨的哲学史老师的面，德勒兹如何被要求去完成一次文本阐释，如何大胆而又精彩地将其陈述得让这位老师从愠怒到惊叹，最终佩服得五体投地。<sup>13</sup>

第三个特征似乎在德勒兹早年就已初现端倪，那就是他决心要重塑思考的雄心。对于哲学史禁锢而非鼓励独立思考的方式，德勒兹早就不耐烦了。其次，他还认为，索邦大学的环境也过于幽闭，令人惶恐不安。“我属于一代人，”他说道，“也是最后几代人之一，我们或多或少都被哲学史的乱棒殴打至死。”<sup>14</sup> 但即使作为一个学生，德勒兹显然绝对不会让他自己被传统扼杀。据图尼埃回忆，德勒兹有着令人惊叹的重组之力，这让“教学大纲上所有陈腐的哲学经由他之手都焕然一新并萌发勃勃生机，它们的新生是如此的鲜嫩、难以消化还泛着些苦涩，以至于我们这群意志薄弱的懒骨头都落得仓皇失措，根本无福消受。”<sup>15</sup> 只有那些熟知其作品是如何成功的人才能见证德勒兹如何在这条令人稍感不安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他并未让自己惨遭“乱棒殴打至死”，相反，他挣脱了传统的束缚，在哲学的实践中收获了一份乐趣。其同辈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后来评论德勒兹时说道：“我所能给予他最大的称赞便是：哲学思考给他带来了真正的快乐和极大的安宁。”<sup>16</sup>

在德勒兹早年的生活中，我们亦能找到一些证据证明有一人和一些东西曾影响过他。尽管德勒兹随后会和那个男人划清界

限,宽泛点说,他试图将自己抽离现象学(phenomenology),青年德勒兹明显受到了萨特的影响和启发。在令人窒息的传统之中,萨特作品的出现不仅让年轻的德勒兹如醍醐灌顶,其同时代的其他人也大多如沐春风。对于图尼埃和德勒兹那批学生而言,萨特的《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的出版如同一颗流星划破天际:“亲眼见证一种哲学的诞生,我们真是三生有幸。”<sup>17</sup>正如我们所见,德勒兹一直渴望拥有超越传统的思考,而现在,萨特做到了。萨特1964年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德勒兹满怀敬意地写道:“除了萨特,还有谁能说出点新意?”<sup>18</sup>对于萨特《苍蝇》(*The Flies*, 1943)的首次演出、《存在与虚无》(1943)的出版和《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于1945年在现今俱乐部(Club Maintenant)的发表,德勒兹将它们描述成“事件:通过它们,我们于众多漫漫长夜中学习思想与生命的身份”。<sup>19</sup>事实也的确如此,二十岁的德勒兹在1945年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萨特思想的大杂烩,名为《描述女人:性化他者之哲学》(“Description of Woman: For a Philosophy of the Sexed Other”)。<sup>20</sup>

德勒兹要求在编纂他的官方作品索引时将其早期作品除名,而它们也因此直至近期才开始受人瞩目。克里斯蒂安·克斯莱克(Christian Kerslake)认为,如果萨特在当时的名声如日中天,“德勒兹便是在其文化和时代所关切的事物之外,于一些黑暗的场所探测瓠穴”。<sup>21</sup>其文化和时代光芒之外的瓠穴就包括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关于直觉和记忆的著作,这些随后成为德勒兹著作的核心特征,但德勒兹探测过的其他瓠穴则依旧不知所踪。克斯莱克提到了荣格主义(Jungiansim)、约翰·马尔法蒂·冯·蒙特里奇奥(Johann Malfatti von Monteregio)与约瑟夫·玛利亚·胡



恩-沃伦斯基(Józef Maria Hoëne-Wronski)的秘教和路德维奇·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对于精神分裂、巫术和药物试验的研究。以上的所有人与主题都与德勒兹的研究有关,它们让德勒兹的研究更加接近一种无意识理论,而这些方面恰恰又弥补了为弗洛伊德理论所排除的部分。<sup>22</sup>约书亚·雷米(Joshua Ramey)认为德勒兹的这些兴趣极有可能都来自戴维夫人的沙龙。戴维夫人自己就是一个“狂热的唯灵论者”,此外,她所举办的这些聚会也不乏大量秘教使徒与玄虚术士。<sup>23</sup>在德勒兹二十出头的时候,他很可能是受戴维夫人之邀为马尔法蒂著作的法译本作了序言。作为十九世纪影响深远的魔术师,马尔法蒂仙逝之后,其著作也随即黯淡。可是,这篇序言连同其他文章都成了德勒兹日后要求移除的作品。<sup>24</sup>该作品于1946年被法国一家名叫黄金格里芬(Griffon d'Or)的小出版社发表,从文章中可知,当时的德勒兹为马尔法蒂的“马特席斯”(mathesis)所吸引,该观念将个人与宇宙间的关系视作不可分割。

在德勒兹的著作中,马尔法蒂的名字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故而,这不禁让人将这篇早期的文章视为“懵懂少年对神秘学说的轻浮兴趣”。即使大量在早期影响过德勒兹的人和理论都无名无姓,但克斯莱克却注意到了这些神秘的主题始终反复贯穿德勒兹的写作。<sup>25</sup>注意到这些影响德勒兹思考的因素,便可解释与说明其后期著作中的诸多问题。雷米说道<sup>26</sup>,在研究德勒兹后期关于内在性(immanence)的理论时,将其早年学习到的秘术知识纳入考量,便能探索到更多细微之处;此外,通过了解德勒兹早年关于马尔法蒂和秘教的写作,德勒兹与瓜塔利在《千高原》(法语版:*Mille plateaux*,1980年;英语版:*A Thousand Plateaus*,1987年)中提到的巫术和暗中复兴的秘教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sup>27</sup>同理,如果我们将

荣格也放入阅读德勒兹的公式之中,那么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法语版:*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1968年;英语版:*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1994年)中讨论的无意识之意义则更显丰富。<sup>28</sup>假若我们深入了解荣格的理论如何影响了德勒兹的思想,这一切也许会变得有意思,例如知道荣格是如何影响德勒兹早期关于受虐狂的文章,以及在其影响下,他和瓜塔利是如何于后期著作中将性征和欲望从精神分析的吊钩中卸下。<sup>29</sup>

回顾德勒兹的青少年岁月,从其孩提时代到哲学入门,我们务必要谨慎,不要过于简单地在其童年事件、早期影响和写作之间画上等号。德勒兹关于记忆的设想受到柏格森著作的深远影响,德勒兹的这一观点提醒我们,在面对一种更为丰富和多层次的存在之时,不要建构一种个体、线性的历史,也不要固执于一种肤浅而又有限的因果关系。在《电影》(*Cinema*)两卷本中的一卷里,德勒兹写道:“记忆不在我们之内;而是我们自己辗转于一种存在-记忆(being-memory)之中,一种世界-记忆(world-memory)之中。”<sup>30</sup>可能记忆看上去像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我的童年、青少年、成年等时期也的确是一个接着另一个依次出现”——但是,过去的确又是“一种概略;往事种种,均可一齐绽放”。此处,他又援引意大利电影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来证明自己的论点:“费里尼所言正表明了他是个柏格森主义者,‘我们于记忆中被建构,我们同时处于童年、青少年、老年和成熟期’。”<sup>31</sup>对德勒兹而言,时间并非是按线性编织的;过去的存在如同白纸,如同圆环,邂逅现在,不断膨胀,不断收缩。于此时之中,在感知或记忆差异结构中的诸多重复时,我们的主体性恰好在这个过程中被生产出来。依德勒兹之见,我们也将看到,并不存在同一性之重复,但记忆的功能便是帮助我们建构一种连续感。故而,记忆包含允诺的能力,

同时又具备限制的功能。记忆就是一种先行条件，它可以允诺我们一种自我感，但又有可能封闭我们生成的潜能。这种可能性取决于我们是否将历史看作一种绝对的纪年体叙事，不论它是我们个人的过去，还是宏观层面上的历史。凡是如此，我们的主体性便囿于一条线性的轨道，于此，我们毫无逃逸的可能：“我曾有那般的童年，故而我现在应有这般境地。”倘若我们从另一端出发将过去视为非线性的白纸，将其当作圆环，记忆和主体性便得到敞开，朝向相异且特异的轨道。只有忘记记忆之时（因为我们自以为了解它们），我们方能从规划界域的结构内逃逸而出。你的童年并非你的童年；你是世界之子。一个人的目标便是“成为一个属于自己诸多事件的孩童”。<sup>32</sup>

如果我在导言章节曾问过我们应当如何“了解”德勒兹，那么，我觉得在这一章我有必要再次发问，我们应当如何富有成效地将其“忘记”。这种忘记并非一种否定，这绝非像鲍德里亚先前所宣称的那样去忘记福柯。相反，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理解德勒兹的一生和著作的过程中，相当重要的一环就在于：如果我们尝试就事论事地去锚定德勒兹的生平和著作，那么，我们仅仅只是将它们窄窄地框定起来，于其中，我们还是一无所知。<sup>33</sup>诚然，读罢此书，我们便会发现，德勒兹自己的众多著作也都围绕于要将这类理解拔去。这是一种能动的忘却，尼采在《道德的谱系》（*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1887）中对此有所勾勒，毫无疑问，德勒兹对此也并不陌生，通过为现在和新鲜的事物腾出空间，它形成了一种“积极的压抑能力”（positive faculty of repression），并为其带来了最佳状态。能动的忘却是一剂灵药，它消解了通过因果之链条将未来捆绑在过去和现在之中的同一性。<sup>34</sup>通过“学徒”“友谊”和“实践”来隐匿并展露思考，方能让德勒兹忘却他自己，这也为思考创造了空间。这

个空间并没有因纪年 and 个人的记忆之围而遭受界域化,相反,它肯定了记忆处于主体性之惯性重复所带来的强力结构之外。

最后,一种德勒兹式孩童的概念要求我们颠覆弗洛伊德的理论。无意识并非技巧精湛的精神分析所能牵引出来的受压抑的记忆和幻想;相反,它产生于现在。“无意识是一种可制造的物质,它流动着,它是一片社会和政治的空地,有待征服。”同理,童年的记忆并非复制品,恰好相反,它是此时此刻生成-孩童的一部分,它是可用于建构繁多配置的一种原始材料。<sup>35</sup>我们再次于此听到了尼采的余音,正如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 1883-1891)中所谈及的孩童一样,这个孩童能做骆驼和狮子所不能为之事:这个孩童给予忘却,同时给出一个新的起点以肯定作为真实创造物的生活。<sup>36</sup>继而,我们可做出最初步的结论:孩童(或者说一个孩童)对德勒兹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但对他来说重要的绝不是他自己的童年,而是“世界的童年”。德勒兹最终同意他就是一个孩童。这个不定冠词于此尤为关键。正如德勒兹所言,它拥有“超乎寻常的丰富性”,此外,从某种程度而言,德勒兹的批判性传记就应该是这个不定冠词的传记。它始于一个孩童。

## 一名学徒

在我看来,我当时处理它的主要方式是将哲学史视作某种鸡奸行为(buggery)或者(与前者无异)完美无瑕的概念。我设想自己从背后与一位作者交合并给予他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可能是其后裔,但却长相可怖。<sup>1</sup>

在顺利通过了1948年的高中教师招聘会考(agrégation)后,德勒兹结束了他的大学学习生涯,从此获得了执教资格<sup>2</sup>,德勒兹的未来有着各种不同的选择可能。杰赛普·比安科(Giuseppe Bianco)指出,德勒兹本来可以如其同侪米歇尔·福柯那样在社会人文科学中谋得一职,或如吉尔伯特·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那样研究认识论,或者如雅克·德里达与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那样在现象学中谋求发展。事实上,与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弗朗索瓦·沙特莱一样,德勒兹选择专注于哲学史。<sup>3</sup>在该阶段(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比安科注意到哲学史学家正在质疑他们于机构内的角色,同时也在怀疑他们整个学科的认识论状态。比安科列出了一些原因来解释为什么这些哲学家会感到有必要重新探讨他们学科的功能与边界,其



中包括德国历史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不管怎么说，德勒兹对哲学的原创性贡献至少部分始于这些张力。他对哲学史的深刻兴趣伴有一种欲望，这种欲望要将思考从以哲学家本人作为这段历史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sup>4</sup>

正如我们于上一章节所见，很早以前德勒兹便已轻蔑传统，而这种态度既有益又笃定：“哲学史，”他说道，“在哲学中明显扮演着一个压抑性的角色。”<sup>5</sup>这是个“令人生畏的威吓学派，生产着思考的专家——但同时也让那些在野者更加向他们所鄙夷的研究方向俯首称臣。被称作哲学的思想图像依历史而成形，实际上，它使人们思考停滞”。<sup>6</sup>然而，即使德勒兹就哲学史说出了这番令人无法原有的话，这些言论也不能说明他和当时哲学史学家的私交。德勒兹十分尊敬索邦大学的哲学家，同时也为他们所仰慕，其中包括马提尔·格罗 (Martial Gueroult)、费迪南德·阿尔吉耶 (Ferdinand Alquié)、莫里斯·德·冈蒂亚克和让·沃尔，德勒兹终生与他们维持着友谊。正如阿兰·D.史利福特所示，尽管德勒兹现在看起来似乎十分现代，但与此同时，他也与其同时期最为学术主流的一些哲学家惺惺相惜，注意到这一点十分关键。德勒兹看似严酷的言辞也没有出现在其最终写出来的关于哲学史的著作之中，正如史利福特所说，他的这些著作中充满了肯定和宽宏大量的意味。<sup>7</sup>事实上，德勒兹怀着一种热切的希望：倘若他所写的这些哲学家有可能阅读他的著作，他们应当感受到欣悦。

如果德勒兹对哲学史的犀利言辞并非他私人关系的反映，那么它们也不会反映任何一种对哲学史的抗拒或回避。他前期的著作围绕一批早期哲学家的著作展开。德勒兹于1953年出版的第一本书，讨论的便是大卫·休谟 (David Hume)——《经验主义与主体性》(法语版: *Empirisme et subjectivité*; 英语版: *Empiricism*

and Subjectivity)——此后,他的著作分别讨论了尼采、伊曼努尔·康德、柏格森和巴鲁赫·斯宾诺莎(后期则有米歇尔·福柯和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sup>8</sup>这一系列关于早期哲学家的出版物就是德勒兹前期著作的特征,德勒兹说是要打破预先设定的思考轨迹,并将此视为贯穿其一生的核心,而他前期所作之书又似乎与这一信条相悖。多斯也指出,德勒兹在这个时期研究的哲学家的名字大部分正好也在大学所教授的课程之列,这一事实又进一步突显了这一悖论。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作为德勒兹首篇博士论文的导师于1946年至1947年教授的课程是休谟,1947年至1948年的主题是康德,1948年至1949年间讲授的则是柏格森;阿尔吉耶作为德勒兹关于斯宾诺莎小论文的导师,在1958年至1958年期间教授的课程正是斯宾诺莎;还有沃尔,他对于德勒兹的影响丝毫未减,在1958年至1961年期间,他教授的课程正是尼采。<sup>9</sup>此外,史利福特注意到德勒兹最终研究的大多数哲学家(例如柏格森、康德、斯宾诺莎、尼采、休谟和斯多葛学派)都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哲学学科高中教师招聘会考的阅读书单之列,而此时的德勒兹正在索邦大学求学。<sup>10</sup>这个阅读书单影响重大,它给那些为了通过考试、取得教书资格的学生规定了必读书目。不仅如此,它也关系到这个领域的大学课程应该教授哪些哲学家。因此就整个法语语境而言,它在这个领域内还是具有非凡的意义。<sup>11</sup>德勒兹一度将对这些已然着手研究的哲学家的关注描述为一种开端。德勒兹暗示道,就像梵高或高更一样,在你能够进而自己画风景画之前,总是要花上好长一段时间来画肖像画。正如他们一样,你有可能需要很久才敢使用更加强烈的色彩。这不仅是一种技艺的训练,也是一种“从容不迫的谦逊”。<sup>12</sup>

然而德勒兹在按照要求的模式掌握哲学史的同时,他最终还

是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将其讲述。即使是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所做的既不是一种注经(exegesis)也不是一种应用。相反，德勒兹的目标是通过哲学家的思考，与其一起思考，并与他们的思考进行碰撞，从而在与他们的遭际中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尽管他的著作一开始看上去似乎有着一种“相当令人迷惑的折中主义”色彩，但事实上，我们还是可以从德勒兹对哲学传统的处理中分辨出他的两套策略。<sup>13</sup>首先，他所关注的作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反抗着历史上的理性主义传统。故而丹尼尔·W.史密斯就注意到，德勒兹决定以研究休谟作为他出版的第一本书，这件事本身就火药味十足。在一个日渐为现象学所支配的时代，为经验主义作书恰好证明了“他思想的异端倾向”。<sup>14</sup>其他哲学家(例如斯宾诺莎和尼采)也成了德勒兹发展他自己哲学的中心，原因在于他们有对强调内在状态(interiority)的批判，而内在状态正是当代大多思潮的特色。德勒兹的第二套策略则是将哲学史处理为“一种鸡奸行为”。这种构想的伊始我们在本章开头的引言中便可看到，考虑到前人，这种说法似乎有悖于谦逊的理念，德勒兹继续说道：“这个孩子要是他亲生的，这点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作家实际上不得不说我让他说的全部。但这个孩子必定还是可怖的，因为这个孩子源自各种各样的转换、滑落、错位和暗中省略。”<sup>15</sup>

该策略也许听起来十分挑衅——确实有好些人将德勒兹关于其他作者的著作视作一种离经叛道。<sup>16</sup>另外一些人则将其看作一种货真价实的创新。例如塞尔就认为，德勒兹对传统哲学史的脱离就为“一种自由而又富有新意的思想的动态运动做出了一次精彩绝伦的示范”。<sup>17</sup>先不论它是如何被理解的，但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在处理哲学史的问题上，德勒兹的研究方法的确是另辟蹊径。他绝不赞同对事物的简单化书写和“反思”，因为这种观点将哲学

置于一种被动状态和一种无法进行运动的非创造性模式。“我们实际上应该做的事情是阻止哲学家停留在事物上反思。哲学家只创造，不反思。”<sup>18</sup>在阅读德勒兹前期著作时，牢记这一点十分关键。它们不应被视为用于描述和解释一个哲学家或哲学的书籍，相反，它们必须被视为一种“共同思考”——这个计划旨在通过这些哲学家拾起前人的思想，并与其一同发声。史利福特在谈到德勒兹关于尼采的书时说道，这本书的“标题并不是《尼采的哲学》(Nietzsche's Philosophy)而是《尼采‘与’哲学》(Nietzsche 'and' Philosophy)”。这本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对尼采的阐释，而且还为德勒兹提供了一些思想要素，以便他日后将其发展成他自己的哲学。<sup>19</sup>换个说法，那就是要以一种“在此之间”(in between)的方式思考。对德勒兹而言，思考的发生如同一个事件，对此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寄望将它归因于一个单独的中心点。正是游牧主义(nomadism)和生成、“捕获和偷窃、政权空白(interregnums)”使之成为可能。<sup>20</sup>换言之，当我们放弃独自思考的野心之时，真正的思考才刚刚开始。随后讲到德勒兹与他的友谊时，我们便会对此一目了然。在真正的创造或思考发生之际，“你总是在团队里工作，即使此时你似乎是在独自耕耘”。<sup>21</sup>

这个可怖的孩子便是德勒兹的哲学，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并未将德勒兹或他所写的哲学家视作交流中彼此独立且泾渭分明的主体，相反，它挣扎着登场，而这一切只有在惯性思考断裂之际，通过转换和滑落才得以发生。这便是德勒兹的策略(我们会在结论章节对此进一步阐述)，德勒兹绝不会自己这么做，但却建议那些试图写他的人在自己的地位更加巩固之后如法炮制。该方法随后得到了进一步说明——德勒兹借用福柯的话来描述他为福柯作书的过程：“我曾想找到福柯的替身，就其所言：‘一种重复，另一



层,同一的回归,紧握一些其他的东⻄,一种无法理解的相异,一次别离和不可避免的撕裂。”<sup>22</sup>我们于此明白了什么?如果我们接触过德勒兹的哲学著作,那么,我们也应该明白:差异的中心就是重复的结果。诚然,德勒兹主要的著作《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是德勒兹于1969年为申请国家博士学位(doctorat d'État)所作的主论文(这本论文与其副论文《斯宾诺莎与表达问题》[英文版出版于1990年]同时出版于1968年<sup>23</sup>),正如其标题所示,它关注的焦点便是这在此之间的关系。

然而,德勒兹对于差异的兴趣在于其自身,即差异并不依赖同一性(identity)与对立性(contradiction),而且他的兴趣早在写博士论文之前就已出现。在其早期研究中,德勒兹就已进行过对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探索。比安科注意到,这都是受到了他老师伊波利特的影响,与此同时,德勒兹也在不断质疑他老师对黑格尔的笃信。相反,德勒兹所提倡的是柏格森,他认为后者的理论是差异,这一点不可否认。<sup>24</sup>德勒兹于1954年在柏格森之友协会所做的演讲就已勾勒出了他对柏格森理论的支持,两年后这篇演讲便以《关于柏格森的差异概念》(“La Conception de la différence chez Bergson”)为题出版。<sup>25</sup>德勒兹所谓的“反黑格尔主义”(anti-Hegelianism)成为他重新思考差异与重复的关键起点,而差异与重复对于德勒兹的本体论概念至关重要,贯穿其今后的著作。它形成了一种坚决的抵抗,它抵制处于至高无上状态的同一性不仅将否定性置于其对立面,还将差异当作仅依据该种综合就能断定的结果。在这种构造中,同样也在大多数哲学史中,差异和重复都隶属于“表象政权”(regime of representation)之下的同一性。德勒兹的计划正是要从这种桎梏中解放差异与重复,原因在于,他不仅认为这在一个现代世界中是不对的——这个现代世界的特征是要为



同一性、单调性(sameness)和先验真理的信仰松绑,此外,他还发现它阻碍了真正的思考。“只要差异随表象的必要条件而定,那么它于其自身就不是也不能被思考。”<sup>26</sup>然而,从表象的“同一性之暴政”中解放出来的差异就不能依靠其与同一性的关系来理解,而应于其自身来理解其自身。与此同时,重复的运动被揭露以生成差异,而这差异远非重复所预期产生的单一性。换言之,差异与重复的运动并非为某种先验原则所准备的,相反,它们出现于内在性之中。内在性是德勒兹哲学中一个关键的定义性概念,它出现于一种没有先验的本体论概念之中,也就是说,没有意义、真理、主体或上帝这类高高在上的决定性存在。德勒兹反而看到那些或多或少稳定的形式——德勒兹和瓜塔利将其称作“层”(strata)——是如何出现于差异或混沌的根本之流(fundamental flow)中。这些层并非在本质上与它们的环境有何迥异,它们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因为在它们之内,差异之流减缓了。一些层要比另一些层更为稳定,但它们在根本上还是依据差异的还原来定义的。在差异与重复的持续嬉戏中,后者胜出。这便是我们理解同一性的方式。

我们日常生活的特点便是表象与同一性的“常识”——我们需要“说我的习惯”(the habit of saying I)以便日常生活得以继续进行。但这种习惯之中也潜伏着一种危险:当我们依赖它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地看、创造或思考。从哲学上来说,这种常识让思考继续困于预先决定的固定路线之中。从政治上来说,后果不仅十分危险,还有可能是灾难性的。正如我们面对机构和政治体系的质询都难辞其咎,它们泯灭差异,决定了哪些特质可以返还给我们以便形成我们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创造性活动总免不了政治的意味,因为它挑战了习惯性构成。然而,该活动所遭遇的问题(但这也是它潜力的一部分)是它“与信息 and 交流的回路不大相容,这

些早已形成的回路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妥协”。<sup>27</sup> 无论以何种方式——哲学、艺术、写作或电影，创造性活动所做的是去肯定另一种重复。这种重复认可并肯定潜藏在所有存在之下的差异（尽管这种存在并非是真的存在，而是一种生成）。这是一种更加混沌和更具创造力的重复，它不会回归单一性，而是通过肯定差异以打破习惯。该重复便是一种挑战，它引发思考、产生创造力并形成生成。德勒兹之所以发现艺术与文学对其思考如此关键，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怀有打破习惯的潜质——它们让我们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来观看、思考并感受，尽管它们当然也依赖于习惯，如大多数主流文化那样。“每一种艺术，”他写道，“都有其相互关联的技艺或重复，它们关键又革命性的威力能达到巅峰，并引领我们走出可悲的习惯之重复，从而走向深刻的记忆之重复。”<sup>28</sup> 这种习惯的中断之发生就在于哲学与艺术“在此之间”的合作，它于更广的范畴上作为一种对德勒兹策略的重要解释，即他自己和哲学先辈“在此之间”的合作（如此所示），同时还有他与好友们之间的合作。

只要铭记这种差异的哲学，我们在阅读德勒兹的前期著作时便可重新认识到其“共同思考”策略的重要性，从而将其进行修订，并扩展运用至其整个著作之中。即使他后来从未再公开并系统地通过思考其他哲学家写书，即使这与他前期的作风截然不同（其中也不乏例外，例如1986年他又写了福柯，1988年写了莱布尼兹），但其一生继续与思想家们一同研究，或者说“在此之间”他继续进行着研究。其中当然包括他与瓜塔利的合作，还有他与帕尔内的对话，但我们同样也得注意到，在封面上只有他自己的名字的书里，德勒兹一直以来都在通过他人写作，他一度将之称为“调解人”（mediators）。他坚信倘若没有这些东西，创造和真正的思考就不可能：“他们可以是人，”他暗示道，“但也有可能是物，甚至都有可

能是植物或动物”，其次，“不论他们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是有生命的或是无生命的，你都必须去形成你自己的调解人”，因为没有他们，你哪儿也去不了——“你已迷失”。<sup>29</sup>



范妮与德勒兹房子四周的花园，位于利穆赞区的圣-莱奥纳尔-德-诺布拉。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德勒兹才找到自己的调解人，激发他思考的这群哲学家方才完全显现。德勒兹的第一本专著讨论的是休谟，自它出版之后，德勒兹花了近十年，才于1962年出版他的第二本专著——《尼采与哲学》（英文版1983年出版）。德勒兹将这段时期描述为他的潜伏期，但这并非一段贫乏的岁月。一方面，德勒兹将它描述成他人人生中的一个洞、一系列“强直性晕厥(catalepsies)或者是一种长达数年的梦游”，但另一方面，他还表示，也许正是处于这些洞和豁口之中，运动才真正得以发生。也许你并不是通过逃

跑而是通过保持原地不动越过了以头撞墙的阶段。<sup>30</sup>但是,假若要从某些角度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到六十年代视作一成不变,稍换个角度来看,情况又并非如此。1956年,德勒兹遇到了丹妮斯·保罗·格朗卓安(Denise Paul Grandjouan)——爱称为“范妮”(Fanny)——并与其结发夫妻,厮守终生。他们于1960年有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朱利安(Julien),随后1964年有了第二个孩子艾米丽(Émilie)。与范妮在一起的时候,德勒兹还在利穆赞区(Limousin)的圣-莱奥纳尔-德-诺布拉(Saint-Léonard-de-Noblat)买下了一套住宅,这栋房子和这个地方后来对德勒兹而言意义非凡,每年夏天他都会携家人在这里住上数月。

这些是德勒兹私人生活中的大事,而且还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思考。据德勒兹描述,范妮的点子“总是从背后捕获我,它们来自远方的另一个方向,我们因而彼此交织得越来越不可分离,如同两盏灯投射出的信号”。<sup>31</sup>我想于此处稍作停留,好让大家注意德勒兹的这句话——从背后接近某人——于何种程度上是在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描述异性恋的婚姻。德勒兹不止一次被怀疑有同性恋倾向,他自己也毫不犹豫地以这种方式来描述他与早期哲学家(无一例外皆为男性)的遭际。如果我们对此感到十分奇异的话,当德勒兹再次欣然地以同样的方式来描述他与妻子的邂逅之时,我们似乎应该感到更加奇特。范妮作为D.H.劳伦斯的法译者,她在各个方面都影响着德勒兹的思考。《尼采与圣保罗,劳伦斯与帕特莫斯的约翰》(“Nietzsche and Saint Paul, Lawrence and John of Patmos”)作为D.H.劳伦斯小说《启示录》(*Apocalypse*, 1978)的前言首次发表时,范妮被冠为合著者,不过文章再版时她的名字就消失了。<sup>32</sup>德勒兹反复提及她时,不仅将其称作一位贤内助,而且还将她称为自己的共同思考者:“范妮觉得……”“据范妮的观点……”



“向范妮表示崇高的敬意……”。<sup>33</sup>

在德勒兹与瓜塔利的写作交流中，范妮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经常充当他们俩之间的调解人。他们的往来书信和共同进行的写作通常都经由她之手，她同时也积极地参与对他们的评论。在瓜塔利的日记和信件中，我们不难发现范妮对他与德勒兹二人共同写作的影响，同时也能发现范妮对瓜塔利自己思考的冲击：

毫无疑问，她同样也被卷入了这整个事件。我并不打算卷土重来，我为一股自恋式的虚无所吞噬：一切都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如同研究个人性格的汤药…桌子上躺着金斯伯格的书，她曾说道，自金斯伯格之后，很难再找到一种表达模式，她似乎就是在向我暗示这点。<sup>34</sup>

德勒兹的确会称赞范妮，因为她让他认识到“拾起”这个核心概念，它恰好描述了一种通过他人思考并与他人共同思考的程序。这就是“双重盗窃，非平行的发展”，“它不在两个人之间发生，它发生于想法之间，其中每一个想法都在另一个想法内被解域，跟随着一根或几根既不在此也不在彼的线”。<sup>35</sup>

当大多数人(包括他自己)都在质疑资产阶级的结构和家庭传统之时，德勒兹被要求定义他看似“传统”的家庭生活，他承认“非-俄狄浦斯之爱(Non-oedipal love)并非易事”，但他同时说道，避免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简单地“不去结婚、不要小孩、去做同志或去加入这个或那个团体”。对抗俄狄浦斯情结的唯一方法便是“自我对抗，在自己身上实验，将自己向爱与欲敞开”。<sup>36</sup>他与范妮还有瓜塔利之间的动力机制显然十分具有生产性，但却远非这么简单。瓜塔利的日记内容就表明，瓜塔利对德勒兹和范妮都怀有爱与欲，



同时他也挣扎着让自己远离俄狄浦斯的铭文(Oedipal inscription)。<sup>37</sup>我们要稍后再返回爱与欲的概念,但我们现在便可注意到,范妮就是德勒兹“共同思考”的协作者:“和菲利克斯,和范妮,和你,和全部我们所谈及的人物,还和我”。她出现,伴着他人一同出现,“如同流水中众多被扭曲的图像”。<sup>38</sup>

只要看看那些随后收录于《荒岛与其他文本,1953—1974》(法文版2002年出版,英文版2003年出版)的文章、散文和评论,我们便可知晓,在这些年里,德勒兹并非完全脱离学术圈。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便在阅读和钻研尼采的文本。史利福特指出,尼采自1958年就已经出现在哲学课程高中教师招聘会考的阅读书单之列,这是尼采首次在法国被专业哲学家选中。《道德的谱系学》于1958年至1959年被纳入这份阅读书单,当时德勒兹开始在索邦大学任教,他在1958年秋季教授的便是这本书。史利福特认为这也许能解释这本书在《尼采与哲学》中的核心地位。<sup>39</sup>在这十年的尾声,沃尔的尼采专题课程也帮助了德勒兹准备他1962年的专著。在这十年的末尾阶段,他还完成了前文所提到的关于柏格森的论文(1956年),并于1957年将他所写成的文本编辑成册。<sup>40</sup>在这段时间,他在不同的高中和大学都曾担任过教职,其中就包括亚眠(Amiens)、奥尔良(Orléans)和巴黎路易大帝中学(Louis-le-Grand high school in Paris);自1957年起,德勒兹就成了索邦大学备受重视的助理教授。德勒兹发现教书成了他生命尤为重要的一部分,他也因此在准备课程上花费了大把的时间。后期德勒兹的病情越演越烈,他察觉准备上课花费的精力比它所带来的要多得多,他最终欣然放弃教学。尽管如此,当了三十多年大学教授的德勒兹还是认为,教学是一件充满灵感和意义非凡的工作。据多斯所采访到的学生回忆,德勒兹每周三下午的课程总是人满为患,来听课的

人多到站到了教室外的走廊里,为了让他们能听见,教室的门总是开着。对于如此一个名声显赫的机构而言,德勒兹还是个十分年轻的教授,不过大家都认为他上着使人着迷的专题研讨班,“事无巨细,一一作答”,还总是将矛盾与多个方向的东西意想不到地结合在一起。<sup>41</sup> 阿兰·巴迪欧当时也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一名学生,他随后也成了德勒兹在万塞纳巴黎第八大学(Université Paris-viii at Vincennes)的同事。巴迪欧回忆起他所听闻的关于德勒兹“精彩绝伦的课程”的传言,还总是伴着他“令人大为惊叹的肉体存在”,这些教学“从休谟到《新爱洛伊丝》(La Nouvelle Héloïse),总是独树一帜,与别处所宣讲的一切都不相同”。<sup>42</sup>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前些年里,德勒兹在法国科学研究中心(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谋得一研究任务。这是他教学的一个间歇期,德勒兹开始阅读他教学之外的哲学与文学,并于1961年发表了关于利奥波德·冯·萨克-莫索克(Leopold von Sacher-Masoch)的第一篇研究,《从萨克-莫索克到性受虐》。此后,他于1962年发表了《尼采与哲学》,那为人所假想的颗粒无收之魔咒已然结束。随即于1963年,他出版了一本关于康德的书,1966年又写了柏格森,1967年继续出版了关于萨克-莫索克的研究,1968年出版了关于斯宾诺莎的著作。倘若我们将德勒兹这个时期集中的授课和前期的写作结合起来看,德勒兹生命中的这一部分便形成了一条轨迹,沿着这条轨迹,他成长为一个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一个思考者。假若我们通读过德勒兹的早期作品,那么,当我们再阅读他的晚期作品时,我们会感到更加轻车熟路。迈克尔·哈特指出,德勒兹于这段时期所做的“地下研究”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它异于其大多数同时代哲学家所选择的

道路。也许正如哈特所示,在这段形成期内,德勒兹所铸造的正是“诸多截然不同的道路,它们处于法国公众文化热议的焦点和老生常谈之外”,这“使得他随后的出场携有强烈的冲击力”。<sup>43</sup>德勒兹在某些方面并没有与当时的知识竞技场保持同步,在这里,有些人投身黑格尔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有的人则着迷于胡塞尔与现象学,还有人便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语言学和接下来即将展开的解构运动。然而德勒兹却钻入了一段哲学史,这在当时一点都不时髦。与此同时,德勒兹的出现决不能被理解成一种哲学家-身份的调用,而应该被理解成一次哲学家-生成的伊始。我们能在其作品中找到多少个德勒兹,维罗妮卡·伯根(Véronique Bergen)指出德勒兹的哲学“可以衍射出多个意义,这就好像存在多个力一齐在掌控它一样”。<sup>44</sup>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到七十年代早期,各种新的思潮相互交锋。德勒兹于1957年至1960年一直在索邦大学执教;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由于在为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工作,德勒兹

年至1969年期间,德勒兹  
 ,之后于1969年的早些时  
 文答辩。此时,毫无疑问,  
 用来解释为什么大家普遍  
 的时候,也觉得相当尴尬。  
 ,这份尴尬的原因之一可

可能是当时德勒兹的名声比答辩委员会成员还大。然而,这种解释并非完全在理,德勒兹在解释这份尴尬的缘起时,将其归根于委员会就特殊时期答辩的安全性所产生的焦虑。德勒兹是68年五月风暴事件(the May '68 events)平息后第一批参加博士答辩的人,而委员会则担心又会有学生团体来搅乱答辩。德勒兹回忆道,光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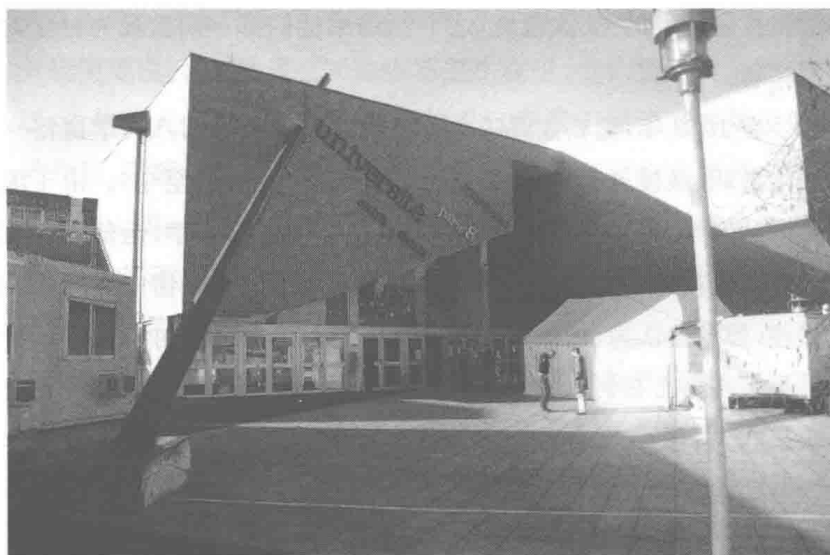
为了找到一个最为安全的地点来举办答辩就费了好大力气，他还开玩笑地说，当时委员会对他倒不怎么在乎，他们就死死地盯着门看，生怕有人会要破门而入。<sup>45</sup>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当时剑拔弩张的气氛，还颇觉有趣。在他于1968年5月7日写给克莱芒·罗塞（Clément Rosset）的一封信中，他提到他很想巴黎见到他的老师们，但他还不忘略带讽刺地补充了一个前提：“（如果他们当时还没有被吃掉）”。<sup>46</sup>

事实上，德勒兹十分倾向学生骚动。他曾公开支持抗议的学生，并在那数月的动荡中多次出席学生活动。经常有人看到他在街上和学生们混在一起，此外，他还通过以前一位学生的帮助，参与占领了一间电台播音室。他的导师莫里斯·德·冈蒂亚克有一次到访德勒兹家时意外地发现了他的孩子们（朱利安和艾米丽）将红旗和海报悬挂在阳台外面。<sup>47</sup>然而，与瓜塔利和许多他同时代的人相比，德勒兹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分子，与他大多数朋友不同，德勒兹从未加入过法国共产主义团体。他解释说，这并不是因为他缺乏同情心（自1945年起，他曾被界定为“左派人士”），而是因为他缺乏时间，他个人不是很愿意接触团体，也不太想和陌生人说话；除此以外，他对于这个团体所奉行的一些政策还保有摇摆不定的态度，他无法完全相信他们。他认为与其花时间到处收集签名去情愿，人们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去完成他们的博士论文，这样的效率要高得多。对德勒兹而言，作为一位“左派人士”只是理解层面的事情。这只涉及“理解一种见识”并认识到生成只有通过少数团体才能发生。革命最终都注定要失败或变质。期望获得不同结局也只能是妄想。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鼓励他们；并非我们不应该在一个无法容忍的世界中肯定一种生成-革命。<sup>48</sup>德勒兹认为1968年的五月风暴正是他所肯定的那类事件，他被瓜塔利推入随

后发生的动乱的“文火慢炖”之中<sup>49</sup>，结果他们都一同被视为时代的开拓者。

在1969年，德勒兹终于在万塞纳试行的巴黎第八大学谋得一终生教职(该校自1980年搬迁至圣丹尼斯，并延续至今)。由于渴望回到巴黎，德勒兹试图再次将自己引介回索邦大学，但却发现在那儿简直是一场灾难。在他写给克罗索斯基的一封信中有做相关描述，德勒兹认为，在那里的经历就如同一个自以为讨喜的好孩子结果发现自己在讨人嫌。“这太打击我的自信了。”<sup>50</sup>最后，还是巴黎第八大学更加适合他。尽管这个大学刚刚起步(它一开始是作为万塞纳实验大学中心[Centre universitaire expérimental de Vincennes]，从1971年开始，它才演化为一所正式的大学)，但福柯已经接受其邀请，并于此成立了哲学系；德勒兹就是首批应福柯之邀前来任教的人之一。最终，该哲学系的成员不仅包括德勒兹，还汇聚了当时许多重要的思想家，例如：沙特莱、利奥塔、塞尔和雅克·拉康，其中还不乏一些即将大放异彩的思想家，例如：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阿兰·巴迪欧、艾蒂安·巴里巴(Étienne Balibar)和朗西埃。巴黎第八大学的诞生是1968年政治与思想动乱的直接成果，其成立的目的显而易见，它正是对学生呼吁现代化大学和更多思想自由的应答。德勒兹以前在里昂工作时不怎么快活；而现在的环境恰好顺从了他的秉性，学生们多元的教育和族裔背景以及他们广泛的兴趣与能力，都让德勒兹振奋不已。<sup>51</sup>这也标志了德勒兹人生的一个新开端，为他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高产期。在巴黎第八大学，德勒兹每周都举办研讨班，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他1987年退休。由于这些研讨班广受好评，参与的学生都必须来得很早才能保证自己有位子，其中，休·汤姆林森(Hugh Tomlinson)和芭芭拉·哈贝詹姆(Barbara Habberjam)就提到，那间举办研讨





圣丹尼斯的巴黎第八大学。

班的小教室总是烟雾缭绕，课堂讨论的跨度非常大，“从斯宾诺莎到现代音乐，从中国炼金术到鸟鸣，从语言学到聚众斗殴”。<sup>52</sup>

尽管这满是活力和智力角逐的环境十分适合德勒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所执教的哲学系却为几次内斗弄得鸡犬不宁。学校罢工罢课有他们系部参与支持，与其他系部闹矛盾的也有他们系部的身影，决定不再给一些兼职老师续合同的还是他们系，这些都被视为十分具有争议的政变，而其目的不过为摆脱一些多余的因素，但这也在哲学系内部划开了巨大了裂口，还抹黑了自己的声誉。该系部教职工的实践不仅富有实验性，还打破了一切传统和规矩，这也不免将他们自身置于政府的严苛批评之下。德勒兹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涉足这些重要事件和矛盾冲突。巴迪欧将这个时期命名为“红色岁月”，德勒兹在这段时光中的位置颇有争议。像巴迪欧这样的毛主义者(Maoists)将德勒兹和他所创造的“无

政府-欲望者”(anarcho-desirers)视为“这场‘运动’内部格外危险的敌人”。<sup>53</sup>巴迪欧回忆道,他曾“依仗着这个时代最为粗暴的语言”向德勒兹开火,他还曾写过暴怒的文章,甚至一度招来“一班人马”上德勒兹的课堂捣乱。德勒兹之所以遭受攻击,主要是因为他对政治和群众运动之间的关系另有看法。巴迪欧回忆道,面对这些攻击和冒犯,他从头到尾都是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像极了一位慈爱的父亲。唯独有一次,德勒兹曾进行过反击,那是因为他认为巴迪欧参与了一个想要为政治目的占领系部的团体。在这段不安宁的岁月里,德勒兹与其挚友兼同侪沙特莱一同创立了“哲学理工学院”(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Philosophy),沙特莱在福柯离任前往法兰西学院任职后接手并成为这个系部的主席。这个学院创立的初衷在于鼓励学生待在系部,并激励他们完成某一文科专业的学习以获得学位,进而再向他们颁授一个将受未来雇主认可的文



德勒兹在万塞纳的一场研讨会。

凭。<sup>54</sup> 尽管这个学院的运行很成功，德勒兹的好友兼同事勒内·舍雷(Réne Schérer)却在一次采访中暗示：德勒兹无疑高估了学生们的创造潜能。<sup>55</sup> 这是一个暗流涌动的时代，换言之，在一个激荡的空地里，人们却都渴望以焕然一新的方式去思考，各种挑战也都从这种活力中迸发而出。

冲突并非全部的主题。在这个时期内，德勒兹或是初步与同时代的同事和哲学家们建立联系，或是不断加强他们之间已有的联系；德勒兹在随后的整个七十年代里被卷入了政治风云，而其中很多同侪都成了他的政治盟友。在巴黎第八大学的时候，德勒兹与沙特莱关系密切，而福柯(他们已相识了一段时间)也成了德勒兹这段时期投身激进主义的重要伙伴。在这段时期里，德勒兹与其著作和利奥塔与他所写的力比多经济(libidinal economies)有着许多共通之处。尤为重要的是，德勒兹与瓜塔利充满生产力的友谊也始于1969年。1972年，他们出版了二人首部重要的合著作品——《反俄狄浦斯》(法文版：*L'Anti-Œdipe*；英文版：*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1977年出版)，随后于1980年，二人又出版了第二卷《千高原》。这本书的两卷本被视作对于1968年政治事件的整合与表达。不久我们就将看到，友谊与政治正是德勒兹随后几十年众多成果丰硕的遭际的一部分。

## 一段友谊

我窃走了菲利克斯，我也希望他对我如法炮制。<sup>1</sup>

德勒兹对于友谊的理解十分丰富，这一点也反映在他一生所发展的众多迥异的友谊之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其中部分，例如青年时期与哈布瓦赫的交往对他有着塑形的意义，与此同时，与图尼埃的漫长友谊也意义非凡。其他同时代的人（如巴迪欧）则见证了一段“非友谊”（nonfriendship），就他和巴迪欧来说，他们在哲学和政治见解上有着的一长串令人忧心的分歧，尽管如此，这也让他们通信长达数年。<sup>2</sup>对于德勒兹的思考模式而言，与好友交流反思观点是十分重要的，无论其好友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与他们一同思考正是他进行思考的轴心。因此，我们便可理解，他和当代法国哲学家兼作家的克莱芒·罗塞是如何保持了长达数十年的通信。他们之间的交流催生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中期对于哲学新形式之求索，除此之外，他们对尼采的共同兴趣让他们激动不已，他们的交流还激发了八十年代关于“叠歌”（the refrain）概念的设想。据这些信件透露，德勒兹对罗塞的思想火花表现得兴奋不已——在其中的一封信里，德勒兹提出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其中还不乏他近乎不

耐烦地请求回复：“如果你有时间，你是否能在此处给予我进一步的引导？”<sup>3</sup>《信件与其他文本》作为德勒兹的信件集，出版于2015年。这册合集展示了他如何进行信件交流，如何同其他哲学家、诗人、编辑、政治知识分子和学生进行交流，其中就包括阿兰·文森(Alain Vinson)、沙特莱、让·皮尔(Jean Piel)、克罗索斯基、福柯、格拉森·卢卡(Gherasim Luca)、阿诺·维拉尼(Arnaud Villani)、约瑟夫·伊曼努尔·沃弗雷(Joseph Emmanuel Voeffray)、伊莱亚斯·桑巴尔(Elias Sanbar)、让-克雷·马丁(Jean-Clet Martin)、安德烈·伯诺尔德(André Bernold)，当然还有瓜塔利。

德勒兹理解中的友谊并非“一种平常而又理想化的关系，它很难以一个简洁的定义来概括”——前提是有可能做出这般简洁定义。<sup>4</sup>在一本旨在从多方面来解读德勒兹与友谊的书中，查尔斯·J. 斯蒂瓦尔概要性地指出，友谊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德勒兹的著作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友谊关乎的就是教学法(pedagogy)，此外，它还关乎着思考、遭际、滑稽可笑的事物、非人的东西、对话性、爱与距离、愉悦与实验。<sup>5</sup>在《入门》中，德勒兹说，友谊关乎的就是感知(perception)。他还用魅力这个概念来描述友谊本有的吸引力——一种非人的魅力，这魅力是一种嗡嗡声，其中有强度、情动(affects)、情绪(moods)和感觉(sensations)。在我们花时间对一个人形成具体的想法和观点之前，我们可能理解一个手势、一次伊始和一次觉醒，它们都驶向感知的根源。他向帕尔内解释道，这便组成了一段友谊。一位好友的魅力也含有几分疯狂：“倘若你无法捕获某人身上疯狂所留下的细微踪迹，你们便无缘成为挚友。”<sup>6</sup>如果我们打算开始试图去寻找，有什么可以汇聚齐德勒兹对友谊的丰富理解与实践，那么这一定是那些振动(vibrations)——那嗡嗡的噪声是富有创造力的；它创造爱，它创造思考，它还创造写作。



但对德勒兹而言，友谊也必须是摩擦，必须是同步的失败。正如他在呼吁一种对哲学的批判，一种对于友谊的批判也有其必要性。就某种程度而言，哲学与友谊都倾向于依赖一种相互的友好关系——一种传统的交流，一种对可能的依赖。这样的哲学和这样的友谊对于“阴暗的地带一无所知，但于其间，作用于我们思想的强效之力与强迫我们去思考的决心都经此孕育而生”。<sup>7</sup>为了抵达真正的思考，一段哲学的友谊需要肯定其阴暗地带。表面差异所导致的摩擦与随之而来的火花，造就了创造性的嗡嗡噪声。这里需要愉悦，也需要一种生产性的怀疑。正如德勒兹给迪奥尼斯·马斯克洛(Dionys Mascolo)的一封信里所言(斯蒂瓦尔注意到，只要谈及德勒兹友谊观的发展，他就离不开这位好友的影响)：“一个人可能行为过激，因而对一位好友处处提防，而这一切行为本质上则将‘焦虑’和友谊共置于思想之中。”<sup>8</sup>在他的思想中，这份焦虑似乎从消极的东西发展成了积极的东西。虽然早期的德勒兹声称友谊不过为一些虚假的交流和误解——“我们于一位挚友身上徒劳寻觅而无获的东西，唯有艺术才能给予”——但斯蒂瓦尔却注意到了另一个德勒兹，通过与瓜塔利的合作，他似乎已经发现，拥有朋友对于思考十分必要。<sup>9</sup>忧虑之所以变得重要，是因为它抵制着思考与存在的沉积作用。真正的友谊并非两个个体处于一段已然确立的相互关系之中，而是将二者从彼此自身中抽离出来。“窃走菲利克斯”与期待着他被再次偷回(正如本章伊始的引语所示)意味着一种立场，该立场坚持德勒兹与瓜塔利的著作并不是两位作者共同思考与写作的结果，而是“两人之间”(between the two)协作的产物。

倘若要更好地理解“两人之间”对德勒兹意味着什么，并理解它是如何贯穿德勒兹的哲学和个人生活的(如果对德勒兹而言这

二者真的可以分开的话),我们就必须理解褶子(the fold)这个概念。褶子,德勒兹将这个概念和巴洛克与莱布尼兹的哲学相联系,并于《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一书中进行了深入探讨(法文版出版于1988年,英文版出版于1993年)。褶子,在本质上从内部和外部的概念中逸走。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弯曲、折叠、扭曲,于其中很难区分出内部的结束和外部的开始。与之类似,德勒兹将褶子视为重新思考自我观念的一种方式,这个自我以某种方式独立存在于其环境之外。褶子表明主体何以不用超越其环境;它并不先于看法、思想抑或情动而存在,但通过它们,它可以临时被创造出来:“一个主体,要么是进入看法的东西,要么就是看法之内的东西。”<sup>10</sup>按这种方式产生的并不是一个主体,而是一种个体化(individuation)效果。按照个体化来思考就意味着承认看、思、感都无法被归结于一个个体式主体;它们只有通过遭际才会出现,也只有遭际才能产生此类效果。通过褶子和个体化这类概念,我们便可得知友谊对德勒兹而言在各个层面上都是何等重要。此话不假,友谊被理解成一种协力生成,它是哲学的一个先决条件。德勒兹和瓜塔利都强调这一点,他们强调的方式便是通过回溯,将友谊与古希腊人相联系。希腊人“强迫”朋友进入一种关系之中,这是一种介于两个竞争实体间的非友好型社交关系。这位朋友,“出现于哲学之中,他不再是一个外在的人格面具,也不再是一个事例或实证境遇;他成为一种在场,他的在场是内在于思想之中的,是一种思想自身的可能性条件”。<sup>11</sup>

德勒兹与其好友关于哲学的众多信件与交流映照出了一个关于友谊的概念,即友谊是哲学的一个条件。其中,他与瓜塔利的友谊尤为突出,这份友谊散发出带有特殊强度的光芒。有人询问道,是否存在过一个正在成形的德勒兹-瓜塔利-福柯-利奥塔-克罗索

斯基块茎(rhizome),德勒兹回应道,这样一个块茎可能发生,但它没有发生:“只存在一个处于菲利克斯与我之间的块茎。”<sup>12</sup> 德勒兹与瓜塔利之间的友谊始于1969年的信件交流。尽管是瓜塔利把德勒兹找出来的,但他们俩之间的合作却首先由德勒兹提出。他们最初的交流似乎始于一种相互的好奇。在早期的交流中,德勒兹俨然已经对瓜塔利著作中的关键要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例如精神分裂和横截性(transversality)这类概念。同时,他还极力鼓动瓜塔利来帮助他克服写作瓶颈。他建议他不要等到他觉得这本书写好了:尽管出版吧——你总能稍后再回头看看!写作就是要让自己感觉更好,他写道,写作便是将你自己从火炉中抽离。<sup>13</sup>

在那些信件中,德勒兹似乎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并激情澎湃。他想进一步发展瓜塔利关于非俄狄浦斯性欲与横截性的研究,他认为瓜塔利给他的回复不仅十分巧妙,还充满着活力,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并希冀瓜塔利将有回复的灵感(最好一一按顺序来作答)。<sup>14</sup> 最为核心的是,瓜塔利雄心勃发,试图走出其前任老师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框架,德勒兹深受吸引。他觉得这份勃发的雄心壮志内涵极其丰富,但也需要进一步理论化。对那些感兴趣于德勒兹和瓜塔利是如何展开合作的人而言,已出版的《信件与其他文本》中德勒兹的信件和《反俄狄浦斯手稿》中瓜塔利的日记内容以及寄给德勒兹的信件都能为他们提供殷实的描述,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知,他们两人共同的思考如何伊始,又是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如果可以进一步审视一些概念是如何发展成他们日后著作之核心,这也挺有趣的。例如,“是否可以有劳您再耐心给我讲讲,”德勒兹在1981年给瓜塔利写道,“您为何要从配置的角度给予表达(而非内容)如此不加掩饰的青睐?”<sup>15</sup>

他们合作的第一本书(《反俄狄浦斯》)一开始的成形就受益于

那些“冗长而又杂乱的通信”，随后则通过“好几天甚至好几周的”会面(但仅限于他们两人之间)。在这些会面中，

我们没有对话：我们其中一人听，另一人说。我绝不会轻易放过菲利克斯，即使他说得已经够多了；菲利克斯总是把我逼得很紧，即使我当时已经精疲力竭。慢慢来，一个概念将会获得其自主的存在。<sup>16</sup>

在这个过程中，德勒兹将瓜塔利视作钻石矿工，并将自己看作一位抛光工。<sup>17</sup>“你是诸多未经雕琢的概念的强力创造者”，他给瓜塔利写道，他坚持说这些概念都是从他那里来的——而非源自外界(瓜塔利自己似乎也是这样想的)。<sup>18</sup>在描述两人的合作时，凡是将二人分离成两个独立的知识主体，认为二者所做的只是智力上的交流的观点，他们俩都坚持避开。“该合作，”瓜塔利写道，

绝非二人简简单单出来见个面的结果。除了促成二人见面的特殊环境因素，还存在一种政治语境。从一开始，这便不仅仅是分享一下共同的理解，而是一起讨论我们所不确定的事物，甚至是1968年五月事件的演变所引起的某种不安与疑惑。

德勒兹将他们合作的过程描述为一次与二元性(duality)决裂的尝试：

我们试图摆脱这种传统的二元性，因为我们俩都在写作。我们俩之间没有谁是病患，也没有谁是精神病专家，我们必须二者



皆是才能建立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谓的流(the flux)。<sup>19</sup>

德勒兹与瓜塔利想将他们自己看作一种机器性配置,集体话语可以从中浮现。这更加是德勒兹经常站出来主张的:“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表达主体,即话语主体(subject of utterance),存在的只有配置。”<sup>20</sup>在点出他的一些合作者之时,他强调这些“点——菲利克斯、克莱尔·帕尔内、我自己和其他很多人——并不算什么,只能作为主体化之临时、转瞬、易逝的点”。<sup>21</sup>尝试去决定谁写什么将会与这一想法相悖,这不过是在建立并不需要的主体位置。

然而,这个过程并非总是那么简单,在完成《反俄狄浦斯》手稿之后(稍后于1972出版),瓜塔利表现出一种对自我之遗失的沮丧,他似乎并不喜欢这种感觉。由于他无法写作,也无法不写作,他与一种“船要沉了”的感觉做着殊死搏斗。<sup>22</sup>这似乎源自一种敏锐的自觉,意识到了他与德勒兹之间的不同——“我们真的不是一类人”——这也是源自他的一种无力感,面对德勒兹的关注和雄心壮志,他感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于此便能感觉到,尽管他们的差异富有生产性,但是其中的一些差异还是产生了一种“思想的‘忧虑’”,例如对于源自德勒兹的“忧虑”,瓜塔利将其称作生产性,认为他总是怀揣着“杰作”;而对于源自自己的那份“忧虑”,他则将其称作更为混乱的“癫狂式精神分裂者之流的游手好闲”,而这些差异往往令他苦不堪言。由于感受到自己“有点为《反俄狄浦斯》超编码了”,而此时他的原始想法和思考也拥有了更连贯一致的形态,在《反俄狄浦斯》临近付梓之际,瓜塔利开始为他将在这本书出版后所负的责任深感焦虑:“我觉得自己压根就是个神棍。就像把这本日记出版一样。瞎扯淡。”<sup>23</sup>



要回到具有生产性的层面继续合作，就是要弃绝自我，而这个过程是通过弗朗兹·卡夫卡才得以完成的。<sup>24</sup>德勒兹和瓜塔利合著的《卡夫卡：为了一种少数文学》出版于1975年（英文版出版于1986年），该书恰好介于《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两卷本之间。这本专著的研究主要提供了关于褶皱、个体化和配置的理论，这些理论还将在今后继续引领德勒兹与瓜塔利的哲学合作，而不仅限于他们随后于1980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的第二卷本——《千高原》。等到他们一同写第三本书时，写作的过程与经历显然已有所不同：

菲利克斯和我已经发展出了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能够猜出彼此下一步想要做什么。现在，我们的交流十分简略，我们之间可以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共鸣，而这些共鸣又不仅仅局限于我们之间，而是广泛地回响于我们所一同横越的各类学科。<sup>25</sup>

在前些年友谊所带来的密切合作之后，德勒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追寻他与艺术、文学和哲学的友谊——“一段明确的友谊实践”，如斯蒂瓦尔所说，“通过一种亲密的交流，这些不同的创作模式引导出一种思想的生产”<sup>26</sup>——而此时此刻，瓜塔利继续寻求进入激进的政治交锋。我们“都必须返回自己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缓口气”，德勒兹如是说，但是，他同时也感到“我们必将再次合作”。<sup>27</sup>他们确实继续展开着合作，他们合作的目的是为了试图回答德勒兹在1981年给瓜塔利的信中提出的问题：“对我而言，核心便是为这个问题寻找一个明确而简洁的答案：什么是哲学？”<sup>28</sup>他们的第四本也是最后一本合著出版于1991年，那便是《什么是



德勒兹与瓜塔利。

哲学?》(英文版出版于1994年)。有时某些传闻会说这本书几乎全都是德勒兹一人写的,他将瓜塔利列为合作者只是为了将这本合著当作一份礼物献给他病人膏肓的挚友。无论真假,这向我们说明了友谊与哲学的羁绊是如何塑造德勒兹与瓜塔利之间的关系的。

从1969年到1992年瓜塔利逝世的几十年间,德勒兹与瓜塔利发展了一段友谊,倘若要对其进行界定,那绝非易事。但从他们早期的信件交流中,我们便能清晰地道出他们都曾为彼此的思想所吸引;其次,他们似乎从友谊的伊始便感受到了其富饶而又无时间性的品质。瓜塔利就写道,他们即将到来的初见将会成为“一个事件,它的起源早在过去就已经出现”。<sup>29</sup>“我也,”德勒兹写道,“觉得我们在真正见面之前就已成了朋友。”<sup>30</sup>多斯对于他们友谊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一致性,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可能本身就是这

样。一方面,多斯告诉我们,他们之间从未亲密无间;另一方面,他所提供的描述又将他们的友谊刻画得无比情深忠笃。<sup>31</sup>这些在他们的通信中都显而易见。尽管两位作者在称呼彼此时都很习惯使用更加非正式的“你”(tu),他们还是继续将对方正式地称作“您”(vous)。与此同时,我们在其间看到了亲密又饱含深情的表达:“我热切地拥抱您”(Je vous embrasse fort)。<sup>32</sup>

我想就此提出两个策略以理解这看似矛盾的两种解读。首先,我们可能得质疑我们对于亲密的理解。德勒兹与瓜塔利之间的确保持有一定的距离。然而,这份距离预示着一一种更加复杂或者是亲密无间的亲昵,它并非是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而是两个个体之间的距离:“我们之间真的存在着一种异议的政治学,”瓜塔利解释道,“与其说这是一种邪典异教,不如说是一种异质文化,即彼此认可并接受对方的独特性……吉尔是我的朋友,但不是我的老兄。”<sup>33</sup>的确,正如我在前文一开始便描述了应该如何理解这段友谊,我想说的是,本章开篇的引言所描述的偷与被偷之隐喻恰好表明了一种十分敏锐的亲昵关系,虽然是在一种不那么传统的层面上。放弃关于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固定边界的看法,同时避免两极分化,也就是要进入一种“生成不可感知”的过程,将生命向生产性遭际敞开。德勒兹对于传统的关系似乎并没太大的兴趣,他描述出的是一种十分特别的亲昵关系,他表示他想“要与不可感知的人建立不可感知的关系,那才是世界上最为美好的东西。你可以说我们全都是克分子,一个克分子的人际网络”。<sup>34</sup>

不仅仅是友谊,在这类情况下,我们也需要重新思考爱。就德勒兹的情况而言,爱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概念,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倾向将爱与某种易辨识的结构和个体相联系。“爱就是为两人所建立的一种我思(Cogito)”,德勒兹与瓜塔利在《千高原》中写道,

这个过程不会将我们引向德勒兹想要带领我们去的地方。事实如此,写作的三角过程包括的不仅有德勒兹与瓜塔利,还有范妮(正如前文所述),这个过程超越了我思,直接与爱情、欲望和思想进行交流。“我没有任何理由,”瓜塔利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将对范妮的欲望与对吉尔的欲望对立起来。”<sup>35</sup> 爱情强化克分子,它建立于占有、嫉妒、个体经济之上,它没有任何力以推进生成。尽管如此,德勒兹还是反复提及爱情的概念。在导言部分,我就提到了爱情作为一种对独特性、多样性和“小事件”的认可;在上一章,我也有就非俄狄浦斯之爱的关系再次提到它。这可能也是德勒兹对瓜塔利所怀有的那种爱:“我们以这种方式理解彼此、补足彼此,我们以这种方式非人化、独特化彼此,总而言之,我们以这种方式爱着彼此。”<sup>36</sup> 这不是自我(egos)之间的那种爱,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克分子式的爱,它创造出了一种具有生产性非人化的感觉。读者会尝试去辨认在他们的合著中,哪一部分是谁写的,德勒兹深受困扰,他辩解道,“如同所有人一样,我们中的任何一人已然成了形形色色的其他人,这本书早已挤得密密麻麻了。”<sup>37</sup>

如果说尝试去理解德勒兹与瓜塔利之间友谊的第一条策略是对“亲昵”一词意指的挑战,那么,第二条策略则是去思考他们关于生成和个体化的理论是如何实际运用于其生活,尤其是如何运用于他们共同的生活。正如斯蒂瓦尔所言,德勒兹是通过非人的方式来描述像瓜塔利和福柯这样的朋友:通过肢体动作和气氛。<sup>38</sup> 德勒兹与瓜塔利在工作和友谊中的特殊联合真的不应该被解释成一种联合,而应将其视作一种融合(merging),一种经由思考而达到的共同浮现(co-emergence),一种配置。这种配置也能在德勒兹对瓜塔利的描述中看到,德勒兹并未将瓜塔利描述成一个人,而是反复将其描绘成一系列运动和肢体动作。瓜塔利似乎是在德勒兹精



疲力竭的时候为其提供能量和速度，德勒兹也在他们的通信中经常写道：“你的发现简直太妙了。”他说，“而我走得比以前更慢了。”<sup>39</sup> 菲利克斯，他写道，就像一片汪洋，“波光熠熠”；他“有着令人惊叹的速度”，还“从未停止前行”。<sup>40</sup> 无论是依靠文字、肢体语言还是声音，他不断前行，“如同一个万花筒，每次都在形成新的组合画面”。菲利克斯这个名字，他说，“意为某物正在发生，并非指一个主体”。<sup>41</sup> 瓜塔利于 1992 年逝世，而后德勒兹写道：

也许，记住一位已逝挚友最痛苦的地方就在于他的举手投足和眼中余光依旧还牵连着我们，即使他早已不在。菲利克斯的作品给予这些动作与眼神以新的实质，就像一个新的物体，它可以传递它们的能量。<sup>42</sup>

这些举手投足再次回到了德勒兹对于他与福柯友谊的描述之中。“这更简单，”当被问及他是如何并于何时结识福柯的，他写道，“比起记住一个日期，记住一个人的举手投足或是放声大笑要容易得多。”<sup>43</sup> 德勒兹与福柯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次见面还是借由一位共同的好友，但据德勒兹回忆，他认为他是在六十年代早期才结识福柯的。<sup>44</sup> 这次，他们对于尼采共同的兴趣将他们聚在一起，他们的首次合作始于一本尼采著作的法文新版。<sup>45</sup> 他们的合作在 1968 年左右进一步加强，德勒兹那时恰好加入了监狱信息小组 (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 GIP)，这是一个左翼激进分子组织，福柯曾是其首要执行者。这个组织曾致力于传播关于监狱的信息，这个时期更多地致力于重塑知识分子的道德，而该组织也为之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其努力的目标就在于改变知识分子的定位：知识分子并非可以掌握普天下知识与



政治的总合,而应直接投身于“为具体目的所展开的具体斗争”。<sup>46</sup> 德勒兹与福柯就当时的政治形势一同参与并组织了一系列或多或少有些激进的活动,其中包括示威游行、抗议和请愿,这些活动涉及的不仅仅是监狱,更广泛地说,还包括种族主义和镇压。这些活动也囊括了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和作家,其中有萨特、西苏和让·日奈(Jean Genet)。<sup>47</sup>

德勒兹与福柯的友谊其特点表现为一种智力交流,他们都充分意识到这是一场基本公开的交流。按艾丽诺·考夫曼的描述,他们的友谊弥漫着一种嬉戏而又严肃的纯真,“因知晓其他人可能在关注自己而欢呼雀跃,与此同时还不免泛些羞怯”。<sup>48</sup> 他们也常常真挚而公开地表达对对方哲学著作的钦佩之情。就此,他们与其他许多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并无不同,考夫曼表示,他们似乎都有一种嗜好——那就是公开高歌对彼此的颂扬。<sup>49</sup> 德勒兹认为福柯的



1972年,德勒兹、萨特与福柯参与一场GIP行动。

存在完完全全是令人醍醐灌顶且肃然起敬的。他敬佩他于思考和政治上的勇气,并竭尽所能地赞扬他那种“特立独行”“骇人听闻”而又“不失风趣”的勇气。<sup>50</sup>即使是在更为私人的交流中,德勒兹依旧对福柯表现出巨大的钦佩之情。就福柯的全部作品而言,德勒兹认为它们不仅让人叹为观止,而且还充满新意,他认为他自己的著作还大有不足:尽管它们有众多小的闪光点,但是过于学术化的长篇论述却将它们一一湮没。<sup>51</sup>除此之外,他觉得福柯对他著作的阐释十分出色:“我觉得你不仅仅完全理解了我要说什么,你的阐释甚至完全超越了我所说的东西。这感觉真是如梦如幻。”<sup>52</sup>归根结底,德勒兹认为福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sup>53</sup>

福柯则又反过来将德勒兹称作“当前最伟大的法国哲学家”。<sup>54</sup>在1970年评论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和《感觉的逻辑》之时,他便发现这两本书有着某种异常的优点,那就是“它们是难以讨论的”。<sup>55</sup>同样,也是在这篇评论中(但却很少有人读到),福柯发出了一条著名的言论(即使听起来不免有些含混),马尔克斯注意到“这就好似对德勒兹思想的诗性沉思”:“也许会有那么一天,人们会将这个世纪认知成德勒兹纪元。”<sup>56</sup>在《致信一位严苛的评论家》(“Letter to a Harsh Critic”)中,德勒兹对该评价和他们往来的交流做出表态:他拒绝接受他与福柯之间是一种“阿谀逢迎。你也许压根就没想过,”他写道,“我可能是真的敬仰福柯,或者他的短评仅是一种打趣,为的是让像我们这样的人付之一笑,并让其他所有的人都怒不可遏”。<sup>57</sup>他们的彼此称赞绝非一种阿谀逢迎,对他们而言,这里有着一种更加微妙的区别。尽管他们俩随时都可对对方大加赞扬,但在他们的表达风格中,考夫曼还是注意到了一种明显的不平衡与差异:福柯的表述多瞬时性(momentary)但极重要(momentous)的赞扬,而德勒兹对福柯的称赞则更像是一种“对福

柯核心能量的稳步消费”。总而言之，考夫曼承认要在这两种话语中做出区分并非易事，原因就在于他们俩总是以一种经济的方式与对方并通过对方来言说，在这种模式中，他们两人之间的疆界（作为两个独立的人）被打破了。<sup>58</sup>

尽管如此，这些疆界还是随着二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系列相悖的政治理念而再次浮现。无论是关于德国律师克劳斯·克鲁瓦桑(Klaus Croissant)因充当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派(the Baader-Meinhof gang)的出庭律师而遭受监禁与引渡的问题，还是在讨论西德(West Germany)是否算作一个法西斯政权的问题上，抑或是他们不断分化与进一步相左的政治分析，这些都为德勒兹与福柯的友谊中更富活力的一面画上了句号。<sup>59</sup>多斯列举出了这些年里出现的一系列其他分歧。他们之间的第二点分歧就在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福柯对待以色列要比德勒兹更宽容。<sup>60</sup>巴勒斯坦的领土被占据，其人民遭受不公对待，这让德勒兹深受触动。在一封写给瓜塔利的信中，他就1982年萨巴拉(Sabra)与夏提拉(Shatila)难民营遭大屠杀的消息深表沮丧与绝望。“万物晦暗，”他写道，“我根本无法容忍黎巴嫩现今所发生的一切。”<sup>61</sup>在七十年代后期与八十年代前期，德勒兹还就此话题发表了一些文章，例如：《和平的破坏者》(“Spoilers of Peace”)、《巴勒斯坦的印第安人》(“The Indians of Palestine”)（一次对德勒兹好友、巴勒斯坦作家兼编辑伊莱亚斯·桑巴[Elias Sanbar]的访谈)与《作为阿拉法特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rafat”)，所有这些文章都明确道出了德勒兹的鲜明立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据是不公正的罪恶。<sup>62</sup>德勒兹认同一个核心问题，即以色列政权建立于一个被公开无视的事实之上——巴勒斯坦人早已扎根于这片土地——他注意到巴勒斯坦人是如何被称作“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就好像他们的现居所

是一种阴差阳错的结果”，还注意到“他们所遭受的否认不仅是权利上的，还包括他们作为巴勒斯坦人的事实”。<sup>63</sup>

德勒兹与福柯之间的第三点分歧就在于他们对于新哲学家 (the nouveaux philosophes) 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个名称专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批风格迥异的法国哲学家，包括安德烈·格鲁克斯曼 (André Glucksmann)、伯纳德-亨利·列维 (Bernard-Henri Lévy)、帕斯卡尔·布吕克内 (Pascal Bruckner)、克里斯蒂安·让贝 (Christian Jambet) 与居伊·拉德罗 (Guy Lardreau)。他们都曾玩弄毛主义；尔后，他们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大众传媒走得特别近，并又拒绝接受毛主义话语的流行，同时抗拒着他们同辈和老一代知识分子所普遍持有的“左倾”态度。福柯至少一开始对他们的雄心壮志还是抱以较为支持的态度，尤其支持他们对于古拉格劳改营 (the Gulag) 的批评；相反，德勒兹更为宽泛地就他们的倾向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从德勒兹对这些新哲学家的反应来看，我们可以从其政治术语的表述中找到他哲学的优秀范例。他看到这些人的运动驶向了“哲学营销” (philosophical marketing)，他看到他们重返个体作者的中心性，他看到他们与古拉格劳改营的受害者们进行虚伪的政治认同，他还看到他们对于 1968 年五月运动的背离与拒绝，对于这一切，他都持以严峻的批判态度。在 1977 年的一次采访中，他声称他们所行的策略便是再次通过将思想缝入个体式主体 (the individual subject) 的概念之中，从而关闭真实遭际的空间，而这些遭际却是真正政治行动得以起步之可能的关键，而这些策略所带来的后果却是让思考迟钝。作为 1968 年五月运动之后的“迷失的一代”，他们政治上的消极主义部分被发泄在作为“68”运动“舵手一代”的德勒兹与瓜塔利身上。除去可能受到的人格侮辱不说 (德勒兹本人拒绝这样的解释)，<sup>64</sup> 新哲学家的消极主义同样



与德勒兹抗拒虚无主义的宗旨相悖。即使在沮丧之中，德勒兹依旧秉持着一种积极的政治理念，正如格雷戈里·弗拉克斯曼（Gregory Flaxman）所言，用德勒兹自己的话来说，他还是坚持一个人应配得上他自己的事件，这很有必要。<sup>65</sup> 德勒兹认为，在新哲学家否定政治和试验的同时，他们还“紧闭了窗户”，那里“还曾有微风徐来”。<sup>66</sup>

新哲学家现象加强了作者的重要性，他们的这种做法本身就受到了德勒兹与福柯的**高度怀疑**。德勒兹坚持认为“作者-功能”是一个空位，如果有人执意占据这个空位，那么，这不仅鼓动了僵死思想的烙印与定位，同时还妨害了一些主动而积极的功能，这些功能的出现必须要超越一个单个的主体位置。坚持作者-功能同样构成了一种掩盖事实的方式，**它掩盖了一种无言以对——一个将自己看得太重的主体位置倾向去隐藏它的空洞命题**。正如他在直接提到新哲学家时所言：“**思想愈是缺乏力度，哲学家的存在感就愈强。**”<sup>67</sup> 换言之，坚持作者-功能就是一次反动，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只是隐匿了一种空洞；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则阻碍了创造性。但与此同时，正因德勒兹对新哲学家的回应整体上与其哲学完美吻合，我们不免感觉到我们可以将其回应的本质当作一个清晰表达出来的范例，**它为我们示范了德勒兹也有可能失败——他是如何辜负肯定的生成-能动**（the becoming-active of affirmation）。“我的绵薄之力，”在他就某一问题给瓜塔利的信中写道，“远不足以回答或是参与任何辩论。”<sup>68</sup> 然而，他对新哲学家的回应则成了一个例证，**它证明了他自己无法成功克服自己内在的反应冲动**。弗拉克斯曼认为，他们对他们的一次公开回应（“我真的没时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应他们。就这样了。”<sup>69</sup>）明显就带有反应本能。他不仅需要对他们进行谴责，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承认与回应一个事实，



那就是这些哲学家很有可能将他的回应视作嫉妒的一种标志，他的哲学渴望的那种“天启式笑意与‘生命’的创造性模态”压根就不存在。<sup>70</sup>

在更为纯粹的观念上，德勒兹与福柯之间也存在纯粹概念上的分歧。举个例子来说，福柯对真理概念的回归便让德勒兹惊骇不已（“米歇尔彻底地疯了”<sup>71</sup>）。然而，他们俩大相径庭的哲学分歧主要还是在于他们对于欲望与愉悦概念的不同看法。在阅读福柯《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的第一卷本时，德勒兹就觉得他有一大堆异议。德勒兹于1977年就此话题给福柯写了一封信，并将其委托给福柯的助手弗朗索瓦·艾华德(François Ewald)递送。正是因为这些评论最终成了他们之间交流的终结，这不禁使人揣测：福柯是为这封信所伤，他也并未回信，随即便决定再也不见德勒兹了。收到信的那段日子里，福柯自己也在挣扎——因为他出版的这本书反响不佳，艾华德回忆说，福柯正在经历着某种危机。<sup>72</sup>尽管这封信落笔的口吻既谈不上带有私人性质，也说不上具有谴责性，德勒兹表示，自他读过这本书之后，他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就米歇尔当前的研究来定位[他自己]了”。<sup>73</sup>但艾华德反对将这封信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批评，他认为这封信甚至连争论都算不上。相反，他认为德勒兹写作这封信的缘由在于：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朋友的处境之艰，因而，这封信实为“一封邀请函，友谊的真挚溢于言表，它诚邀其好友重启被中断对话”。<sup>74</sup>

在他的信中——这封信随后于1994年出版，命名为《欲望与愉悦》(英文版出版于1997年)——德勒兹就他们对这些概念的不同理解列出一系列他与福柯相左之处。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对精神分析的指责，两人均认为精神分析劫持了性欲，但德勒兹与福柯也就是于此处分道扬镳的。福柯最终拒绝欲望这个概念的可用

性,原因在于它骨子里似乎不可避免地充斥着精神分析的话语。福柯故而将重心调整至愉悦这个概念,他进而开始写作关于性欲的三卷名作。与之相反,德勒兹拒绝将愉悦视作与个体性和匮乏相关的概念,由此,他展开了对欲望概念的重新思考。这些分歧明显与性欲问题直接相关,但在涉及权力问题的时候,这些分歧更广泛地说明了德勒兹和福柯的著作中的一些核心差异。在德勒兹看来,正如他于《福柯》那本书中所说,在福柯关于性欲著作的第一卷中,他对权力关系的关注造成了一个僵局,这个僵局使得抵抗的可能性变得孱弱无力,然而对福柯而言,这一关注恰好使他能够发展出生命权力(biopower)这一重要理论,这在其性史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sup>75</sup>

朋友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他们后来也都为此遗憾。于1984年6月逝世前,病床上的福柯的遗愿之一便是再见德勒兹一面。<sup>76</sup>尽管这一遗愿并未实现,德勒兹还是应福柯的伴侣丹尼尔·德菲尔(Daniel Defert)之邀在福柯的葬礼上发言。<sup>77</sup>不久之后,也就是在1985年至1986年间,德勒兹在巴黎第八大学开展了关于福柯著作的一系列讲座,场场座无虚席;同时还完成了《福柯》一书的写作(于1986年出版)。德勒兹曾说,这本书源自他自己内心的一种需求,他深受已逝挚友未完成作品的鼓动。<sup>78</sup>尽管他们分歧的巅峰常常被视作一种断裂,但无论是德勒兹还是福柯,两人从未将其视为他们哲学友谊的终结。即使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他们还是继续往来通信,二人从未停止向对方表露自己对彼此著作的敬仰之情。正如斯蒂瓦尔所言,我们最好将其视为一种疏离,而不要将其当作一种断裂。德勒兹自己也证实过这种看法,他认为占上风的是一种疏离感,但这种疏离却源自其他状况,而非分歧自身;那些状况迫使他们不再会面,而这种物理距离又造成了一种茫然感

或一种疏离感。<sup>79</sup>德勒兹借用福柯自己对于激情的定义来描述二人之间的友谊——强弱相、白炽化、非稳定和摇摆不定——但他同时也确认了他们俩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拥有相同的哲学概念。<sup>80</sup>归根到底，就他对于友谊的理解而言，他似乎也在福柯身上发现了摩擦与灵感对于友谊的重要性。他怎么看他并不重要，德勒兹说，

只要我还没真正遭际这一连串声响，这些决定性姿势的声响、火绒与烈火燃烧思想的声响、专心致志与戛然而止的声响还有那让人触及温柔和顺之际又倍感“危机四伏”的纵情欢笑与莞尔一笑之声响——这一连串声响汇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组合，而其正名将 是福柯。<sup>81</sup>

在德勒兹于福柯逝世后写的这本关于他的著作中，德勒兹在他们之间辨认并发展出了一些丰硕的概念联系。在前面，我们注意到德勒兹是如何从巴洛克艺术和莱布尼兹那里拾起关于褶子的概念，然而正是受助于福柯，德勒兹才从该概念中发展出一种政治上可行的理解。在这本关于福柯的书中，德勒兹讨论道：在完成《性史》的第一卷本之后，福柯是如何发展出对褶子的理解，以及该概念又是如何在随后的两卷本中成形。德勒兹注意到福柯是如何在完成第一卷本后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僵局，这涉及如何就与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找到一种与自己的关系，德勒兹发现福柯在随后的两卷本中开始脱离这个僵局。在第二卷本中，他开始展开的并非一种关于主体的理论，而是一种关于褶子的理论，好似一种主体化的力、一种向自我内部折起的力，它创造出了众多抵抗点。<sup>82</sup>这种褶皱让抵抗成为可能，正如它产生出“一种特定的或集体性的个体

化,而这种个体化与一个事件息息相关”。<sup>83</sup> 鉴于他们共同参与的活动——例如他们 1968 年的政治激进主义以及他们试图就具体的斗争而不是普遍性的斗争来重新定位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将德勒兹与福柯的友谊之褶视作一个事件,由该事件孵化的新的、政治化的主体性就是对 1968 年的回应,即使他们所处的社会无力为之。于 1984 年在《新文学》(*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上发表的一篇小文中,德勒兹与瓜塔利声称,即使历史学家在事实之后热切渴望为发生的事件复原其因果性,但一个历史事件内仍会有一部分从这种因果性中脱离或断裂——一种对可能性的重新引入。“1968 年的五月事件,”他们声称,“更多的是一个纯粹事件的顺序,它脱离了所有一般和常规的因果性。”它开启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与主体性的生产。一旦发生这类事件,社会就必须站出来,并形成“与这种新的主体性相匹配的集体性的发声代表”——它需要动员创造力和进取心以回应这个事件所开辟的可能性。德勒兹与瓜塔利表示,法兰西对此无能为力:它“从未为其人民提出任何解决方案”。因此,他们在一篇文章的标题中开门见山地进行批判——《68 年五月事件从未发生》(“May '68 Did Not Take Place”)。<sup>84</sup>

不似德勒兹与瓜塔利指出的“68”事件后的失败,在重新部署他们的构想后,我们可能看到,德勒兹与福柯的友谊的确产生于这个政治化的事件。福柯通常被认为是一位高度政治化的思想家,与其相比,德勒兹则常被诟病不够政治化。原因就在于他没有涉足常规政治理论的倾向,也没有要去直接处理民主和正义这类话题的倾向;仅仅在其后期的著作中,他才明显吐露他的政治之忧,保罗·帕顿注意到,德勒兹没有对任何一位政治哲学家的权威性主张进行过回应。<sup>85</sup> 他的政治概念并不能如此简单地来界定;它不



是他自己所描述的那种“多数主义”(majoritarian),即它不主要涉及现存的身份、党派或意识形态。与之相反,他的政治概念恰好依赖于破除这类结构的意义。但是,他的确涉足了政治。德勒兹不仅与福柯一同参与了GIP,他反对对克鲁瓦桑的引渡,为支持巴勒斯坦的斗争写请愿书与干涉主义的文章,他还反对轰炸越南以及法国学术界对同性恋者的敌意与解聘,反对伊朗对人权的亵渎,反对对意大利哲学家兼激进主义分子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监禁与第一次海湾战争。他对政治变革的兴趣通常被归因于他与瓜塔利的会面,伊恩·布坎南(Ian Buchanan)与尼古拉斯·索伯恩(Nicholas Thoburn)则表示这种说法并不正确。<sup>86</sup>我们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便可知晓,即使德勒兹与瓜塔利确保了他们的政治哲学绝不会被“重新装配为一种政治程序”,<sup>87</sup>德勒兹的著作却越来越受到政治激进主义方案的挪用。或许,倘若他真的写完了那本关于马克思的书——原定名为《马克思的伟大》(*Grandeur de Marx*)(英译为 *The Grandeur of Marx*),他在快要逝世前与奈格里的一次访谈中有特别提到,那么,那种认为他不足以成为一名政治哲学家的观念将大受更改。关于这本假定在写作中的著作,传言一直没有间断。有些人将德勒兹的表述理解为一种愿望的表达,认为他仅仅是希冀有一天能写出一本这样的书,但也有些人认为可能存在着这样一份消失的手稿,我们只是不知道它遗失在何处而已。的确,格雷格·兰伯特(Gregg Lambert)就注意到,该表述已近乎一种“迷失的福音”的状态。<sup>88</sup>那么,毫无疑问,鉴于这个清晰明确的政治-理论焦点,它极有可能引发对德勒兹著作的一次重新探索。

回到友谊的政治学中,假使瓜塔利的出现将一种更为明晰的政治性引入他和德勒兹的共同著作中,那么德勒兹与福柯的友谊



则特别在德勒兹的著作中标出了其政治维度，即便是在并不那么显眼的地方。在给德勒兹与瓜塔利的《反俄狄浦斯》的序言中，福柯写道：

这本书通常让我们相信它不过净是一些乐子和嬉戏打闹，但于此之间，一些关键性的东西正在发生，这些东西实则极端严肃：对法西斯主义所有变体的考究，从将我们圈禁镇服的十恶不赦的法西斯主义到其组成我们日常生活专制之苦痛的琐碎变体。<sup>89</sup>

但是，只要我们好好看看福柯是如何将褶子这样的概念转化为想象中用于抵抗的政治工具，我们便能知晓他们的共同思考是如何成为一种政治化行为的。借助福柯来阅读德勒兹便可将后者著作中的政治维度意义勾画出来。德勒兹与福柯在其友谊的褶皱上摩擦所引起的思考，又于他们的生活与著作中不断展开与折叠。

在德勒兹式友谊与写作的褶子中，克莱尔·帕尔内也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帕尔内作为德勒兹以前在万塞纳大学教书时的一位学生，随后与德勒兹合作了两个项目：《对话》（出版于1977年，英文版出版于1987年）和电视型对话节目——《入门》（1988年至1999年）。帕尔内与德勒兹保持着私交，斯蒂瓦尔注意到，他们的合作显露出一种明显的意气相投。于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勒兹的某种乐趣所在，还有他对学生的投入——他希望成为一名协调者，不是指手画脚而是促进概念的联结，他认为这才是哲学关键的作用。<sup>90</sup>德勒兹对学生和青年学者的慷慨大度总是受到特别关注。譬如，史利福特回忆道，他曾在莎拉·柯夫曼（Sarah Kofman）1994年逝世前与其会面，莎拉的著作曾一度接受了德勒

兹的指点。在她桌上的纪念物中，柯夫曼给他看了一张来自德勒兹的明信片，她于是于1972年收到的，德勒兹在这张明信片上告诉她，在读她所作的《尼采与隐喻》(*Nietzsche et la métaphore*)时他是多么欣喜。<sup>91</sup> 德勒兹与帕尔内的合著则更经得起考验，此外，他们通力合作的特色在于，他们试图超越一个作者的身份进行书写。他们在《对话》中的著作与德勒兹与瓜塔利的合作相互交织，并为德勒兹与瓜塔利进一步发展其非等级化(non-hierarchal)和非认同主导型(non-identitarian)合作奠定了基础，这种合作随后成形于《千高原》。<sup>92</sup> 或许也是在德勒兹与帕尔内的著作之中，主要依赖友谊与思考之间关系的这个计划才能被最清晰地表述出来。斯蒂瓦尔表示，《对话》构成了“一次坚定而蓄意的尝试，旨在撤换作者的身份，如此一来，思想彼此之间的某种闪光物从友谊的褶子里——也就是从共振(resonances)之中、从差异之中并从重复之中(仅在斡旋的亲密内才可获得)——走到了前台”。<sup>93</sup>

德勒兹与帕尔内的合作昭示着，直接的对话性该如何生成一种在此之间状态的写作，而德勒兹与德里达的关系属于这么一类当代法国哲学家，斯蒂瓦尔注意到，通常而言，他们都在利用友谊或多或少的疏离建立一种“思想之友的共同体”。<sup>94</sup> 据考夫曼描述，巴塔耶、莫里斯·布朗肖、德勒兹、福柯和克罗索斯基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只是一种“赞颂的谵妄”，它还是一种力求共同思考的严肃尝试，“一种身份的狂喜式瓦解，在它发生之际，何种思想归属何人便再也无从得知了”。<sup>95</sup> 事实也的确如此，那些重现于德勒兹对瓜塔利和福柯亲密友谊中的姿态，也重现于德里达对德勒兹的悼词之中，在德勒兹于1995年逝世之后，德里达将其发表于一份名叫《解放》(*Libération*)的巴黎报纸上。这也许总体上更能说明德里达具有原始文本倾向(arche-textually inclined)的著作，这同样也说明了他与

德勒兹友谊的本质，即德勒兹所唤起的一些姿态混合了他与瓜塔利和福柯的友谊之物理的、智力的和情感的褶子，与之相比，由德里达所唤起的姿态则更加具有直接的文本性。该姿态服务于一种意图，它试图去捕获德里达和德勒兹于写作和阅读风格上的相似之处：“一种近乎完全的亲密性”，它“越过明显的差异”以发生。<sup>96</sup>德里达所指的差距主要在于他们各自的哲学方法，尽管有相同的兴趣，但是于方法的实际运用之中，却还是大为不同。

在德勒兹与德里达之间，至少也有一种身体的距离在影响他们的友谊。尽管他们总是见面，无论是在学术活动中，还是在稍私人一些的聚会里——譬如据德里达回忆，他们参加完博士答辩一同乘车返回巴黎，他还能回忆起其友人更多身体上的特征：他的笑声、私语还有嘶哑的音色——然而，他们从未像德勒兹与瓜塔利、福柯抑或帕尔内那样合作过。在德勒兹死后，德里达在悼词中最为人们知晓的话中不仅道出了他的孤寂之感，同时还坦言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对话从未发生——“我将不得不孑然漂泊于本应该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漫长对话之流”——他就此指出了一丝短暂而又未酬的可能性。尽管他们是一代人，我们（尤其是怀以后知之明来看）能够看出他们不仅于哲学方法上南辕北辙，他们在实践的道路上也是背道相驰的。与很少周游的德勒兹不同，德里达不仅游历四海，还授课八方。此外，德里达还深涉制度政治，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是1983年在巴黎成立的国际哲学学院(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的共同创始人之一。尽管如此，德里达不仅显然十分熟悉德勒兹的著作，他还表示德勒兹是同侪之辈中他感觉最亲近的人之一。<sup>97</sup>我们已经提到，德勒兹与德里达之间友谊的褶子的特色便是一种对魅力的感知、一种于对方之中敞开的感觉和一种在更为深邃的哲学意义里学以相长的感觉。<sup>98</sup>正如德里达所言，德勒兹给予了他

和他们众多同辈“一个契机，他们得以通过思考他来思考，这都多亏了他”。<sup>99</sup>

那么，当我们谈论或思考德勒兹之时，即使是关于那些他“独立完成”的著作，我们似乎必须常常去想象一个群体。这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或是应该试图去准确核实何种思想源自何人，而是因为，如果我们知晓它是如何为遭际所填充，那么我们将更好地理解德勒兹的生平与其著作。德勒兹在创作中制造了一种孤零索居之感，但这种感觉又令人感到“人群拥挤”：

你遭际人群（有时与他们素不相识或素未谋面），但你也在遭际运动、观念、事件和实体。即使所有这些东西都有与其相称的名字，但这些恰如其分的名称并非指定给一个人或是一个主体。它指定给一种效果，好比一个“之”字形，就像某个穿梭或发生于二者之间的东西。<sup>100</sup>

大量事物都发生于二者之间，我们也于此列举了众多事例。但即使我们能够获取所有的相互关联，于此书有限的篇幅之中，我们也不可能将其列举说明。倘若想要腾出地方来翔实地讨论这些源自遭际的丰硕概念，这也十分不切实际。

不过有一个概念特别值得注意，它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仅是因为它按理该是德勒兹与瓜塔利诸多概念中最著名和常用的，更是因为它有助于阐明一种连接性，而这种连接性恰好为德勒兹突显出了友谊创造性和生产性的潜力，这个概念便是欲望。作为他们精神分裂分析计划的一部分，德勒兹和瓜塔利重新思考了为精神分析学所定义的欲望概念。在后者看来，欲望的本源是与匮乏息息相关的，而德勒兹与瓜塔利却将欲望理解为一种积极的



力——一种对生命的提升,正如欲望勾连着其他欲望。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两卷本中,他们对精神分析学进行的实验不仅利用了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理论,而且还结合了马克思与尼采的学说。这也受到了他们同时代思想家著作的启发,例如克罗索斯基。在1971年写给克罗索斯基的一封信中,德勒兹表示,克罗索斯基不论是欲望引入基础建设,还是将生产的范畴引入欲望,他的做法都具有巨大意义。德勒兹认为,这提供了一条路径,该路径可以走出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之间、金钱与排泄物之间贫瘠的平行关系,摆脱所有的愚蠢。<sup>101</sup>德勒兹与瓜塔利的精神分裂分析计划不仅将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学说和马克思的劳动力(labour power)理论相连接,同时还声称拉康才是第一位精神分裂分析师——拉康“是将这片分析领域精神分裂化的第一人”<sup>102</sup>——这个计划主要是在超越俄狄浦斯和家庭的层面来将欲望理论化,并将其政治化为某种事物,该事物向整个社会和历史范畴通告生产。重要的是,这个欲望的概念之定义并不完全是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理论的否定,相反,它是一种勇敢而又富有创造性的使用,而且主要是对后者理论的融合。的确,尽管在德勒兹与瓜塔利对拉康理论的结合是否值得肯定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尽管他们的著作俨然被误读为一种对精神分析学说的公然拒绝,但是,还是有人坚持认为,德勒兹可能是“拉康的弟子中思考最为深刻、最为独立的一个”。<sup>103</sup>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德勒兹曾担心拉康可能无法接受《反俄狄浦斯》中的批评,可拉康最终似乎十分欣赏对他著作的这种无礼的阐释:“我所需要的,”他在与德勒兹为数不多的遭际中告诉他,“正是像你这样的人。”<sup>104</sup>

在连接性的精神中,德勒兹不仅受到了像**克罗索斯基**和**巴塔耶**这样的当代思想家的影响,他还汲取了一大批早期哲学家的思



想以与瓜塔利一同发展这个欲望的概念。他从康德、斯宾诺莎、尼采和马克思那里拾起一些灵感，以此构造出一个欲望的概念，它生产真实，但并不诉诸先验法则，并将它从个体的场域里解放出来。<sup>105</sup>在精神分析学说中，欲望源自一种驻于个体内部的力，这个个体总是缺乏某物；而对欲望的重新思考则走出了精神分析学说，进而认为欲望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力，这个驱力突出并生产我们随后要理解成个体的东西。这种重新思考不仅需要欲望自身进行彻底地重新概念化，而且还需要对什么是个体的问题进行重新概念化。个体并非欲望之源，而是其产生出的短暂效果。德勒兹与瓜塔利采用机器的概念解释道，我们可能以为是个体主体的事物只不过是一组零件，它们被投入相对稳定的配置中进行运作，而这些配置则依靠欲望——即欲望机器(desiring-machines)——运转。

这里所勾勒出的众多友谊都是些欲望机器。我所试图描绘的共同思考浮现于一个连接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将已然“十分拥挤”的实体聚在一起，并将它们投入运作。这类配置不仅运作于思考的生产，而且还组成了一种力以反对精神分析学说和资本主义的淫威。通常而言，精神分析学说鼓励的个体之生产和其与家庭的关系不仅是对欲望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约束，而且还是对欲望生产(desiring-production)和主体性的模式的强化，而这两种模式的运作又恰好为资本主义所操控。将欲望锁入家庭的三角结构——爹地-妈咪-宝宝——便是将欲望划入固定的结构之中，这也生产出了一批匮乏的主体，他们个体的欲望正是资本主义根本性的依赖。可是，欲望“并不缺乏任何东西”，德勒兹与瓜塔利写道，“它不缺乏客体。相反，主体才是欲望中所缺失的，或者说，缺乏一个固定主体的正是欲望；除非是在压抑的情况下，否则就不存在在一个固定的主体”。<sup>106</sup>鉴于此，我们便能知晓友谊的政治学为何

真的是一种政治学——正是得益于欲望的生产，主体和家庭的结构才能被突破，因此才能创造出超越压抑的欲望机器。故而，辨认出友谊在德勒兹生平所处的位置，便是同时去辨认他生活与工作的核心所在。

## 一次实践

哲学并不处于一种对其他领域进行外在反思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与它们进行积极的内在合作的状态，此外，它既不会更加抽象，也不会更困难。<sup>1</sup>

在第一章，我曾简要表明，德勒兹早期的灵感一部分源自青年文学教授皮埃尔·哈布瓦赫，在战争期间，两人曾一同漫步于诺曼底的海滩。当然，我们无从穿越时空去窃听他们的谈话，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利用这些漫步去理解德勒兹与文学和艺术的交集。了解到德勒兹对于文学的着迷初现于这些漫步之中，同时再回顾一下关于魅力和配置的概念，我们便能直接参考德勒兹将哲学当作实践的方式来定位这种着迷。让我们想象一下，当哈布瓦赫吟诵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和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作品之时，<sup>2</sup>细沙是如何在他们脚下流动，汪洋是如何涨起潮水再惊起一片片波澜，以及流莺又是如何在他们头顶鸣动。此外，再想象一下，他们肯定也意识到了战火以及被卷入其中的挚爱，还有其他我们无法知晓的东西，这便足以说明思考是如何连动一系列源自不同领域的成分以展



从左至右：德勒兹、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莫里斯·德·冈蒂亚克、皮埃尔·克罗索斯基、雅克·德里达与伯纳德·柏德拉，出席 1972 年在诺曼底瑟里西拉塞勒市由瑟里西国际文化中心举办的“尼采今日？”会议。

露自身的。文学、细沙、汪洋、友谊、战火——这些便是锻造德勒兹哲学的晶体。这并不抽象——不同的元素自四周汇聚一处，而德勒兹的哲学则建立于它们周遭，它建立的基础便是与实践共同思考、通过实践进行思考。通过实践的概念，我们知晓，作为哲学的友谊的重要维度，“在此之间”（前一章节有对此进行概述）是如何复现于德勒兹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之中。

我斗胆说，就德勒兹的哲学或其生平而言，倘若我们无法理解**实践**于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对这二者的理解都只会显得微不足道。我们见识过了这种实践，即便我们没有对其进行如下讨论：在第一章中，我们讨论过孩童实验性身体中的强度，而这种实践恰巧出现于此；它还出现在第二章所勾勒的哲学家的“基情”（the

buggery)里;以及在第三章中,它出现在与友谊不平表面的摩擦中。我们可知,对德勒兹而言,思考与存在都无法孤立于实践的环境存在。即使是“环境”这个词的使用,于此也不是很恰当;因为它所强调的实则是一种分离,而这正是实践这个概念所力争克服的。这便是他为何需要诸如配置、机器以及生成这类概念的原因——因为它们拒斥这种分离,它们所强调的是,所有生命形式是如何通过实践塑形的,无论它们是以人的或非人的身体、艺术品、文学文本、电影还是哲学的形式出现。这些要素汇聚的时间或长或短,它们在各种各样的星丛(constellations)之中进行运作。情动于此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它的作用便是以瞬息的速度和万变的坚定调动各种关系。文学、细沙、汪洋、友谊、战火:这都是欲望机器的零部件。我们将这些机器唤作人类或绘画或《到灯塔去》;其缘由无疑是,这些星丛差异地运转着,我们需要不同的工具去理解它们。但是关键却在于,我们不能将它们视为彼此分离的实体来理解,此外,我们不能通过假设它们的意义或动因去规约它们能做什么,相反,我们应该去探索它们运转的繁多方式。这也就返回了德勒兹就作者-功能发出的告诫,一种为创造力预留空间的尝试,这种创造力不会依赖于这样一种功能。正如友谊的例子一样,其关键在于,哲学的发生仅通过连同外在于其自身的东西:“逃离哲学,”德勒兹写道,“为了能够在外部产生哲学,什么都不要在意。哲学家一直都是另一些东西,他们是从另一些东西中蹦出来的。”<sup>3</sup>

因此,德勒兹在为文学、艺术或电影写作时,并非一味将其哲学应用于这些领域。在其中任何一领域,他也并不打算以传统的姿态来扮演一位学者。相反,正如他与尼采或者斯宾诺莎一同思考,和瓜塔利或帕尔内一同写作那样,他与文学、艺术和电影一同协力创造概念。这种“在此之间”空间的实践构成了走出思维窠臼



的方法。习惯是一种重复的形式,这正如我在第二章所讨论的一样,它平抑着存在与思考的形式。以差异为代价,它通过对同一的重复性肯定,确立存在的模式。任何实践都有陷入惯性重复的风险。不论是对于哲学,还是其他任何学科而言,这点都毋庸置疑。的确,一个学科概念的建立,其基础便是通过某些实践的重复来将它们辨认,并加以确立,从而让它们形成一个轮廓清晰的领域。尽管这无疑是在切实可行的方式,例如用于组织大学或是博物馆,但它却又不可避免地根据某些条条框框划定了这些实践的界限。这便是思考为什么需要在外部发生的原因。考虑到这种对外部重要性的强调,我们可能就无法将德勒兹视作一位纯粹的跨学科学(interdisciplinary)者,因为他根本就是一位前学科的(pre-disciplinary)学者。这并不是说德勒兹将不同的学科视作同一。事实是,倘若果真是这样,它们便再也无法为彼此提供外部。概念就其与具体领域的关系而出现,创造则相异地出现在它们之间。德勒兹强烈地抵制哲学可以超越其客体和实践而存在的想法:“这是众概念的一次实践,”他写道,“对它的判断必须鉴于它所介入的其他实践之上。”<sup>4</sup>

如果说哲学是对概念的创造,那么艺术则创造了知感(percepts)和情动的团块(blocs)。德勒兹与瓜塔利将知感和情动理解为前个体的感觉。知感与感知(perceptions)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们并不依赖于那些感知到它们的人;相似的是,情动也不是绑在个体身上的感受(feelings)或是感情(affections),它是超越个体的。因而,艺术品必须被视作“一种感觉的存在,除此之外,它什么都不是:它存在于自身之中”。<sup>5</sup>那么,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德勒兹在给克罗索斯基的一封信中大肆赞扬一部电影——皮埃尔·祖卡(Pierre Zucca)的《萝蓓特》(Roberte, 1979),他的好友在这部短片中出演了主角——因为它“压抑了感受”(伤感, sentiments),其目的

便是“在它们与感受的根本差异中释放情动的威力”。<sup>6</sup>前个体对德勒兹的哲学而言十分重要，它在艺术和电影中以十分特异的方式出现。德勒兹在书写艺术时便直接涉足前个体平面，他承认，他并未将其当作一种再现的形式，他也不认为它所携带的意义必须为一个感知的主体所认同；相反，他将其视作感觉的团块，它们以超越停滞的存在模式来形成遭际。德勒兹的哲学也因此在本质上成了一种反再现的美学。

在其著作《弗朗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1981年；英文版2005年出版）一书中，通过探索感觉、力、色域（fields）、肉体、形象表达（figurations）、轮廓（contours）、色彩和线条，德勒兹与绘画一同进行思考。培根的作品有助于德勒兹思考：即使形象表达的形式和叙事关系在场（德勒兹通常将这些要素与再现的界限相联系），它们也会阻止一种运动的图画式连接（pictorial ligature of movement）的同步表达。在培根的作品中，这种运动使身体显现

在有机体之下，它使得有机体和其元素要么断裂，要么膨胀，并将一种痉挛强加在它们之上，此外，它还要强行用力让它们产生关联——这些力有时是将它们唤醒的内在之力，有时是穿越它们的外在之力，有时还是一种恒定时间的永恒之力，有时亦可是一种流动时间的诡谲之力。<sup>7</sup>

在德勒兹的描述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与艺术的共同思考是如何关注绘画中的特定因素——轮廓、色彩、线条，与此同时，这种共同思考与一种和哲学更直接相关的兴趣产生了关联，即对表达层面而非再现层面的思考的兴趣。因此，进行一次质疑是有意义的，正如巴迪欧和芭芭拉·卡赞（Barbara Cassin）都在德勒兹《培根》一

书法文版前言中有过同样的疑问：德勒兹是否以大家可能期待的方式，即一种似乎是单一艺术家研究的方法，写了一本“关于”培根的书。“谁，”他们问，“是哲学家，谁又是画家？”通过对这本书发展脉络的思考，他们认为：“一个人无疑可以思索绘画，但这个人也可以绘画思想，其中就包括思想欢欣而暴力的形式，那就是绘画。”<sup>8</sup>

尽管这本关于培根的书（出版于1981年）成了德勒兹研究艺术最为经久不衰的杰作，他的艺术兴趣则更早地显露在另一系列的友谊和实践之中。虽然德勒兹本身从未进行过小说写作、绘画创造抑或电影拍摄（尽管事实上他的确在几部电影中出演过一些小角色<sup>9</sup>），但他与作家、画家和电影创作者的友谊却使得他积极参与他们的实践。例如德勒兹与画家热拉尔·弗罗芒热（Gérard Fromanger）的友谊，便是他随后艺术写作的合作和灵感之源；德勒兹通过范妮结识了这位画家，他极大地影响了德勒兹对绘画的兴趣。对于弗罗芒热是如何绘画的，德勒兹颇为好奇，他也因此频繁造访他的工作室，就其实践不断进行盘问。<sup>10</sup>德勒兹对于绘画的创造性过程的理解有两个重要维度，它们都出自这种交流。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德勒兹于此将绘画理解成一种反再现的艺术。在1973年德勒兹为弗罗芒热所写的一份名为《弗罗芒热：画家与模特》（*Fromanger, le peintre et le modèle*）的展品目录中，他说道：“画家不会通过其作品意指任何东西。”特别是写到关于颜色的时候，他进而声称颜色不会意指任何东西：

绿色不是希望；黄色不是忧伤；红色不是幸福或愉悦。要么浓郁明亮或寡淡冷暗，要么浓郁明亮且寡淡冷暗。艺术便是机器：弗罗芒热作画，也就是说，他知道如何运作他的绘画。一位艺术机工的绘画机器。<sup>11</sup>

造访弗罗芒热工作室收获的第二点领悟随后变得十分关键，关涉德勒兹和瓜塔利就其与哲学整体的关系，如何将创作的过程理论化。在与多斯的一次访谈里，弗罗芒热回忆起德勒兹是如何询问他是怎么在一幅空空如也的画布上作画的。弗罗芒热回应道，这张画布实际上并非空空如也，而是一片漆黑，“上面布满了在我之前所有画家所绘之物”，这样的回答显然让德勒兹兴奋不已，据说他还曾惊叹：“那么这便不是去涂抹画布，而是去将其漂洗。”<sup>12</sup>这份感悟清晰地回响于德勒兹与瓜塔利二十年后所写的《什么是哲学？》之中：

画家不会在一张空无一物的画布上作画，同理，作家也不会空空如也的纸上写作；原因就在于，纸张与画布上都已涂满了早已存在和早已被认可的陈词滥调，因此，将它们抹除、洗净、夷平，甚至是将它们都撕碎，才是第一要务，也只有如此，我们方可在一片紊乱中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sup>13</sup>

正如这条引文中对作家的提及所示，“漂洗”画布原先所有之物的想法不仅可以应用于绘画，同样可以将其应用于其他模式的铭写。的确，再回想一下第一章的内容，即德勒兹是如何对待自己领域的历史，我们便可看到，该方法同样适用于哲学。

那些熟知德勒兹著作的人可能会意识到，这更为笼统地反映了一种德勒兹式本体论。我们的起点不是一无所有；我们的起点是万事万物。的确，七十年代从其画家朋友工作室里所获得的这个想法——漂洗画布——可更为概括地阐明德勒兹关于内在性的哲学。于此通过艺术，差异的形(form)与流(flow)之间的动力学得以表达。正如一名画家的职责是在涂满先前艺术创造的画布上开



辟新的领域一样，哲学家的职责便是在挤满先哲求索的画布上另辟蹊径。诚然，更为笼统说，这便是所谓的生成——它并非介绍一些崭新或是完全超绝的东西，而是对于返回差异的肯定。让我们再次回到培根那本书中，“我们将称作‘事实’的首先是这样一个事实：数种形式可能实际上会被纳入一个并且是相同的形象之中，被缠在某种蛇形曲线中，难分解，好似众多必不可少的意外不断在彼此之上累叠。”<sup>1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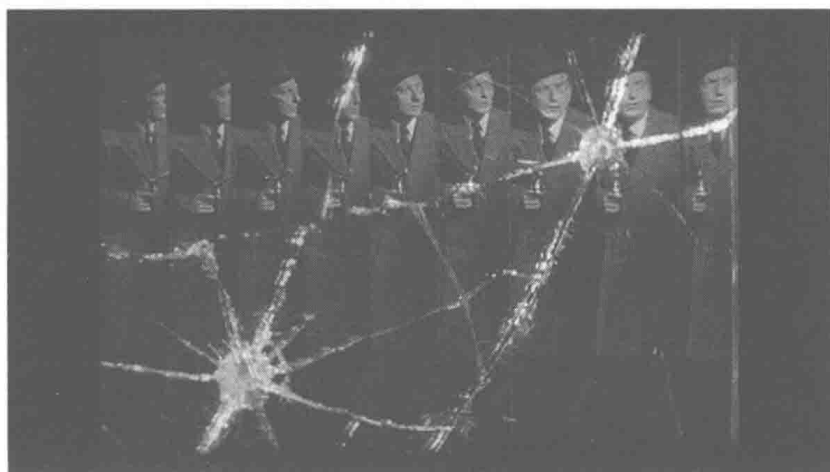
如果说德勒兹投身绘画是一种探索——他探索了颜色、线条和轮廓是如何帮助推进思考以超越再现的，那么，他紧跟在培根那本书之后出版的关于电影的著作，则聚焦于他在电影中所发现的两个最重要的维度。电影同样拥有颜色、线条和轮廓，但除此之外，它还引入了两个额外的参数——运动和时间。德勒兹观察到了电影是如何像艺术一样开辟对其自身的思考。这之所以尤其让人兴趣盎然也是因为，比起绘画、文学或者音乐，电影是一个年轻得多的现象。电影的独特之处——运动的图像——不仅仅是对视觉文化的一场革命，它还是思考方式自身的一种转型。正是因为它还属于历史进程中一个相对崭新的现象，一些对于德勒兹哲学整体而言确实可信的事物，恰可凭借电影得以清晰地表述：我们无法将思考定义为一种抽象的能力，或者更为极端地说，思考在本质上无法被定义为人类的活动。正如克莱尔·科尔布鲁克(Claire Colebrook)所言：

假使我们接受电影的发明与其技术使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思考，那么，我们便要承认，思想是没有其内在本质的。即使是机器，例如照相机的诸多技术性可能，它们可以改变思考的形态。如此一来，思考就并非我们所能一劳永逸定义的事物；



它是一种生成的力量,并且,它的生成能为非思考自身的东西所改变。<sup>15</sup>

在第一本关于电影的书中,《电影 I: 图像-运动》(1983 年;英文版 1986 年),德勒兹系统研究了他所宣称的电影之“生成叙事”(becoming narrative)。他发现,只有在牺牲电影本该具有的其他可能之际,这种发展才得以出现。<sup>16</sup> 运动-图像所呈现的是感知的理性化。图像流按照可辨认的标准逻辑有条不紊地被结成一体。这种逻辑就是德勒兹所称的“感官-运动图式”(sensory-motor schema),它强调我们对因果关系、一致性和真理概念的依赖。这是一个控制调节的过程:通过对图像的一种理性连接以达到对紊乱的控制与调节。感官-运动图式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置于预先设定的固定路线上。尽管这个感官-运动图式是战前电影的特色,但是,这种图式也继续统领着当代主流电影的叙事逻辑。然而德勒兹在第二本关于电影的书——《电影 II: 图像-时间》(1985 年;英文版 1989 年)——中指出,在战后电影中,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对于逻辑和真理的依赖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创。运动-图像所显示的对合理性和可解释性的自信于此被取代——“我们不再知晓该如何对情况进行回应,我们也不再知晓该如何描述我们现在的处境”。<sup>17</sup> 因此,时间-图像应运而生。时间从感官-运动图式的逻辑下被释放,它出现于其自身并且属于自身。德勒兹的灵感源自新现实主义电影,例如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和费德里科·费里尼的电影,同时也受到了一些非意大利导演的影响,例如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他认为这些都与前期的感官-运动逻辑发生了断裂。在时间-图像之中,图像之连接不一定需要附属于运动或动



奥森·威尔斯《上海小姐》(*The Lady from Shanghai*, 1947)中的镜子场景。

作。这种转变让思考出现了新的可能——第二本关于电影的书中出现了大批新的概念，它们也都反映了这些新的思考。

然而，远在德勒兹写完两本关于电影的著作的数年之前，他对电影的兴趣就已萌发。多斯注意到，他常常参与电影杂志《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所组织的电影节与活动，他与杂志编辑之一的让·纳波利(Jean Narboni)建立了一段深厚的友谊，纳波利同时也在万塞纳大学执教。1974年起，德勒兹也投身对电影的公开辩论之中。电影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图像与想法之间的关系，也正是他日后在关于电影的著作中所详尽讨论的内容，而这些早在1976年出版于《电影手册》的一次访谈中就有提及。他说，戈达尔(Godard)有句名言：“不是一个恰好的图像，而恰好是一个图像”(not a just image, just an image)。他认为哲学家也应该以戈达尔的这句话为榜样，继而说道，“不是恰好的想法，而恰好是想法”(not the just ideas, just ideas)。原因在于，他坚信，

恰好的想法总是符合被认可的意义或者是被确立的知  
感，它们总是确认一些事物，即使这些事物还处于遥遥无期的  
未来，即使这个未来属于革命。然而，“恰好是想法”是一种生  
成当下(becoming-present)，一种想法的口吃，并且，只能以问  
题的形式才能被表达，而这些问题又常常挫败任何形式的  
回答。<sup>18</sup>

繁杂的历史形势也让德勒兹得以继续追求其信念，即电影在  
制度层面对哲学十分重要。当德勒兹执教的实验性巴黎第八大学  
于1980年从万塞纳搬到圣丹尼斯之时，哲学系正好毗邻电影系，  
于此大有可能将哲学和电影在具体层面结合。1981年，德勒兹曾  
写信告诉瓜塔利，他如何受到伯格森的影响，还说他们需要参与对  
电影的理论化，他觉得至今为止所存在的说法都太过于平庸。<sup>19</sup>  
1981年，他还就电影开始进行授课，他每周二早晨的电影讲座一直  
持续到了1985年。尽管这没能成为他设想中的与瓜塔利的合作  
项目，尽管关于电影的授课为他糟糕的身体状况带来了比预期更  
多的压力，还让他心驰神往的写作工作一直遭受延宕，<sup>20</sup>通过1983  
年和1985年先后出版的两本关于电影的著作，他本人的确进行了  
另一种标新立异的理论化。对于德勒兹而言，这些明显都是他数  
年通过电影进行的思考。

如果说德勒兹对电影的研究可以因此与其生命中一特殊时段  
相联系的话，那么，他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则零散于其全部著作之  
内。对文学文本更为直接的研究包括：其早期发表于1961年的关  
于萨克-莫索克的论文；关于普鲁斯特的著作，《普鲁斯特与符号》  
(扩展版本再版于1970年和1976年，并于1972年翻译成英文《普  
鲁斯特与符号》，2000年再出版为《普鲁斯特与符号：完整文本》

[*Proust and Signs: The Complete Text*]); 随后又将其早期对萨克-莫索克的扼要研究发展成篇幅更长的《莫索克主义: 冷酷与无情》(*Masochism: Coldness and Cruelty*), 出版于 1967 年; 从 1975 年开始与瓜塔利合著一本关于卡夫卡的书; 于 1979 年和 1992 年分别为剧作家卡尔梅洛·贝内(Carmelo Bene)和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写了数篇长篇论文; 从 1993 年起开始把所写的论文汇编成册, 取名为《批评与临床》(英文版出版于 1997 年)。除此以外, 在他的其他著作中, 使用与涉及文学作品的方式各种各样, 有时还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 最为著名的例子就出自《感觉的逻辑》, 这本书让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在哲学思辨的剧场中成为主角, 此外, 这本书还包括对克罗索斯基、图尼埃和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等作家的解读。<sup>21</sup>

尽管德勒兹以众多不同的方式使用这些作家的作品, 但每次的引用都和生命问题息息相关。对于生命这个概念, 德勒兹是个彻底的生机论者(vitalist), 简要地说, 这意味着, 对他而言生命是一种差异的力。生命无法和决定它的先验原则相分离, 相反, 它必须被看作不同形式持续不断的波动。文学作品表达了生命的众多方式: “风格, 对一位伟大的作家而言,” 他说道, “总是一种生命的风格, 它绝非私人物品, 而是对一种生命之可能的创造, 一种存在的方式。”<sup>22</sup> 真正创造的发生就在于我们弃绝将我们自己表达成人类主体的诱惑, 拒绝去诉说我们俨然熟知的故事。为了能够真正变得具有创造力, 一个作家, 或者一位艺术家, 必须为生命的非有机维度放弃其自身, 也就是说, 生命“在一条画出来的线上, 在一条正在写作的线上, 在一条音乐的线上”。<sup>23</sup> 该种处理文本的方式明显将德勒兹与其同时期的很多文学解读方法区分开来。譬如, 这不仅



圣-莱昂纳尔-德-诺布拉的影院。

与德里达对文本解构的考虑截然不同，而且十分重要，这还有异于精神分析学派的方法。尽管他对将文本置于一个外文本（extra-textual）语境之中饶有兴趣，但是，对于将文本视作关于作者或艺术家的发声症候，他却兴致索然，在他看来，文本应该是直接关乎生命的一个或一系列症候。那么，对于这种特殊形式生命的自我表达，何种力受到了激活，何种力又受到了抑制？

德勒兹关于莫索克主义（masochism，性受虐）的著作之所以值得特别关注，不仅在于它在这个领域的巨大影响力，还在于它组成了其批评与临床计划的开端，它影响了德勒兹随后众多的文学写



作。正如前文所示,在众多学者开始关注萨德的作品时,德勒兹也开始了他的论文写作。关于“冷酷与无情”的论文不仅将注意力引到了关注较少的萨克-莫索克的作品之上——莫索克的作品被看作萨德作品互补性的对立面,同时还在根本上质疑了这种互补性的对立。萨德-莫索克主义(sado-masochism,施虐受虐狂)这个概念自弗洛伊德以来便成了一个固定的理论术语,这个术语在今日仍然存在于众多领域之中,然而,德勒兹却指出,这个概念所依存的基础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他看来,萨德主义和莫索克主义二者在根本上是异质的症候学(symptomatology),将它们混淆依靠的是一种偏见。如果我们回到这些术语缘起的文学计划之中,我们便可证明这些偏见的谬误之处。充分关注萨克-莫索克和萨德的作品便会瓦解萨德-莫索克主义所依赖的辩证法,并反向激发出一种处于运作中的差异机制。通过这种策略,他说,“我们便在质疑一个名为萨德-莫索克主义的整体观念”。<sup>24</sup>在那些对该领域和/或对其实践感兴趣的人看来,《莫索克主义:冷酷与无情》正是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文本,而且并不需要事先获悉关于德勒兹哲学的任何知识。然而,现在还是让我们一起来简要了解一下这个早期文本所给出的几个关键点,我们可以据此更加广泛地了解德勒兹对于文学作品的应用。正如克雷格·兰伯特所总结的,批评和临床计划本质上主要依靠三大原则:1)与临床医师相比,作者有时可以是生命更为杰出的诊断医生;2)作为第一大原则的结果,一些文学作品可产生一种“症候学”,即一系列符号来象征语言、劳动和生命布列中的变化;以及3)作为第二大原则的结果,一些作家可以图示的方法来表达对于这些布列的潜在抵制。<sup>25</sup>按照这些原则来读文学,就涉及了文化、政治以及——我们稍后在下一章节将要来讨论的——生命其自身的问题。

《普鲁斯特与符号》表现出了另一种继续这个项目的方 式。正是由于莫索克主义一直被视作一种临床诊断,对萨克-莫索克的研究更为直接地显现出批评与临床之间的差异;然而,这本关于普鲁斯特的著作则展现出德勒兹是如何更为广泛地将词与症候相联系。对德勒兹而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断裂在表达与世界之间造成了一道错误的分离。这是理解德勒兹批判再现的关键一环。只要我们还囿于再现的统治之内,即以词语简单地再现物,并顺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矢量关系,那么,我们便忽视了词与物之间具有直接效应的事实。事实上,他认为符号“它们没有可作为直接参照物的客体”,但却拥有诸多“身体的状态(感受)与力量的变体(情动)”。<sup>26</sup>换言之,符号直接源自物质:“生物学家可能会找到正确答案,如果他们理解身体自身便已然是一种语言。而语言学家也可能判断正确,他们知晓语言总是身体的语言。每一种症候都是一个词,但前提首先是每个词都要是一种症候。”<sup>27</sup>理解并非去学习物意味着什么,而是去观察它们是如何表达自己的。

我们已经看到,在电影中,时间-图像是如何挑战感官-运动图式中典型的传统感知模式。对德勒兹而言,文学也一样,对于思考的窠臼,它可以去附和,也可以将其瓦解。“写作,”他和帕尔内表示,“非常简单。要么,它是一种将自身再界域化(reterritorializing)的方式,附和支配性的话语法典,从而进入一片界域之内,于其中,各种事物都被建立得井井有条:其中不仅包括了学校和作者,还包括了所有正式写作的人,即使他们所写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要么,“它是一种生成”。<sup>28</sup>鉴于再界域化,文学的创造性潜能面临着三大威胁。首先,与电影中的感官-运动图式并无不同,德勒兹将叙事结构视作表达的潜在压缩,即尽可能将其压缩成对时间性和因果性传统概念的依赖与维系。因此,他常常青睐更具实验性的叙事。

其次,精神分析模式下的再现和阐释为文学招来了风险。如果一个人单单以写作“去记录其记忆和游历,其所爱与所哀,其所梦与所幻”,那么,这个人实际上犯下了一种罪尤——“无论是由于一种过度的想象,还是由于一种过度的现实,这种罪照犯无误”。原因在于,与这种写作同时发生的是:我们仍徘徊于俄狄浦斯式结构之中,而这种结构随后却被投射至实在界(the real)之上。<sup>29</sup>对文学的评估,应该根据它对生命的阻挠或认可的程度来进行。那些将生命困于组织好的模式之中的文学作品,是无法履行文学的任务的,这项任务便是将生命向不具人格性展开。威胁文学创造性潜能的第三点便是,它永远冒着模仿和商品化的风险。在与安托万·杜洛尔(Antoine Dulaure)和帕尔内的一次对话中(出版于1985年),德勒兹认为文学中是存在危机的,因为这个危机正在成为一种为取悦市场而设计好的非生产性的模仿练习。文学之中全无生产性的矛盾,却充斥着“向人们兜售他们所期待的事物;即使这些事物具有‘骇人听闻’‘恬不知耻’‘光怪陆离’等诸如此类的特色,它们却完全迎合了市场期待的样貌”。<sup>30</sup>

另一方面,如果文学生产出一种生成,那么,它就意味着“生成某物,而非生成一位作家,原因就在于,一个人在生成的过程中生成了写作之外的事物”。<sup>31</sup>这便是作为“生命之可能性”<sup>32</sup>的文学,作为“一个正在消失的民族”之发明的文学以及作为健康的文学。<sup>33</sup>对德勒兹而言,生命之可能性的出现便是文学对存在方式的开启,这种方式超越了界域化的结构——所谓正在走失的民族,是因为他们无法于界域化的结构中得到辨认。“健康”也出现于此,其原因在于,即使界域化的结构让生活窒息,但将它们破除却又重新带来了呼吸。能做到这些的文学便是少数文学。纵观德勒兹对文学的写作,少数文学有着一项非显性的功能。在他与瓜塔利的《卡夫

卡：为了一种少数文学》中，它被更为系统地发展成了一个概念。于此，他们勾勒出了少数文学的三大特征：1) 其语言是解域性的，即就其意义和再现而言，它的语言挣脱了传统的桎梏；2) 关乎它的一切都是政治性的；多数文学的焦点在于个体，并让社会仅仅作为背景，而少数文学则直接将个体与政治挂钩；3) 所有事物都具有集体价值；这也与政治相关，因为在支持锻造一种集体意识和感性之际，个体陈述遭到了低调处理。<sup>34</sup>重要的是，我们并不需要去一种小语种或是一个小国之中寻觅一种少数文学——事实上，德勒兹与瓜塔利主要给出的范例之一（除去对卡夫卡的讨论不说）便是美国经典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更为精确地说，一种少数文学缘起于并遵循着解域之线（lines of deterritorialization），这些线真实存在，但在语言和文学的多数“层”之中，遭受镇压；“在[其]自己的语言中变得有些异态”。<sup>35</sup>

即便德勒兹在多篇文章中大幅讨论了他所涉足的艺术、电影和文学，但是，他从未以同样持续的方式为音乐写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音乐对其著作不够重要。它之所以重要，一个主要的方面在于，它是理解艺术与自然界关系的重要一环。<sup>36</sup>叠歌的概念将二者相连。当德勒兹在讨论音乐的时候——主要是在与瓜塔利合著的《千高原》中，他看到，音乐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是如何在依赖叠歌的情况下，又对叠歌进行了解域。德勒兹与瓜塔利于此极大地受到了法国当代作曲家兼鸟类学家奥利维尔·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的启迪，梅西安对谱曲与鸟鸣的兴趣引发了他对节奏与叠歌实验性的谱曲实践。我们也可从德勒兹1983年给克莱芒·罗塞写的一封信中发现，这些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德勒兹写道，罗塞对音乐、鸟鸣和骏马疾驰之间关系的思考让他备受启发，此外，他殷切地期待能够紧跟其后：“如果我们能让骏马与



叠歌一同运作，”他写道，“这将正合我意。它将能给予我所需的一切。”<sup>37</sup>

在任何既定环境中，德勒兹与瓜塔利注意到，有机生物体之间的关系是通过节奏模式得以确立的。的确，在某种意义上，叠歌就是万事万物的开端——伊始于混沌，叠歌或多或少创造出了现存的环境和结构。有机生物体其自身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这些模式形成的。有机生物体和物种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性，因而它们对叠歌的依赖不仅有着不同的方式，就连依赖的程度也彼此相异。叠歌建立起一些界域；旋律，例如鸟鸣，通过对一段叠歌的重复以标记出一个环境(milieu)。某些物种为了其自身的存活依赖于某种特定环境的维持，并且，对它们而言，叠歌的功效便是去安定一个空间性界域。其他物种——例如人类——可能并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去强求一个特定的空间性界域，但是，他们同样也依赖于叠歌，以此来抵御世界的混沌无序。因而，譬如一个在黑暗中孑然无助又惊恐无措的孩子，这个孩子会通过哼鸣来抚定自己，并于一片混沌无序中创造出一丝稳定感。<sup>38</sup>换言之，我们通过这些叠歌创造了安全感。我们避开了差异。正如布坎南所言，叠歌“是我们建造可携带界域的手段(如果我们要得急的话)，在动乱不安的情况下，它能确保我们的安全”。<sup>39</sup>对德勒兹而言，叠歌有助于阐明生命之不同构造是如何被确立的，同样也阐明了一些生命为何比另一些生命要更具连贯性。它向我们展示出构造是如何通过重复来依赖界域化的，故而，它们总是包含了通过解域生成-他者(becoming-other)的潜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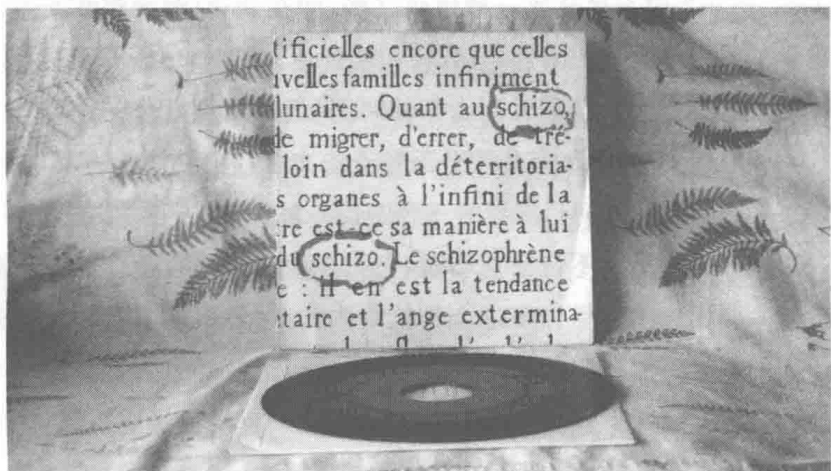
除去将其运用于对自然世界构成的思考，德勒兹与瓜塔利同样也就与音乐的关系讨论叠歌，而此处的音乐，则是按它更为传统的形式进行理解的。正如上文所述，尽管音乐依赖于叠歌作为其组成部分，它同时也是对叠歌的一种潜在解域。与鸟鸣不同，音乐



不再依赖于一种具体的地理性界域,相反,它创造出了一种属于它自己的“构造平面”(plane of composition)。在音乐中,声音的哼鸣与振动从一个特定的界域中被释放,因而生成了某种可以移动的界域。不同的音乐风格与时期,例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通过它们对混乱、环境和界域之间关系的相异构造,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世界。通过音乐,个人和不具人格性的因素相互交织,并创造出构造的不同平面,这些平面是表达性的而非再现性的,它们是独体的而非主体的。<sup>40</sup>在《协商》(1990年出版;英文版1995年出版)一书中,德勒兹描述道,他和瓜塔利是如何试图使叠歌——或迭奏曲(ritornello)——成为他们的关键概念之一,“将其与界域和地球相联系,微妙而又恢宏的迭奏曲”。<sup>41</sup>在脑际绘制其作为实践之哲学的整体之际,音乐便会响起:“我们真的要把哲学、艺术和科学视作一些彼此分离的旋律之线,它们总是相互作用。”<sup>42</sup>德勒兹同样以具体的方式试验了这种相互作用,他曾于1972年跟着他以前的学生兼现在的好友理查德·品纳斯(Richard Pinhas)去了其工作室,伴着理查德的音乐创作朗读尼采的著作。<sup>43</sup>

那么,正如我们所见,德勒兹与艺术、电影、文学和音乐的遭际组成了追求作为实践的哲学的不同方式。不同的表达模式使得不同的生成模式成为可能,此外,它们与众不同的方式也值得关注,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孕育着限制和解放生命的能力。尽管与德勒兹同时代的哲学家也都对艺术感兴趣,但是他接触和处理艺术的方法,却与其同时代沉湎于艺术的其他哲思毫不相同。对此的解释繁多,都能在他私人的、哲学的和专业的倾向里找到。第一个原因就在于,他对哲学家的兴趣并算不上当时的风尚,这一点我在第二章已有说明;这同时也让德勒兹与同时代众多引人入胜的思想背道而驰。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他身边有大批法国和欧洲的

同事投身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分析学说、现象学、语言学和解构运动,尽管他也有贡献出自己对这些领域的见解,但他的著作却未与其中任何一领域相处融洽。事实上,有人认为,德勒兹执着地将焦点放在形而上学的做法甚至可能会震惊到某些人,因为这些人将当代法国和欧陆哲学与“克服”形而上学相联系。<sup>44</sup>



音乐与解域;《旅客/地啄木》(“Le Voyageur/Torcol”),精神分裂症乐队(Schizo)所发行的一张单曲,乐队由理查德·品纳斯于1972年组建。

如果说,德勒兹与当时的当代法国哲学和欧洲哲学的关注焦点有差异,那么,在一种北美语境下,德勒兹同样也难以被划入欧陆哲学的范畴,或成为欧陆哲学日益增长的兴趣。首先,在美国市场,关于哲学史的欧洲著作销路不畅,其中大部分仍未得到译介;此外,德勒兹早期关于诸如康德、斯宾诺莎和尼采等哲学家的写作一直无人问津,很久以后德勒兹才开始流行。第二点也是更为核心的一点,德勒兹与海德格尔和现象学传统保持着距离,史利福特就此点出,这段距离大体解释了,在其他欧洲同侪的作品在北美发迹之际,德勒兹的著作未能随着一同被“挖掘出来”的主要原因,尽

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这个背景之中，欧陆哲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北美对欧陆哲学的兴趣严重地受到了海德格尔著作的影响，故而，北美对于脱离这种传统的欧洲哲学变体往往视而不见。事实上，在当时，海德格尔对法国哲学的影响还是相当有限的，而北美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们给予了其著作和现象学极大的关注，这在当时直接造成一种颀颀之势，即在北美，海德格尔与现象学的另一端便是法国哲学、萨特和德里达。因此，尽管德里达作品的早期英译大致花了五到十年的时间（但其后期著作的移译往往紧跟着法文版发行，有些甚至还先于法文版），史利福特表示，翻译德勒兹所花的时间是前者的三到四倍。对于“法国哲学”的这种一边倒的关注不仅不包括德勒兹（它无视他在法国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同样也不包括许多这个传统之外的其他哲学家。譬如，由于人们很难将福柯的著作归入现象学传统，这便导致美国学界对他的认可姗姗来迟。尽管福柯在当时的法国哲学界影响深远，人们还是到了后期才将他归入欧陆哲学的传统。<sup>45</sup>

在这个时期，对德勒兹著作认可的缺失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自己缺乏去美国周游和工作的兴趣。由于他更愿意“宅”着，在同时代的法国人中，大家都越来越多地去北美游历并涉足北美事务，德勒兹却置身事外。利奥塔、塞尔、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都曾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福柯在八十年代早期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德里达自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便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授课。无论是对于旅行，还是对于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德勒兹都不怎么感兴趣。他的旅行次数屈指可数，他参加的学术会议也算不上多。其中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他的健康问题——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伴有肺部疾病，这

不仅让他很少去旅行,还使得他的精力难以充沛。但是,他也承认,自己老是以健康为缘由推辞旅行,这是生病的一种额外福利。<sup>46</sup>他并不喜欢旅行,觉得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开端,至少它并非一种提升你思考的模式:“旅行便是去其他地方说些什么,然后回到这里说些什么。”此外,至于成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声称他并不是其中之一,因为他并没有现成的思想和观点之储备以供即时之需。他觉得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他正在动笔写的东西,在他动笔写自己所要说的东西之时——即使数年后这个东西消失了,或者他至少又得重新学习这个东西,他才能再次对其进行谈论。<sup>47</sup>这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他一方面相信思想发生于“在此之间”,这已经被反复强调,而另一方面却又抵触旅行和智力交流。然而,德勒兹关乎交流和旅行的想法是建立在为它们腾出空间的想法之上,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动作,恰好相反,是通过清空我们自身内部这些带有目的性的运动。在与帕尔内的一次访谈中,他说道,我们所遭受的并非“任何交流的匮乏,而是各种强迫之力,它们在我们无话可说的时候强迫我们说话”。<sup>48</sup>

德勒兹首次也是唯独的一次北美之旅是由希尔维亚·洛特林格(Sylvère Lotringer)促成的,洛特林格是法国学术界的一名积极分子,同时也是美国《符号文本》杂志(*Semiotext[e]*)的创始编辑,他一直在美国从事着该杂志的编辑工作与符号文本运动。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他便成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工中的一员,洛特林格与符号文本运动积极致力于将法国理论、激进主义与美国先锋文化相结合,在将法国理论融入北美语境的进程中,功不可没。出于对德勒兹与瓜塔利《反俄狄浦斯》的欣赏和敬佩之情,同时也作为瓜塔利偶尔的合作者,洛特林格成功引诱十分不情愿的德勒兹参与“精神分裂文化”大会(“Schizo Culture” conference),洛特林



格于 1975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这次大会，该会议最终大获盛名。这个会议云集了一大批法国理论家，例如德勒兹与瓜塔利、福柯和利奥塔，同时也包括美国的一些作家与音乐家，例如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和约翰·凯奇(John Cage)。尽管该研讨会在向北美读者引介德勒兹的著作上意义重大，弗朗索瓦·库塞(François Cusset)注意到，该活动本身并没有那么成功。无论是德勒兹，还是瓜塔利和福柯，他们与其他与会者和观众的会面总是充满了火药味。观众中有一人指责福柯被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收买了，而作为作家、哲学家兼激进女权主义者的缇-格蕾丝·阿特金森(Ti-Grace Atkinson)则控诉他们都是一群“大男子主义者”(phalocrats)。

由于拒绝进一步参与该活动——“六十年代最后的反文化活动”(有人指出这是福柯说的)，这群法国人发现了另一个指路人，即艺术家兼激进主义分子让-雅克·勒贝尔(Jean-Jacques Lebel)，勒贝尔将他们引向一群反文化诗人、歌手和编辑，例如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鲍勃·迪伦(Bob Dylan)、琼·贝兹(Joan Baez)和劳伦斯·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勒贝尔不仅带他们参加了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的一场音乐会，还带他们会见了黑豹党(the Black Panthers)的成员。<sup>49</sup>然而，在这次短暂的西行之前，德勒兹早就对美国的反文化感兴趣了。尽管他并没有与加利福尼亚的其他法国理论家有实质性的合作(在那里，正如库塞所述，反文化和大学之间的边界在一段时间内显得模糊难辨，因为它们都恰好处于“一个地带，于其中，艺术实验和理论的创意课程彼此共鸣”)，<sup>50</sup>但德勒兹常常提到像金斯伯格、凯奇和巴勒斯这样的人物。正如多斯写道，他的著作，尤其是与瓜塔利的合著，也为反文化艺术家所接受。<sup>51</sup>大体而言，他对美国文学怀有高度评价。



他的生活与著作一大看似自相矛盾的方面就在于，正如我们所见，尽管他自己并不怎么想去旅行，也并未让自己旅行过几次，但是，他赞赏美国文学恰恰是因为其地缘协商：“飞往西边，发现真正的东方是在西边，边界的感觉就像是要穿越某物，往后推，向前越。生成就是地缘的。”为此，他声称，法国并没有与之相当的体验。与盎格鲁-美利坚文学的运动、解域和骤变相比，他认为法国文学“对人类的关注过多、历史的包袱背得过重，无论是对于过去还是对于未来，都显得太过于沉湎其中了”。<sup>52</sup>

与其同时代的法国同事相比，北美对德勒兹接受滞后的另一个相关原因，在库塞看来，是因为这种接受形成于“二十年的误解”。对德勒兹关于普鲁斯特和萨克-莫索克著作的早期翻译，不免让人觉得他身份混杂：他站在一个非传统的文学批评家和一个另类的性学家身份重叠处；对他理论早期且短暂的使用，例如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运用，让他以后现代唯美主义者的身份出现于公众的视野中；左派期刊则扬言他的著作继承了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精神；此外，对《反俄狄浦斯》一书的援引囿于对殖民者和异性恋主体的批判。<sup>53</sup>尽管如此，我们于此还需注意一种对德勒兹著作十分可疑的接受，发起者便是活跃于这个时期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者。我们已经看到，在1975年的精神分裂分析会议上，德勒兹与瓜塔利是如何被观众中满是敌意的女性主义代表所打断的。爱丽丝·贾丁(Alice Jardine)在1984年《次姿》(SubStance)上刊登的《被遗忘的女人：德勒兹与他的兄弟情(异)》(“Woman in Limbo: Deleuze and His Br[others]”)便是该时期学术界女性主义者极其不情愿甚至敌对状态的极佳范例，这篇文章警告女性主义者要对这类思想家的著作敬而远之。

Semiotext(e)  
sponsors a colloquium on

# schizo culture

13-16 november 1975  
columbia university



"One does not desire revolution, desire is revolutionary"  
—G. DELEUZE and F. GUATTARI

"The power to punish is not esse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power to cure or to educate"  
—M. FOUCAULT

Thursday, November 13

2:30 p.m. (Harkness):

Sylvère Lotringer, John Rajchman

*Introduction*

James Fessenden

*Transversality and Style*

7:30 p.m. (Harkness):

Arthur Danto

*Freudian Explanation*

Jean-François Lyotard

*La Force des Faibles*

Friday, November 14

9:30 a.m.

Workshops: Psychiatry and Social Control. — Radical Therapy. — Schizo-City [Harlem]; Cinema: Representation and Energetics. — Ontologico-hysterical theatre.

2:30 p.m. (Harkness):

Robert Finc

*Psychiatry and Materialism*

Joel Kovel

*Therapy in Late Capitalism*

François Péraldi

*A Schizo and the Institution*

Panel with Félix Guattari

8:00 p.m. (S.I.A.):

William Burroughs

*The Impasses of Control*

Michel Foucault

*Nous ne sommes pas Réprimés*

Saturday, November 15

10 a.m. (A-B Law)

Panel on Prisons/Asylums

Judy Clark, Michel Foucault, Robert Michels, David Rothman

2:30 p.m. (A-B Law)

John Cage

*Empty Words*

Gilles Deleuze

*Le Rézone des Signes*

8:00 p.m. (A-B Law)

Ti Grace Atkinson

*The Psyche of Social Movements*

Félix Guattari

*Politique et Signification*

Sunday, November 16

9:30 a.m.

Meetings will be held at the Maison Française of the French Department, 560 W. 113 St.

Workshops: Feminism and Therapy.—Psychoanalysis and Politics.—Gay Liberation—Mental Patients' Liberation

2:30 p.m.

Workshops: Prison Politics — Lincoln Detox. — Mass Culture. — Psychoanalysis and Schizoanalysis

9:00 p.m. (John Jay):

Schizo-Party

Information: Write to Semiotext(e), 522 Philosophy Hall, Columbia University, N.Y.C. 10027

Contribution: Six dollars (students), twelve dollars (others). Checks or money orders payable to Semiotext(e), Inc.

Register early if you wish to receive abstracts in advance. Fee includes a copy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chizo-Culture colloquium in Semiotext(e). Subscriptions to Semiotext(e): \$7.00 (individual), \$12.00 (institution).

大名鼎鼎的“精神分裂文化”大会海报，该会议于197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

在当时,女性终于近乎要获得一个伊始性的主体位置,因此,关于主体之概念所遭受的贬低,在女性主义者之中,一种更为普遍的怀疑态度于该时期内正在理论中萌发。对于要去实现自治和自决的女性主义者而言,看清楚德勒兹式微观政治学(micropolitics)何以给予她们帮助,绝非易事。正如贾丁的文章所示,生成-女人(becoming-woman)这个概念本为瓜塔利的众多概念之一,但后来他和德勒兹一同发展了那个概念,最终,这个概念以极其强烈的挑衅姿态出现。



德勒兹于大瑟尔(Big Sur)海滩,加利福尼亚,1975年。

就核心问题而言,德勒兹与瓜塔利将生成-女人这个概念置于生成过程的伊始处。原因在于,男人总是被置于起始点,并被安置于主体的位置,以此衡量余下事物;故而,所有生成都必须首先经由一个生成-女人的过程。这正是逃离主体主义逻辑的第一步。我们在结论章节便会看到,这个概念和德勒兹哲学中其余生产性

的潜能一样,都可以更为广泛地运用于一个女性主义计划,它们随后都在越来越广的层面上受到了重视。然而,在其首次冲击北美语境之时,人们还是感到惊恐不安。就贾丁看来,生成-女人所带来的不过是又一次尝试,它不仅试图将女人抽象化,还试图“在一片男性构造出来的翻腾汪洋中”捕获女人。<sup>54</sup>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显然也对此深表怀疑,对于德勒兹概念中的另一个核心要素——欲望,她也不予苟同。正如我们随后看到的一样,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一些女性思想家才真正明白德勒兹的哲学在说什么,尤其是罗西·布雷多缇(Rosi Braidotti)和伊丽莎白·格罗希(Elizabeth Grosz)。这也大体是在那时,德勒兹的著作才受到重视并被运用成一种实践的形式,他们积极地与德勒兹进行共同思考,而不是一味去奉承他、诋毁他或是盲从他。

为了理解德勒兹的哲学,我们不仅要认识到实践对于德勒兹哲学的核心性,正如本章我所希冀展现的东西一样,我们也需要在随后任何可能涉足其著作的时候,铭记这个核心。那些从他写作中倾囊而泻的众多观念,看上去似乎是那么简单易用。在关于电影的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分类学的壮志雄心,但它们却很容易于此被简单地运用成一种相当消极且非思考的方法。因此,我们需要牢记,一次实践便是一次活生生的活动,该活动不是一次复制,而是一次创造。一种德勒兹式实践必须基于一种十分不恭的偷窃,这种偷窃行径“绝不是剽窃、复制、效仿抑或依葫芦画瓢。捕获永远是一种双向的捕获,偷窃也永远是一种双向的偷窃,它所创造的不是一些相互的东西,而是一种非对称的团块,一种不平行的演化”。<sup>55</sup>我们永远无法像德勒兹窃走瓜塔利那般窃走德勒兹,然而,我们也许能够发明我们自己的偷窃方式。



## 一种生命

只有有机体会死，生命不会。任何一件艺术品都为生命指出了一条通路，通过断裂找到了一条路。<sup>1</sup>

“我们很难”，劳拉·卡尔(Laura Cull)说，去“想象德勒兹真能忘记他的身体”。<sup>2</sup>二十五六岁的时候，他便饱受呼吸问题的折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艰难击退的肺结核卷土重来，损坏了他的一个肺。尽管在六十年代后期博士答辩前，他还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他还是努力熬过了这场学术的试炼，虽说形式有点简略。之后，他不得不接受一次手术，而这次手术后留下的一个肺和呼吸疾病从此与他余生相伴。<sup>3</sup>在一封致克罗索斯基的信中，德勒兹将这次重大手术称作“器官的一次懦弱挑衅”。<sup>4</sup>我们将会于本章看到，随着德勒兹身体状况的逐年恶化，他便由此发展出了大量与健康、孱弱、疾病和衰竭相关的概念。他与瓜塔利一起发展出了一个关于身体的复杂概念。然而，虽然作为一个被艰难地具体化的哲学家，德勒兹提醒我们注意其哲学中对具体化思想的坚持，但我们还是必须注意到，他从未对这种个人的身体发生过浓烈兴趣。对他而言，有机体拥有某些形式与作用，并依赖某些习性和身份。决定

它的不仅有生物性功能，同时还包括文化、历史和政治的诸多价值，其中最为核心的价值正是它自身所具有的俄狄浦斯关系。就最为传统的意义而言，这个身体对一种实际上的强烈欲望-生产 (desiring-production) 实现了一种超编码，而这种欲望-生产的连接作用超越了社会和习性的决定性。这种强烈的连接性是“无器官身体”(the “body-without-organs”) 上的一种运动，强度的沉浮俯仰；这正是生命其自身，它绝不受现有形式所囿，不论这种形式是哲学的、精神分析学的、社会的抑或政治的。它就是一种内在性，一种生命。<sup>5</sup>

“一种生命”这个概念，将德勒兹哲学中最为核心的宗旨汇聚一团。这是一种具有自己肌理的概念，这种肌理反过来强调他的其他所有概念。“生命不是你的历史”，德勒兹与克莱尔·帕尔内写道，生命是魅力。这种魅力展露于独一无二且转瞬即逝的组合之中。我们已然知晓，德勒兹的生命见证了这些组合与它们各式各样的组成成分——个体化、友谊、文学、艺术：“通过每一种孱弱的组合，一种生命的权力得到了认可。”<sup>6</sup>这便是哲学为什么对德勒兹与瓜塔利而言必须是一种实践的原因，并且它还必须以众概念的创造为中心。随着差异慢慢减速，直到它趋于同一，内部与外部的差别便由此产生；但是，倘若我们接受这些封闭的构造，即接受同一性之可能，我们便无法让自己看到生命中差异的动力学。在某种程度上，一个概念可以捕获并且帮助分析生命的某种构造，但是，我们如果继续粘着相同的概念不放，那么，我们所假定的结果便是：这些构造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在否定生命善于表现的本质。这一点进一步说明了德勒兹的哲学学徒期，第二章就对此有所讨论。即使早期的哲学家可能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有着他们自己的“道理”，但想要使他们的著作重新散发活力，还是得通过生成

能动(becoming active)。它也更好地阐释了德勒兹关于友谊和实践的哲学,我们也已经看到,德勒兹是如何再次将生命向差异敞开,以此来撼动他自己与他人脚下俨然夯实的地基。

要有创造力,生命就需要变得能动起来,也就是说,它不仅需要将其自身从克分子构架中解放出来,例如像主体或作家这样的概念,同时,它还要将自身从所有的反动力中解放出来,正是这种力将它捆在现有的结构之内。于此,德勒兹所讨论的基础正是尼采关于能动力与反动力的区分,并且在两者持续的斡旋中,德勒兹也琢磨出了生命的诸多形式是如何初现端倪的。能动力是决定性的,故而,反动力对其而言注定是一种回应。这就意味着,前者有权创造新的联系,可后者只有回应这些已然被界定好的关联的权力,即去否定、去肯定或去调整。能动力是对差异的一种肯定,而反动力却仅仅是去肯定或否定它所认可的东西,如此一来,它将限制和束缚强加于能动力即生命之上。<sup>7</sup>就他看来,问题在于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做的已经足够了,而此时,我们对于一个有机体的理解,却总是基于反动力来展开的”。<sup>8</sup>德勒兹对于哲学、文学、艺术和电影的兴趣,基于它们超越生命再现的程度;也就是说,它们能表现一种能动力的程度,这种能动力所做的远非仅仅对相同的事物进行肯定或否定。对德勒兹而言,这种肯定和差异的策略可应用于生命的所有层面,包括他自己的哲学实践。我们是强大的,他给瓜塔利写道,因为我们并没有将我们的著作建立在“反”(being anti)之上,而是将其建立于一个积极的概念里。<sup>9</sup>

因此,德勒兹对于“反”与富有争议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耐心,原因就在于,它们根本无法创造出新的事物;德勒兹反倒对大笑和幽默更加充满信心,他坚信这些正是生命的伟大之力。幽默的肯定力就在于,它容许自我和真理的不确定性。“一位伟大的作家,”

他在谈论普鲁斯特时说道，“常常喜笑颜开。”<sup>10</sup>与反讽不同——它居于个体和同一性的逻辑之内，幽默与悬置意义的胡话享有同样的界域。它为一种实验开辟了空间，如果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那么这种实验肯定就要泡汤了。<sup>11</sup>大笑，是幽默在肉体上的示例，它之所以重要，还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欢愉的具体表达，但这种表达却是不具人格的。我们早已见过，在德勒兹与福柯友谊的语境中，大笑如何一再被唤起。我们也注意到，德勒兹自己的大笑又是如何留存于德里达的记忆之中的。同样，大笑作为一再重现的特征，不仅是德勒兹写作的一项参考，而且也是其众多友谊中的一部分，至少，它的频繁出现不仅仅局限于他与帕尔内的对话中。<sup>12</sup>除去那种由反动式回应所引发的会心一笑和讥笑，大笑有助于促成一种肯定且积极的模式参与思考。这不是因为应该轻视哲学，而是哲学家应该轻视自己；他们必须容忍错误，容忍胡言乱语，容忍实验的开放性。大笑的重要性得到了德勒兹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限于他与同时代哲学家和朋友的关系之中，例如福柯与帕尔内，同时，正如斯蒂瓦尔所说，他还将这种大笑的重要性拓展到了与早期作家和思想家的关系之中，如普鲁斯特、斯宾诺莎，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可能要数尼采了。后者强调大笑的重要性，他警告那些“不苟言笑”的人，并驱策“超人”（the Higher Man）去“学会——开口大笑！”<sup>13</sup>对德勒兹而言，笑“出你自己”和舞“出你自己”正是朝着诸多生命之力敞开你自己，而这些生命之力扰乱着反动的结构。大笑和这种实验有着一种亲密而决定性的肉体关系，同样，写作和艺术也保持着这种关系，因为它们所引发的情动反应也超越了主体在理性层面所接受的事物。

对德勒兹来说，生命内这种肉体的维度是一种能动力，它与大笑紧密相连，同时，也为疾病和健康所唤起。生命为一组对子相



连：身体羸弱与“身体健硕”，它们看似彼此水火不容，实则相辅相成。尽管思想家大多都为健康问题所扰，但是他们还是“将生命引向了绝对权力的状态”。<sup>14</sup>在身体健硕之中，神经官能症毫无立足之地——“我”，德勒兹在给维拉尼的一封信中写道，“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无论是对于任何一种生命的抱恙，还是对于任何一种悲剧性文化，我都深深感到厌恶不已。”<sup>15</sup>尼采正是一个极佳的范例，作为一名思想家，尽管他饱受健康问题的摧残，但他还是活得生机勃勃。<sup>16</sup>在《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中，尼采也将此概念化，他将“身体健硕”描述为“一种新的健康，这种健康要更为有力、更为老练、更加坚不可摧、更加勇猛无畏，并且更加令人心旷神怡”。<sup>17</sup>在法国女歌唱家伊迪丝·琵雅芙(Edith Piaf)身上，德勒兹找到了另一个孱弱和健硕相结合的例子。德勒兹十分崇拜琵雅芙，他描述道，即使她本人处于崩溃的状态，她的歌唱依旧携着一种生产性的失衡，微微调拨起一些不着调的音符，她便能让一切重新运转起来。<sup>18</sup>对德勒兹而言，这便是一种最佳的状态。只要你让崩溃自己言说，而不让你的想法去言说它们，那么，创造性便会从这种崩溃中油然而生。“写作用不着你的自我，用不着你的记忆，同样，也用不着你的疾病，”他写道，“在写作的行为中，人们尝试让生命超越私人的维度，尝试将生命从禁锢它的东西中解放出去。”<sup>19</sup>正如德勒兹的哲学著作所示，他并没有携着他的疾病去写作，但其写作却带着逐渐显现出来的一种对于生命和健康的追求，这种追求的发迹不在于个人的层面，而在于思考的层面。对他来说，健康不仅超越了其定势以将生命敞开，还创造了“一个无处可寻的民族”。

一方面，从个体之“优势性和实质性”的意义来说，健康可能甚至会阻碍与生命的遭际，这类遭际本应经由一种纤弱的健康成为可能。<sup>20</sup>正是通过迫使我们去质疑自己的惯性存在、去质疑对自身和



身体的惯性思考，譬如通过疾病，这些惯性才得以如此精确地被暴露出来。用不着对疾病这个概念进行浪漫化——事实也的确如此，德勒兹长期且日益严重的痛苦直接驳倒了这种念头——在某方面，它的确构成了一种身体间关系的挑战，于此，这种理解应该在人类和非人类实体之更广的意义层面展开。<sup>21</sup>在德勒兹看来，对身体健硕最为重要的能动力的肯定，必定意味着放弃一些反动的观念，即一个有机体是由什么组成的。将生命从禁锢它的事物中释放出来，这在大体上是关于辨认和肯定我们“自我”的这些方面，这是一个暂时不得不用括号括起来的术语，因为它必须在这个过程中被重塑。对德勒兹而言，这便是生机论，他也许会将其认作唯一一个最为重要的主题，因为它联合了他的前辈们：斯宾诺莎、尼采和柏格森。生机论是对生命之能动力的一种肯定，因为它并非总是以我们所熟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于此，身份便成了一个死胡同：

我们必须对以下这些人进行驳斥，他们在想“我是这个，我是那个”；并且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即将一切都与他们的童年和命运挂钩），他们通过古怪、善变而另类的方式进行思考：我并不知道我是什么——我有一大堆事物等着研究和实验，而且我还必须以一种非自恋和非俄狄浦斯的方式进行——没有任何一个同性恋会说“我是同性恋”。问题并不在于成为这种或者那种人，相反，问题在于生成非人，在于一种普遍的动物生成——这不是要你将自己视作某种哑巴动物，而是要求你去解开你身体的人形构造，要求你去探索身体之强度的这个或那个区域，大家都能发现自己的特殊区域，发现栖息于他们之内的群体、人口与物种。<sup>22</sup>

德勒兹努力接近生命而又免于陷入反动结构的方法之一，便是乐于使用动词，尤其是对不及物形式的使用。对于个人性和存在的稳定性，动词从不理睬，与此同时，动词强调所有事物固有的非人格性和生成性。在这种形式中，生命被表达成运动。开口大笑、翩翩起舞、款款而至——不及物动词指向一个事件，但却从不将其成分归化于一个主体或其动作。在《感觉的逻辑》中，他就《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动词的重要性做了十分著名的分析。专有名称维系着一种对固化个人身份的幻象，但是，爱丽丝却为“动词一扫而空”，从而步入纯粹的生成之境。现在遭到了回避，并代之以一个无论是与过去还是与未来都无稳定联系的过程——“‘哪条路，哪条路？’爱丽丝问道，她意识到那条路总是同时朝向两个方向。”<sup>23</sup>这正是德勒兹理解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之间关系的方式。<sup>24</sup>一方面是身体、物理实体、“事态”——德勒兹所谓的实际性(the actual)；而另一方面是一个非肉体的层面，包括这些事态所产生的非人格效应和潜能，即他所谓的虚拟性(the virtual)。生成的这两个维度可归属于两种不同的时间性——克罗诺斯(Chronos)，现在的具体化时间，以及艾翁(Aion)，而他恰好超越了过去与未来：

如果诸如“去死”“去爱”“去动”“去笑”这类不定式都是事件，那么，这是因为它们之中有一部分还未被彻底完成，其自身就有一种生成，它一直在等着我们，一直先于我们。<sup>25</sup>

处于不定式之中的动词强调的并不是我们该如何处理主体和动作，相反，这些动词强调一种处于虚拟性和实际性之间的可交替性——一种褶皱，我们又得回到一个先前使用过的概念。与其说是一个舞动的身体，毋宁说是一种正在舞动的身体生成舞蹈。通

过事件，它进入了一种生成，一种虚拟性的实际化。这便是事件。

在该语境中，我们也许还得仔细思考“去呼吸”这个动词。卡尔曾指出，倘若有人意识到，自己的每一呼每一吸都实属一次次的挣扎，那么，这个人便有可能以一种迥异的视角来看待德勒兹著作中诸多对空气的指涉。通过将一些哲学家或一些事件描述为一股新鲜空气，<sup>26</sup>对德勒兹而言，这里的隐喻就成了一种字面上的意义。这在德勒兹的哲学语境中也将是意义非凡的，也就是说，象征意义和字面意义之间的转换组成了一种隐喻，而这种隐喻基本上又无法与德勒兹的思想兼容，其原因在于（也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一样），他将所有表达视作生命的直接表达。<sup>27</sup>尽管我们必然无从知晓德勒兹是如何理解他自己的身体的，但是，鉴于他的事件哲学，我们似乎也能够去思考他的疾病，同理，鉴于“去呼吸”与生命和身体的密切联系，我们也将这个动词思考成一个特殊的动词类别。去呼吸，这可能是最为亲密的躯体动作，然而，与此同时，它也是所有动作中最不具有人格性的，它不仅是生命的地基，还是一种生命的前提。这便是说，“去呼吸”直接与非人格性生命进行对话，而这种生命的存在，在德勒兹看来，是所有动作的一个虚拟维度，其中包括那些可能看似更为自主的动作。处于纯粹形式中的生命——“一种生命”——正是这个虚拟维度上的众多情动与感知，此外，个体化便是对实际时间内该维度之众要素的组织。<sup>28</sup>纵观其一生，德勒兹不得不与一种生活方式斗争，于这种生活方式之中，最为非人格性的行动从未自然而然地出现过。挣扎着去呼吸就意味着敏锐地意识到呼吸——这不再是一种非人格的行为，而成了一种高度自知的行为。与其说它通过不断被实际化——去呼吸——以汇聚众多虚拟之力，从而生成一种生命；不如说它是通过发生（taking place）以力求联系生命，应运生成的一种生命。

一方面,德勒兹将年老和体衰描述为对他和其计划有益的事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与帕尔内的电视讨论中,德勒兹当时已经六十好几了,他表现出年老带来的一种宽慰感。虽说会有些行动不便,但他还是感觉到年老是一种极好的状态,因为它会将你从期望、束缚、计划和失望中解脱出来,而这些东西恰恰又都是年少的特质。它们放过了你,你也让它们随风而逝。你最终能有机会仅仅存在(to just be)——而不是作为这个或那个而存在。<sup>29</sup>就其生成哲学来看,这种对于存在的强调似乎可能有些自相矛盾,然而,如果我们将其放入它自身的语境之中,我们反倒可以将它视作一种表达方法,它表达了一种存在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从那些还不那么老的人更为具体的轨道之中释放而来的。另一方面,随着德勒兹的衰老,疾病对他继续进行研究所需的体力和心力之损耗不断加重:“我的健康正每况愈下,”他在1992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它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让我的呼吸总是那么艰难:你能想象它是如何改变这一切的,其中也包括了我的研究。”<sup>30</sup>尽管他患病已经几十年了,可他的状况现在却恶化得越来越快,以至于最终,他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被迫跟一个氧气箱连在一起——“就像只狗”。<sup>31</sup>

瓜塔利逝世于1992年,德勒兹当时因为病重而无法出席他的葬礼。为了纪念瓜塔利,多斯描述道,他们共同的朋友、艺术家让·雅克·勒贝尔(他曾随他们一同去过美国)利用瓜塔利的旧车做了一座雕塑。瓜塔利生前一度为汽车着迷,勒贝尔所铸的汽车雕塑之组成包括迷幻菇、播放瓜塔利声音的扩音器以及一个任由人们投放信息的狭槽。在这个雕塑上,他还设计了大量氧气管来代表德勒兹。德勒兹十分开心,勒贝尔回忆道,因为这位艺术家将这些该死的管子都进行了“形变”。<sup>32</sup> 在生与死之间,生命再次胜出,即便



只是一刻荣光。然而，即使是带着这些该死的管子，德勒兹的呼吸还是变得越来越困难，此外，他还不断遭受着阵阵哮喘。在多斯的传记中，他记录下了好几段德勒兹好友的回忆，他们都谈及其处境有多么可怖。他们都讲述道，在德勒兹去世前的这段日子里，他是如何试图给好友们打电话，而这些通话又是如何被他的呼吸困难所阻断。这些讲述恰好印证了其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诸如“我呼吸很困难”这类的声明显示了其疾病的冷酷无情，这同时也可能在他身上突显出了某种斯多葛主义。事实如此，他的一位朋友伊夫·马班·谢纳维埃尔(Yves Mabin Chennevière)目睹了他走向生命的尽头，谢纳维埃尔说，这都多亏了他超出常人的勇气，他才坚持了这么久。<sup>33</sup>



从左至右：霍匹·勒贝尔(Hopi Lebel)、让-雅克·勒贝尔、瓜塔利、德勒兹与范妮，巴黎，1990年。



继续进行研究和写作变得出奇艰难，德勒兹也是越来越沮丧不振。多斯表示，比起身体所带来的苦难，无力继续研究要更为糟糕。<sup>34</sup>对德勒兹来说，能够继续进行研究似乎比他的健康更为重要，在他与帕尔内的一次访谈中，谈及他以前酗酒的陋习时，他就是这么说的。于此，他承认他曾经喝得有点多——非常多。他说，如果要是有什么可以使有损健康的陋习正当化的话，例如酗酒和吸毒，那便是：它们是否有利于你的工作和研究。相反，他也看到了这些陋习中潜藏的实际危害，正如它们可能妨碍你的工作和研究。尽管他说自己不得不为了健康着想而远离酒水，但是，他说自己真正的戒酒始于一种意识，即酒实际上让他失去了工作的兴趣。他本以为酗酒可以帮助他创造概念——“这真是古怪！”——直到他意识到酗酒使他丧失了研究的动力。正是于此，他才萌发需要戒酒的想法。<sup>35</sup>也正是这种能够继续进行研究的能力，他将它作为坚持活下去的原因交付给了沙特莱。由于和这位哲学家好友有着相同的经历，两人都罹患严重的呼吸问题，沙特莱在经历过一次严重的肺癌手术和气管切开后，也不得不靠氧气机才能存活，德勒兹鼓励他的挚友坚强地活下去，只要他还能进行创作和研究：“只要你还能拿起一支笔，”沙特莱的夫人诺艾尔(Noëlle)回忆起他的话，“你就能继续活下去。”<sup>36</sup>写作便是继续活着的一种方式，也是继续活下去的一个原因。鉴于此，我们可知，德勒兹日益艰难化的写作必将严重损害他的生命力。事实上，他一开始的写作便受到了疾病的困扰，他又如何能够企及发明和创造的“身体健硕”？“我继续着《什么是哲学？》的定稿工作，”他在1990年致让-克莱·马丁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并不像一只灵鸟，而更像一头傻驴，不断抽打着自己。”<sup>37</sup>

在1992年发表的那篇关于贝克特的论文中，德勒兹讨论了疲

惫和力竭之间的差异,这就如同未意识到一种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一直存在,休息一阵后便能重新发现)与实际上已然竭尽这种可能性之间的差异一般:“疲惫的人无法再现实化(realize),而力竭的人则无法再可能化(possibilize)。”<sup>38</sup>通过他自己的著作对他进行阅读,人们可以想象,虽然疲惫总是出现在他的生命之中,但这份疲惫却一直被一种生机论哲学打回,该哲学不仅提出了一种典范,而且还以身作则,它正是一种强有力的创造力与现实化的结果。现实化不断重现。然而,一旦无法继续追寻这种力,那么,针对疲惫与现实化,也就没有什么好抵制的了——故而也不用针对可能化去谈些什么了:“他是否会因为自己力竭了,所以竭尽了可能性;或者因为他已然竭尽了可能性,所以他陷入了力竭?”<sup>39</sup>精疲力竭(exhaustion),德勒兹于同一篇论文中写道,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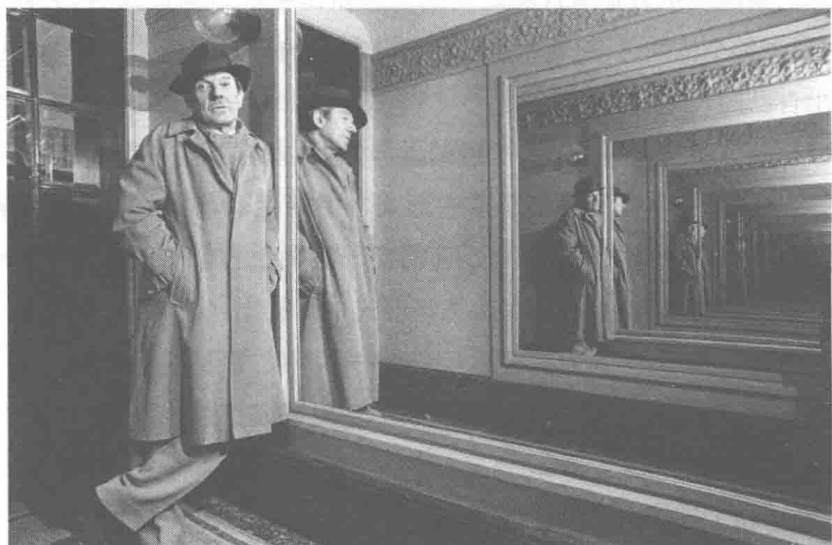
最为可怖的位置,于其中去等死:就那样坐着,既站不起来,也躺不下去,死死地盯着信号,它示意让我们最后起立一次,然后永远地躺下。<sup>40</sup>

1996年11月4日,德勒兹在其巴黎的公寓内跳窗自杀了。对此,人们都不禁诧异,为重病所累的德勒兹如何才能将自己移到窗边跳下去。对于见证了其煎熬的挚友而言,德勒兹的死并非完全意外之事。通往生命的尽头,德勒兹不仅遭受着呼吸困难和言语障碍,他还眼睁睁地看着沙特莱因其肺部疾病而不断遭受煎熬,直至其与世长辞,这段经历不断萦绕在他脑际。德勒兹不想像老友一样经历这种煎熬,这阐明了他自杀的缘故。<sup>41</sup>但也有许多人指出,自杀似乎与德勒兹高举的生命哲学相去天渊。然而,该行为特别明晰地铭刻在这种哲学之中。在《差异与重复》中,德勒兹就直接

讨论过死亡与自然的问题，他坚持认为死亡具有两面性。有一种外在而无法回避的力抵消了“外延的巨大差异”，也就是说，这种力摧毁了构造独特有机体之生命的众多差异。但也有一种内在的力，它“从困于我之形式(the form of the I)或者囿于自我之物质(the matter of the self)中释放出个体化的元素”。自杀，他声称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尝试，它无法让这两面性相遇：它“在一个整体的系统之中为我与自我之间的差异做出弥补”，与此同时，它还是“一种个体的抗议，这种抗议在自我与我的界限之内是无法辨认出自己的”。<sup>42</sup>

这里所强调的是一种关键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种类上的，而是形式上的，它处于受禁于某些形式之中的生命与从该类形式中解放出来的生命之间。原来反复贯穿于德勒兹哲学中非人格性和特异性的核心，作为一种对从某些形式中解放出来的肯定，于此再次出现。此外，受到强调的还有生命中诸多强力且独特的形式，这些形式都由个体暂时性的形式产生。在对待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自杀的问题上，德勒兹坚持认为，莱维“的自杀是个人的”，因此，这在个体的生命和通过其写作释放出来的生命力与生命阻力之间划出了一道界限。<sup>43</sup>假使我们就德勒兹的遗赠来使用这种方法，我们便承认了其哲学具有特异性和非人格性。他自己可能早已竭尽了可能性。在他的哲学中，可能与潜能的意义迥异。尽管可能性依旧与克罗诺斯相关——与实际性的领域息息相关——这是因为，它建立于我们对现在之后下一步想象的可能之上；然而，潜能则存在于虚拟性的领域之中。尚未力竭的人可以实现可能化，但却永远都无法潜能化。将生命向其潜能敞开并不是去想象下一步可能是什么，而是朝着事件敞开——降临于我们之上的事件，它们源自一个可感知的领域，而不是生命自身。“个人的”自

杀：对德勒兹这个个体而言，这也是一种于克罗诺斯之中的可能性行为。然而，心中铭记着死亡的双面性，德勒兹之死可能也应该被视作“一种死亡”(a death)——对一种具体的配置的撤销，这也是一种向潜能敞开的配置，而他此时却是如此地力竭，以至于失去了个体想象这种潜能的能力。德勒兹于11月10日葬于他挚爱的利穆赞区的圣-莱奥纳尔-德-诺布拉的一块新墓之中。



德勒兹，永无止境。

在那之前——即11月7日，德勒兹逝世后仅仅数日——法国《解放报》(*Libération*)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哲学家们的告别》(“L’adieu des philosophes”)的文章，一大批当代哲学家都于此向德勒兹道别。<sup>44</sup>今日，我们停下手边的一切，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写道，一齐来聆听德勒兹所称的“绝对解域”(absolute deterritorialization)。然而，一回忆起德勒兹著作中生产的核心重要性，“明日，我们还将继续工作”。<sup>45</sup>在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利奥塔写



道,德勒兹却曾是一种肯定。“谈及他,我为什么要用过去时,”扪心自问后,利奥塔试图从德勒兹的角度做出回答,“这正是你愚蠢的悲痛。”<sup>46</sup>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回忆到他曾于1987年上过德勒兹的一堂课,课上,他谈论的主题是自身享受:“这并非要成为自身的少量愉悦”而是“一种对存在的沉思所产生的喜悦与无邪的自信,它将一直持续,倘若没了它,我们的心脏将停止跳动”。<sup>47</sup>在所有这些悼词中,德里达的悼文引用次数最多,在涉及更广泛层面的哀悼理论时,它也受到了频繁的援引。“我怀着千言万语,”他写道,“渴望去诉说德勒兹与我,以及与我同‘代’的其他众人所共度的良辰佳期,我想以千言万语去诉说由他所带来的际遇:多亏了他,我们才能在想起他的同时邂逅思考。”<sup>48</sup>从这些哲学家的话语中流露出来的尊敬显而易见,但在他们极大的敬意之外,我们还得注意德勒兹所理论化的死亡的两面性如何在他们的永别之词中回荡:将个人性——这种十分特别的魅力即德勒兹其人——与其著作中的非人格之品质的重要性相结合,将伴随其死亡而至的巨大损失之意义与生命之急迫和肯定之意义相结合。

恰好是在他生命最后也是最为艰难的时期,德勒兹写了一篇名为《内在性:一种生命》(“Immanence: A Life”)(1995年英文版;2007年法文版,“L’Immanence: une vie”)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的时期似乎也恰到好处。正是由于这篇文章发表于他自杀的同年——正如约翰·赖赫曼(John Rajchman)所言,它写成“于他自己死亡前夕的一段奇异间隙中”——这篇文章时而会被视作某种意义上的遗嘱。<sup>49</sup>于此,德勒兹再次强调生命的非人格本质。“一种生命是无处不在的,”他写道,“它存在于一个确定的、活生生的主体所经历的所有时刻之内,并且,这些时刻都要经由确定的、曾经活过的客体所估量:一种内在的生命,它自身就负载着众多的事件或



特异性,而这些事件与特异性唯独在诸多主体和客体的内部才能被实际化。”<sup>50</sup> 鉴于生命的这个概念,我们能以此来回顾勾勒于这本传记之中的生命,我们也许能够将德勒兹的私人历史视作对诸多事件和特异性的一种“负载”(carrying)。我们可以好好端详德勒兹途径的那些“时刻”以及该旅途中发生的那些实际化的结果。或许,我们也能将其生命和著作视为一个巴洛克式褶子,其表面上的弯曲和扭转罢黜了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认同。德勒兹,正如众人已然证明并继续力图证明的那样,的确确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然而,如果说我希冀这本传记传达了什么的话,我希望是如下这件事:他的生命与其著作发生于一系列折叠和展开之中,但他不会愿意去宣称这些折叠和展开纯粹都是他自己的,不愿让它们都被一个专有名称的庇护所囚禁。

## 结 论

然而，魅力并非其人。它将对人的领悟分化为众多组合和众多独一无二的机遇，而这种组合恰恰源自各个机遇之中。<sup>1</sup>

我们受到了诱惑，南希在他的悼词中写道，身陷哀伤且心怀敬仰的我们，受到唆使要将德勒兹置“于一个凝固的框架之内”。<sup>2</sup>然而，南希承认这正是我们务必要抵制的一种诱惑。<sup>3</sup>无论是让德勒兹的思考静止不动，还是将其隶属于他长期以来力图挣脱的惯性重复，抑或是将其划归入他致力推翻的哲学史之列，这些行为都缺乏敬意。了解德勒兹开启了我们的启蒙之旅，我们不妨效仿他利用起哲学史中的典型人物，即在开始创造自己的风景画之前，我们可以先多花点时间去绘制肖像画。但正如德勒兹在其好友弗罗芒热的帮助下获得的启示一样，我们最终还是要认识到，真正的创造性有赖于一种认识，那就是，画布上已然满是涂层，从而认识到，我们的职责便是与这些涂层共同作画，试图让它们进行自我的差异性表达。德勒兹正是一幅风景画。游览这幅风景画的方式之一便是绘制地图(mapping)。德勒兹与瓜塔利十分喜欢地图：“去绘张地图吧，不要只做个标记(a tracing)”，他们写道，他们的意思是，标

记是一种更为消极被动的仿制形式，与之不同的是地图的绘制，它包含了一种创造性过程。一个标记仅仅再现了构成某物之所是（what is）的某些看似稳定的特性，一幅地图的绘制则是一种朝向诸多瞬息万变和虚拟无实的维度的敞开，而这些总是事物的一部分。绘制一张地图就是一次充满可能和实验的实践，连接性就居于其间。<sup>4</sup>正如我们所见，德勒兹的大多数哲学都围绕着这种连接性和其允诺生命重现的诸多方式。他不断地在敞开心窗，努力留出更多的空间给新鲜空气，这些让人焕然一新的空气重新燃起了那些威胁要变得停滞和消极的东西。

德勒兹给维拉尼的意见正是与此相关的一个实例，作为德勒兹的学生，维拉尼希望德勒兹能够指导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德勒兹一方面表示，如果维拉尼想要写他的话，他会很高兴，但与此同时，他也警告这位学生不要太过于沉溺于他的著作之中：

想要成为某人的弟子，这类人我是见多了。他们原本与自己的师傅一般天资聪颖，但最终却因为这种师徒关系而变得碌碌无为。真是令人唏嘘不已啊。要研究我存在着两大弊病：它无法在你的学术生涯中推波助澜，这一点也许还不是最根本的，但还是比较重要；然而，最重要的是，你得让你自己的作品充满哲思与诗意，它决不能为我的作品和思想所束缚。<sup>5</sup>

他于此所说的这一大段话的意思是，绝不能存在德勒兹主义者（Deleuzians）。诚然，“没有什么德勒兹主义者，”康斯坦丁·V. 邦达斯（Constantin V. Boundas）坚持这种观点，“有的仅是使用德勒兹式团块和德勒兹式转换对角线（diagonal lines of transformation）的人，他们使用的目的是为了在哲学中创造概念，在艺术中创造感

觉,并在伦理和政治之中创造生存的模式,而这些东西并不一定(有时根本不)属于德勒兹。”<sup>6</sup>

人们可能会觉得这项工作没有什么难度——相比成为一名更为恪尽职守追随并附和师父思想的弟子而言,这项工作要显得更为简单——但事实证明,它对很多人而言恰是一种挑战,他们紧随德勒兹而来,只寻得一条研究德勒兹的创造性道路,即以一种虔诚的方式亵渎德勒兹的哲学。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见,于其一生,德勒兹的名气在法国以外的地方远远不及其侪辈;然而,在步入新千年之后,其著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尤其是在英语学术界。虽然说对德里达、福柯和利奥塔的引用可能依旧要比德勒兹更为广泛,但是艾丽·杜凌(Elie Doring)注意到,新千年一开始,“在学术界和更为广阔的领域里,德勒兹的地位不断提高”。<sup>7</sup>事实上,今日对德勒兹的学术兴趣远远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可以想象的了,正如我们所见,在那个时候,德里达、福柯和利奥塔早已流传于美国的大学校园,而德勒兹的英文译介才刚刚开始。除了早些时候对两本著作的翻译,即1971年将《萨克-莫索克的阐释》(*Présentation de Sacher-Masoch*)翻译成《莫索克主义:对冷酷与无情的一种阐释》(*Masochism: An Interpretation of Coldness and Cruelty*)和1972年所翻译的《普鲁斯特与符号》,此后,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他的杰作方才流转于全世界的英语语言地区。八十年代末尾和随后的十年继而见证了德勒兹著作英译的迅猛发展。

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与二十一世纪头十年里,我们在英文语境下看到了对德勒兹前所未有的兴趣。为了获得更多的批评群体,一开始邦达斯做了部分努力(他不仅翻译了德勒兹的著作,还于1992年在特伦特大学[Trent University]组织了第一届国际德



勒兹大会)。从那时到现在,德勒兹批评研究呈爆炸式增长。除去受其著作启发和基于其著作的大量出版物,一个名为“德勒兹研究”的领域也以十分惊人的速度在发展,并且变得越来越体制化。2000年,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发行一套名为《德勒兹关联》(*Deleuze Connections*)的编辑文集丛书;2007年,该出版社又发行了一套名为《众高原:德勒兹研究中的新风向》(*Plateaus: New Directions in Deleuze Studies*)的系列专著作为补充。同年,该出版社与其创始编辑伊恩·布坎南一同发行了《德勒兹研究》杂志(*Deleuze Studies*),该杂志每年出版三期,专门聚焦德勒兹的哲学。第一届国际德勒兹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Deleuze Studies Conference)于2008年在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举办,并从此一年一度地横跨欧洲与美国举办会议。通常会议之前会有一个“德勒兹营”(a “Deleuze Camp”),它是一次教学尝试,汇聚经验丰富和初出茅庐的德勒兹学者,致力于学习更多关于德勒兹的思考。自2013年起,亚洲也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国际德勒兹研究会议,以此补足盎格鲁-美利坚的德勒兹研究计划。

如此繁多的积极行动营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此,大家都基于德勒兹进行学术的交流、学习和传播。然而,我们也需要警惕一种风险,那就是,当一位思想家遭受体制化时,他的思想自身也面临着危机;德勒兹必将第一个承认这一点。杜凌指出,无论被贴上特定的标签予以鉴别,还是被视作“一位‘理论’的供给者”,德勒兹都会为此而感到极其不适。<sup>8</sup>尽管如此,考夫曼注意到“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律令散布于德勒兹的读者之中:一种忠贞的驱动力,或者说,这近乎一种对叛离主人思想的拒斥,那些据传要紧随德勒兹之后写作的人,大多都落入了这个圈套”。<sup>9</sup>考夫曼同样表示,尽管这种“忠贞的驱动力”存在于众多杰出的思想家之中,但是,德勒兹的

著作却对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原因在于，他的著作如此清晰地反复思考着创造性参与的重要性——即从背后接近作者的重要性——这与紧跟德勒兹身后以表忠贞产生了近乎不可避免的矛盾，我们便不得不对其进行背离。只有在我们通读德勒兹的哲学时，积极参与其中，其意义才会更为彰显，这样的参与既不依靠注经，也不依赖将其著作运用于其他文本——考夫曼将这两者界定为参与德勒兹式思考最为常见的两种模式。<sup>10</sup>相反，最为有效的做法便是将德勒兹置于其自身之外来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倘若太过忠实于德勒兹，那便是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在背离德勒兹的哲学，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摆钟也会摇至其对立立面，即肆意拾起德勒兹的思想并对其任意发挥，美其名曰一种创造性，实则构成了另一种背离。这“再简单不过了”，正如杜凌所写，“对于众多评论者来说，依赖德勒兹式叠歌不过小菜一碟——理论就是一个工具箱，众多概念也不过一堆砖块——以此将他们对德勒兹随心所欲的处理合理化”。<sup>11</sup>其极端之处在于，这些做法鲜有参与德勒兹的著作，也不在乎其著作实际是如何发挥功效的。杜凌指出，其众多概念俨然成了一堆“时髦术语、客套话和样本”，正如它们将自己成功地，有时甚至是敷衍地，运用于各类事物之上，甚至到了成为“预先包装起来的广告语”的地步。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其外，诸如“块茎”“光滑空间”(smooth space)和“战争机器”(war marchine)这类概念都被滥用成了一种“流行哲学”(pop philosophy)。<sup>12</sup>回顾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和巴迪欧关于德勒兹的著作——两位都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且他们都以一种批判的眼光讨论了德勒兹的著作，考夫曼指出，这两位哲学家提出应抛弃德门弟子盲从式的背离，从而寻求另一种更有效的背离，<sup>13</sup>然而，他们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力求找到一种平衡。事实上，正如史

密斯所言,不论是巴迪欧还是齐泽克,他们都将自己的批判建立于一种“回避和替代的策略”之上,该策略有条不紊地避开了进入他们自己所提供的批判之核心。<sup>14</sup>这真不愧为一门艺术,它似乎的确是一门“引入奇途”(betraying well)的艺术。

在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对德勒兹毕生心血最富有成效的背离,二者均发现了其哲学的实用性。我在前文谈及,早期女性主义对德勒兹哲学如何持以怀疑态度。对于一场女性主义运动而言,力求一个女性主体的地位之独特性正是其运动的核心所在;然而,德勒兹式主张却是去超越这种克分子政治学(molar politics),这就不免带来了一些麻烦。但对第三波女性主义和偏离了认同政治学(identity politics)之准则的性欲(sexuality)及交叉点(intersectionality)理论而言,德勒兹的哲学具有更大的意义。于此,我们会发现一种参与的能动模式,这种模式显然不会仅仅局限于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之中,它向我们展示了应该如何继续“从背后”接近德勒兹,尽管我们可能需要为这种“基情”设想一种没有那么男权中心主义的象征。这种虔诚的不贞(faithful infidelity)抑或不诚的忠贞(faithless fidelity)可追溯至早期女性主义研究德勒兹时自相矛盾的态度。早期女性主义接触德勒兹时就认识到了不假思索采用其思想所带来的危险,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了这种风险孕育着多产性。譬如在《反复无常的身体:朝向一种肉体女性主义》(*Volatile Bodies: Towards a Corporeal Feminism*, 1994)中,格罗希就列举了一系列参与德勒兹思想的利与弊,从而得出结论:尽管“踩在危机四伏的地面上需要我们尤为谨慎”,但是,如果我们带着洞察力去使用他和瓜塔利的著作,也许还会将我们引向这些哲学家“无法抵达,甚至也许都不会接受”的地方。<sup>15</sup>同年,在《游牧主体: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具体化与性差异》

(*Nomadic Subjects: Embodiment and Sexual Difference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y*)一书中,即使布雷多缇接受了德勒兹的观点,但她依旧对德勒兹进行了批判,她认为,在德勒兹的思考中,存在着一种“真实而又积极的矛盾”,这种矛盾十分有用,即使“德勒兹可能会最先站出来表明:成为一个忠贞不渝的德勒兹主义者该有多难”。<sup>16</sup>诚然,自此以后,无论是格罗希还是布雷多缇,他们都继续在以创造性和实验性的方式运用德勒兹,还有更多人加入进来。

关于性的研究形成了一个与德勒兹相关的生动范例,它形成了一个领域,于其中,对德勒兹的使用已然超越了德勒兹自身。从一种德勒兹式视角来看,性的理论化是非常实用的,尽管他本人从未将其哲学中的这部分发展壮大。虽然解放欲望实际放大了它的多产性,友谊的政治学使得其动力学得到强调,这些我们在第三章也都曾提及,但是,我们同样也能看到,对德勒兹而言,协调非人格性和具体化之间的结合并非总是那么简单。涉及他对性存在(sexuality)的理解时,这个问题尤为凸显。他自己曾提及,在他的著作中,存在一种性存在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这种关系直到《感觉的逻辑》一书之前“都可以以文字的方式呈现”,但于此之后,其呈现却更“像一种站不住脚的抽象”。<sup>17</sup>尽管如此,德勒兹与瓜塔利一同理论化的非俄狄浦斯式欲望之性存在的暗示却比比皆是。如果说精神分析学中存在一种倾向,它加强了性存在的家庭化(domestication)和性别化(gendering),那么,这种欲望的概念则另辟蹊径,并对此展开了一种批判。德勒兹与瓜塔利坚持认为性存在不在二者之间,而在“一千种性的生产之中,这些性是众多不可控的生成”。<sup>18</sup>尽管说在这种性存在的敞开之中存在一种巨大的潜能,但德勒兹却并未探索这种潜能。然而,德勒兹与瓜塔利著作中



的这部分却为后继的学者拾起,并进一步发展。“抽象的性”作为理解性的一种方式,不仅超越了繁殖(reproduction)和排出(discharge)的范畴,它还作为一种自然化的实体超越了身体,性超越了人类,作为一种认识的方法,它认识到了人文主义范畴(humanistic categories)加诸我们理解之上的局限,此外,“生命之后的性”作为一种思考性的方式必定与对生命的理解密切相关,所有这些关于性存在的新理论之范例都受到了德勒兹著作的启示。

关于后/跨/无/非人(the post-, trans-, a- or inhuman)的话语组成了后德勒兹研究的另一范例,这类研究将德勒兹的著作扩展到了他未曾研究或不可能研究的领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学术研究中,有一部分一直站在一种立场上,那就是去发展他的著作,因为其著作的基础是科学、政治和理论的发展,但这类发展于其一生却未各就其位;尽管如此,这些学术研究大部分还展现出,德勒兹的著作是如何赐予我们能力去质问人的范畴,而又不囿于这些范畴的历史决定论(historical determination)。当前对于人的问题之讨论,建立于极为不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看到有必要重新思考人的边界,将其出现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迹一同思考;而另一方面,它首先又将人视作从未真正存在过的东西,至少在人文主义的意义上来是看是如此。后一观点在很大的程度上利用了一种德勒兹式哲学,就其提出的根据而言,它依赖于将生活理论化为一种超越人之范畴的力。这也可以说是“新物质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实例(该主义大致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得到发展,由布雷多缇与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等学者提出),它所抵制的是一种哲学史,这种哲学史大体依赖于一种存在的先验论与唯物论的范畴差异之上。于此,德勒兹对一系列思想家进行了复兴,其中包括斯宾诺莎、柏格森,顺便还提到了阿尔弗雷德·诺尔司·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对于那些感兴趣去思考一种具体化主体性(它的建构不是二元对立的)的项目而言,这种复兴能给予极大的帮助。<sup>19</sup>

德勒兹的另一重要遗产则出现于政治理论领域,如果对比我们前边所述,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么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实:德勒兹在政治上并不如他同时代的人那般旗帜鲜明,也不如他们那般激进。也正是在政治思考的领域之中,大多对德勒兹与其哲学方法运用的批判进入了一种后德勒兹语境。史密斯指出,有些人区分了“优异的”德勒兹(这部分属于德勒兹个人的著作)与“糟糕的”德勒兹(这部分著作是与瓜塔利合作的)。一个人“只能满怀遗憾”,齐泽克就有写道,“因为在盎格鲁-撒克逊对德勒兹的接受(还有德勒兹的政治影响)之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一个‘瓜塔利化’的德勒兹(a ‘guattarized’ Deleuze)。”<sup>20</sup>就齐泽克的例子而言,史密斯注意到,这种批判至少部分建立在齐泽克的一种对比方式之上,即德勒兹之优异在于他前期于《感觉的逻辑》中对拉康的阅读,而德勒兹的糟糕则出现在《反俄狄浦斯》之中。但无论是对齐泽克、巴迪欧还是德里达而言,德勒兹之优异与糟糕的区分始终存在,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瓜塔利以一种不良的方式将德勒兹引入了政治。<sup>21</sup>齐泽克表示,德勒兹对瓜塔利的吸引或许建立在一种需求之上,即需要为一个生产著作的前期位置获取一种不在场证明,抑或是“逍遥法外”,而这种作品终究不具有直接的政治性。<sup>22</sup>一旦齐泽克兴致高涨,他的批判也随之更为激烈,他最终开始质问起反全球化政治左派内部当前对德勒兹的使用,他认为,德勒兹的著作包含(尽管这不是他有意而为之)“一些特征,这些特征让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将其称作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家”。<sup>23</sup>除了齐泽克的批判以外,后德勒兹语境下其他严厉而为人熟知的批判还出自巴迪欧和

彼得·霍华德(Peter Hallward),他们认为德勒兹的著作对参与真实世界的政治活动而言是毫无价值。譬如,霍华德声称德勒兹的哲学“比乌托邦式消遣好不到哪儿去”,此外,尽管有众多“狂热者”为了政治目的参与德勒兹的思想,但是,这“实质上对世界的政治发展毫无意义”。<sup>24</sup>

但也有很多人指出,德勒兹对于这个世界的政治发展十分重要。哈特与奈格里为人熟知且多次被讨论的著作《帝国》(*Empire*),以三卷本的形式出版于新千年的头十年里,这套著作部分建立在德勒兹的研究之上。<sup>25</sup>其中一个核心元素便是德勒兹对社会发展的理论化,他将一个通过身份、制度和模态(moulds)来行使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的社会理论化为一个“控制社会”(society of control),于后者之中,权力更加依赖对众多行为和欲望的公开调控(modulations)。德勒兹如此建立的基础正是福柯关于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理论,但他对此也有所偏离和发展。<sup>26</sup>作为众多示例之一,这也论证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德勒兹式理论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福柯的《生命政治的诞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包含了他从1978年至1979年于法兰西学院所做的一系列相关主题的讲座,该书于2008年翻译成英文,随后便在线出版了德勒兹关于福柯的讲座课程,在谈论友谊的那一章中我们看到,德勒兹从1985年至1986年期间,每周都在巴黎第八大学授课。德勒兹关于福柯的讲座手稿于2013年完成。<sup>27</sup>换言之,从一种政治的角度来看,现今对德勒兹的运用十分活跃。

有些人一直感兴趣于寻觅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来理解和运作抵抗与激进主义,对于这类人而言,德勒兹所做出的努力也于此发挥了作用。对德勒兹而言,抵制决不能以其自身抵抗的东西为模子,而必须发明新的存在方式。我们在前面就已经看到,这可以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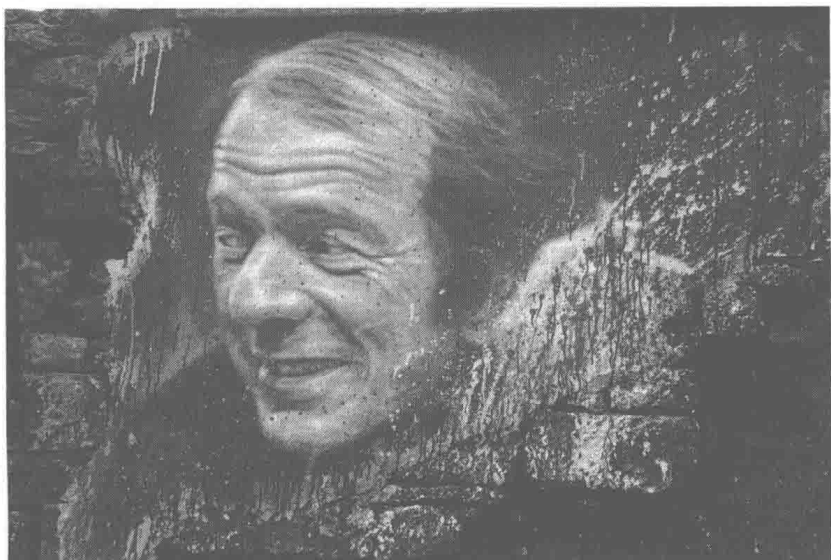
溯到一种尼采式方法,在这种方法所认可的范围内,反动力注定只能去否定或肯定现成的东西,故而,它强调能动力的重要性,因为它有能力去创造新的事物。正是因为德勒兹的研究全都围绕于对能动的执着,它使得一种特殊的思考方式得以运作,这种思考方式认为对能动的抵制不为任何它所抵制的规则所控制。因此,他不断被唤起,只为“从根本上找到另一种方式进行思考”,正如布雷多缇与瑞克·多尔芬(Rick Dolphijn)所言,只为成为当代语境中“正在走失的一个民族”,在该种语境下,预见“可行的蹊径”是非常困难的。<sup>28</sup> 马瑟罗·斯维斯基认为,德勒兹的研究提供了众多概念性工具以抵制一种“政治学的皇室科学”(royal science of politics),这种“科学”声称政治性努力为其支配性话语所拥有,并赋予我们创造性思考激进主义的能力。<sup>29</sup> 斯维斯基认为,受益于德勒兹式思考,我们才能腾出些空间给“激进主义的经历,这些经历完全拒绝与形式政治学(formal politics)的‘假设’保持一致”。<sup>30</sup> 我们可以在诸如维基解密和动物权利运动等组织企图在我们的思考与工作模式中制造断裂的方法中,发现激进主义者和形式政治学之间张力的动力学范例,在制造断裂的同时,这些组织也受到了被皇室科学挪用的威胁,该科学强迫它们与多数主义政治结构保持一致:“在德勒兹与瓜塔利之后,可以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政治激进主义的探索:没有一个意象,没有一种形式。”<sup>31</sup> 正如德勒兹与帕尔内所写:“为什么没人认为一种新型的革命就在生成可能性的途中呢?”<sup>32</sup>

然而,我们也能找到另外一些例子说明德勒兹式思想的实用性是如何被一些与他自己原初想法相悖的计划所使用的。在第三章中我们就注意到,他是如何参与并痛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我们也可因此进行一次有根有据的猜测,即他对如下事实

会有何种反应——以色列国防军 (Israeli Defense Forces, IDF) 为了他们的军事行动阅读过他和瓜塔利关于空间、界域性 (territoriality) 和块茎的理论, 并大受启发: “《千高原》中的数个概念,” 以色列前司令官西蒙·纳维赫 (Shimon Naveh) 描述道, “成了我们使用的工具……它们让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解释了当代的形势, 除此之外, 我们无从对其进行解释……我们试图生产出可操纵的空间, 同时让边界对我们毫无影响。”<sup>33</sup> 在讲座上, 纳维赫同样直接援引德勒兹与瓜塔利关于战争机器的研究: “这事关对敌人的解域, 通过从内部瓦解其界域以达成目的。”<sup>34</sup> 此处也引起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埃亚·威兹曼 (Eyal Weizman) 也曾试图钻研过这个问题——那就是, “当军事思想家使用这类理论‘工具’时, 有什么东西陷入了风险吗? 而这恰好是因为通过矛盾对立的批判形式, 对这类工具的频繁表达才显得如此清晰明了。”<sup>35</sup> 诚然, 墙的两侧都有人在使用德勒兹的理论, 研究德勒兹的学者们还在巴勒斯坦的拉马拉 (the Palestinian Ramallah) 国际艺术学院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Art) 进行了一系列讲座。

福柯常说这个世纪总有一天会成为德勒兹的纪元, 对于这条评价, 瓜塔利倒希望是真的, 其缘由不在于这种想法将会与德勒兹的思想紧紧相连, 而在于它使“包含某种理论活动的配置, 与各种各样的大学机构和权力机构面面对峙”。<sup>36</sup> 福柯所提及的世纪现在当然已经被我们抛诸身后了, 但是, 尽管我们对紧随其后到来的世纪不甚了解, 但关于大学和权力机构不定的本质的理论, 我们似乎还是有着强烈的需求; 尽管德勒兹的著作现在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 但这也并不妨碍它进一步成为一种实用的工具。德勒兹自己在评价福柯的观点时说自己并不清楚福柯这么说的意图, 但是, 他认为福柯可能只是在指出他与他们同辈其他哲学家尤为不同的





混沌之所(the Abode of Chaos)上的德勒兹涂鸦肖像,位于法国金山的圣罗曼(Saint-Roman-au-Mont-d'Or)。

一点。与其他大多数人不同,德勒兹说,

我处理事情的方法并不是通过结构或语言学抑或精神分析学,也不会通过科学或者甚至是通过历史的方法,因为我认为哲学有它自己的原材料,这种原材料让它能够进入与其他学科更为根本的外部联系之中。也许,这就是福柯的意思:我并不比其他人好到哪里去,但我却比他们更为天真,我生产出了一种原生艺术(art brut),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并不是最为深刻的那个人,但我是那个最为无邪的人。<sup>37</sup>

也许,在德勒兹的哲学之中有着某种无邪。他对于生命之创造力的执着似乎无法与愈加长鸣的警钟合拍,尤其是那些在新千

年中不断逼近的威胁,其中不乏气候变化、全球监控和愈演愈烈的宗教激进主义。然而,这些威胁以及我们面对它们时的无能为力滋生了与日俱增的无望感和愤世嫉俗,要挺过这困境我们或许还是需要一定的无邪。赖赫曼提醒我们,德勒兹强调我们需要一种信念,这种信念“超越了知识的保证,或是信仰的保障”——这将是一种真正的“对世界的信念”。其原因就在于,“去‘肯定生命’从来都不是去肯定一种关于生命的命题或是论题,恰好相反,而是去参与另一种非断言式的思考风格——去肯定就是减负(disburden)或‘减轻’(lighten),去获取其他可能性的‘无邪’。”<sup>38</sup> 如果存在一种我们今日急需的德勒兹遗产,那么它可能就是这种敏锐、博闻的无邪所蕴含的潜能,以及对其他可能性的一种执着。

## 参考文献

### 前言

- 1 Gilles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II*,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New York, 2007), p. 5.
- 2 Hannah Arendt, 'Heidegger at Eighty', in *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 Critical Essays*, ed. Michael Murray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1978), p. 303. 阿伦特的文章原刊于 1871 年的《纽约书评》。
- 3 Friedrich 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trans. Adrian Del Caro (Stanford, CA, 2014), p. 9.
- 4 Jacques Derrida 转引自 Benoît Peeters, *Derrida: A Biography*, trans. Andrew Brown (Cambridge, 2013), p. 2.
- 5 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in Barthes, *Image-Music-Text*, trans. and ed. Stephen Heath (London, 1977), p. 147. 同见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 in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ed. James D.

Faubion, trans. Robert Hurley et al. (New York, 1998).

- 6 Peter Osborne, 'Guattareuze?', *New Left Review*, 69 (2011), p. 139.
- 7 Gilles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ed. David Lapoujade (Paris, 2015), p. 52: "人们把你抹去了,还让我变得抽象了。"(On préfère vous gommer, et moi, m'abstractifier.)该合集中的信件尚未翻译成英文,故而本书所引皆出自本人之翻译。我也想借此鸣谢莎拉·布提耶(Sarah Bouttier)对我翻译的鼎力相助。为了在确保易懂性的同时让人一览德勒兹之语言特色,凡是出现直接引用的地方,我都将于参考文献中提供法语原文。另外一个说明德勒兹是如何知晓瓜塔利最终都处于其影响之下的例子可以于德勒兹与阿诺·维拉尼(Arnaud Villani)的通信中找到,他们两人往来通信持续了数年,彼时维拉尼正在写一本关于德勒兹的专著。这也表明了后者是如何持续且越来越不耐烦地坚持瓜塔利不应该被排除于他们俩合作著作的讨论之外。(见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pp. 82, 85, 86.)
- 8 Osborne, 'Guattareuze?', p. 141.
- 9 话虽如此,但在使用多斯所作传记之时,我也得小心翼翼。因为在多斯的传记中,原文和其英文翻译中都有数处错误被勘校出来。见 Alan D. Schrift, 'Intersecting Lives', *Symploke*, xx/1-2 (2012), pp. 3-4。尽管我的参考大部分源自英文翻译,但我都核对了法语原文。于此,我要向汉塔·佩尔森(Hanta Person)的慷慨相助致谢。凡是从翻译中直接引用的,我也都在相应的参考文献里提供了法语原文。
- 10 这第二个区别让我和多斯的传记处于一种相当窘迫的(如果有幸是有益的)对立之中。一方面,如众多评论家一样,我也



没能在多斯的研究中捕捉到批评性和反思性的深入。例如叶甫根尼·V.巴甫洛夫(Evgeni V. Pavlov)声称,“多斯明显并未深入研究可参考的丰富哲学材料,全书皆是如此,这似乎是他有意为之。”见 Evgeni V. Pavlov, ‘The Banality of Genius: When Deleuze Met Guattari’, *Parallax*, xviii/1 (2012), pp. 112 - 16。另见 Osborne, ‘Guattareuze?’。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多斯的著作是德勒兹研究领域的一份举足轻重且叹为观止的贡献,对于该类观点我也是同意的。例如托马斯·耐尔(Thomas Nail)就将其称作“一份不可或缺的资料”(Thomas Nail, ‘Review’, *Foucault Studies*, XIV [2012], pp. 218 - 22)。最后,我最为感激的是这本浩繁巨制中为一些人所称道的森罗万象,我之所以感激它是因为它让我得以挑出那些意义非凡的事件和故事,并让我可以将它们置于一种不同批判框架内。

- 11 一开始,我考虑了好几种组织这本传记的不同方法。第一个想法便是依照系列。德勒兹在《感觉的逻辑》(法语版: *Logique de sense*; 英语版: *The Logic of Sense*)一书中使用的正是这种方法,以此超越表象的问题。表象为所有事物内在的差异与多样性划清界限,其方法便是将这些差异与多样性划入相似和同一的模式之中;而系列则另辟蹊径,将它们都释放出来。它的运作主要是通过同时运转成对的系列(例如一系列的事件和一系列事物的状态),让它们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相关联,以此来扰乱同一性和表象最为明显的结构。第二个想法便是采用“高原”,正如德勒兹和瓜塔利在《千高原》中所实践的那样。一座高原便是一种汇聚的力量,它将异质的强度和观念从不同的语境中抽离以汇聚一处,从而建立暂时却

又不断变化的状态。这绝非跟随预先设定的路线和结构以关闭思考,恰恰相反,高原正是一种让可能隐藏的强度出现的方法。

- 12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neapolis, MN, 1986), p. 81.
- 13 同上, pp. 83 - 4.
- 14 Gilles Deleuze, *Negotiations*, trans. Martin Joughin (New York, 1995), p. 7.
- 15 Jacques Rancière, 'Is There a Deleuzian Aesthetics?', trans. Radmila Djordjevic, *Qui Parle*, XIV/2 (2004), p. 1.
- 16 Eleanor Kaufman, 'Betraying Well', *Criticism*, XLIV/4 (2004), pp. 651 - 9.

## 1 一个孩童

- 1 Gilles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 *L'Abécédaire de Gilles Deleuze*, dir. Pierre-André Boutang (Video Editions Montparnasse, 1988 - 9), 'E comme enfance'. Translated by Charles J. Stivale as *Gilles Deleuze from A to Z* (Cambridge and New York, 2012), 'E as in Enfance'.
- 2 Deleuze and Parnet, *Gilles Deleuze from A to Z*, 'E as in Enfance'. 本书翻译皆采用斯蒂瓦尔的译本。
- 3 François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Intersecting Lives*, trans. Deborah Glassman (New York, 2010), p. 88.
- 4 Anna Catherine Hickey-Moody, 'Deleuze's Childre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XLV/3 (2013), p. 272.

- 5 在生命的恒流里,某些实体要比另一些实体更加恒定。因此,假若一个人是一种克分子结构,我们对其的理解和反应都是将其视作一个统一体。克分子结构在互动中十分有益,因为它们能提供互动的工具。毫无疑问,当我们有能力谈及一个人、一种性别或一种国籍而无须总是解释那些使这类结构成问题的因素,克分子结构的确带来了极大的便捷。然而,它们同时也是极度可疑的除权的政治计谋。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umi)为克分子及其逻辑提供了有用的描述,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便立即可以看到其含混性:“只有进行强行分类(文化意义上的统一体)并且使其后续行为都符合该类别既定的规范,一个克分子化的个体方可成为一个‘人’。”Brian Masumi, *A User's Guide to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Deviations from Deleuze and Guattari*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1992), p. 55.换言之,克分子设立了边界,它在帮助建构生命的同时,也在阻挠生命。几波风格迥异的女性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第二波女性主义努力确立一种特殊种类的“女人”时,第三波女性主义看到,既然我们“随后的行动都要符合其所属类别的规约”,那么无视甚至罢黜其他存在模式的也是一种限制性的克分子结构。
- 6 Deleuze, in *Gilles Deleuze from A to Z*, ‘E as in Enfance’.
- 7 同上。
- 8 Daniel W. Smith, ‘Introduction, “A Life of Pure Immanence”’: Deleuze’s “Critique et Clinique” Project’, in Gilles Deleuze,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MN, 1997), p. xi.

- 9 Deleuze, in *Gilles Deleuze from A to Z*, ‘E as in Enfance’.
- 10 Michel Tournier, *The Wind Spirit: An Autobiography*,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London, 1989), pp. 127 – 8.
- 11 同上, p. 128.
- 12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pp. 90 – 92.
- 13 Daniel W. Smith, ‘Gilles Deleuze’, in *Poststructuralism and Critical Theory’s Second Generation*, ed. Alan D. Schrift (London and New York, 2014), p. 93.
- 14 Gilles Deleuze, *Negotiations*, trans. Martin Joughin (New York, 1995), p. 5.
- 15 Tournier, *The Wind Spirit*, p. 128.
- 16 Smith, ‘Gilles Deleuze’, p. 92.
- 17 Tournier, *The Wind Spirit*, p. 131.
- 18 Gilles Deleuze, *Desert Islands and Other Texts, 1953 – 1974*, ed. David Lapoujade, trans. Michael Taormina (New York, 2004), p. 77.
- 19 同上。
- 20 原文发表于 *Poésie* 期刊: ‘Description de la femme. Pour une philosophie d’autrui sexuée’, *Poésie*, XLV/28 (October-November 1945), pp. 28 – 39.
- 21 Christian Kerslake, *Deleuze and the Unconsciou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7), p. 1.
- 22 同上。
- 23 Joshua Ramey, *The Hermetic Deleuze: Philosophy and the Spiritual Ordeal* (Durham, NC, 2012), pp. 89 – 90.
- 24 其中部分文章现已可在 *Collapse* 杂志的一期特殊版中直接阅

- 览。 *Collapse-Collapse, III: Unknown Deleuze [+Speculative Realism]*, ed. Robin Mackay (2012).
- 25 Kerslake, *Deleuze and the Unconscious*, p. 125.
- 26 Ramey, *The Hermetic Deleuze*, p. 103.
- 27 Joshua Delpech-Ramey, ‘Deleuze, Guattari, and the “Politics of Sorcery”’, *SubStance*, XXXIX/1 (2010), p. 17.
- 28 Kerslake, *Deleuze and the Unconscious*, p. 70.
- 29 同上, pp. 9, 74; 德勒兹早期关于受虐狂的文章, 见 ‘De Sacher-Masoch au masochisme’, *Arguments*, 21 (1961).
- 30 Gilles Deleuze, *Cinema II: The Time-image*,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Robert Galeta (Minneapolis, MN, 1989), p. 98.
- 31 同上, pp. 98 - 9.
- 32 Gilles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II*,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New York, 2007), p. 65.
- 33 我于此处谈及的便是鲍德里亚的《忘记福柯》(“Forget Foucault”), 鲍德里亚将这篇文章呈递给了《批评》(*Critique*), 而该杂志的主编之一恰好有福柯。这篇文章极其犀利地批判了福柯在内的好几位心怀革命欲望的哲学家, 其中也包括了德勒兹。这篇文章随后以书的形式出版: Jean Baudrillard, *Forget Foucault*, trans. Nicole Dufresne, Phil Beitchman, Lee Hildreth and Mark Polizzotri (New York, 1987).
- 34 Friedrich Nietzsche,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and Ecce Homo*, ed. Walter Kaufman, trans. Walter Kaufman and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1989), pp. 57 - 8.
- 35 Deleuze and Parnet, *Dialogues II*, p. 78.



- 36 Friedrich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rans. Thomas Common (Raleigh, NC, 1999, ebook), 'I. The Three Metamorphoses'.

## 2 一名学徒

- 1 Gilles Deleuze, *Negotiations*, trans. Martin Joughin (New York, 1995), p. 6.
- 2 在法国,哲学高中教师招聘会考(Agrégation de philosophie)每年举办一次,通过该考试的人可获得在高中和高等院校里教授哲学课程的资格。人们通常在完成大学或精英学校的学业之后参加考试。
- 3 Giuseppe Bianco, *Après Bergson: Portrait de groupe avec philosophie* (Paris, 2015), p. 286.
- 4 同上, p. 228.
- 5 Deleuze, *Negotiations*, p. 5.
- 6 Gilles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II*,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New York, 2007), p. 13.
- 7 阿兰·D.史利福特,与作者电子邮件交流。
- 8 这些专著分别是 *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 (1962)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1983), *La Philosophie critique de Kant* (1963) (*The Critical Philosophy of Kant*, 1984), *Le Bergsonisme* (1966) (*Bergsonism*, 1988), *Spinoza et le problème de l'expression* (1968) (*Expressionism in Philosophy: Spinoza*, 1990), 随后还有 *Spinoza: Philosophie pratique* (1970, new edn 1981) (*Spinoza: Practical Philosophy*, 1988), *Foucault* (1986) (*Foucault*, 1988)与 *Le Pli: Leibniz*

- et le Baroque* (1988) (*The Fold: Leibniz and the Baroque*, 1993).
- 9 François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Intersecting Lives*, trans. Deborah Glassman (New York, 2010), p. 110.
  - 10 Alan D. Schrift, 'The Effects on the Agrégation de Philosophie o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Philosoph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XLVI/3, 2008, p. 467.
  - 11 对该书单功能的小书描述, 见 Schrift, 'The Effects on the *Agrégation de Philosophie*', pp. 449 - 73.
  - 12 Gilles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 *L'Abécédaire de Gilles Deleuze*, dir. Pierre-André Boutang (Video Editions Montparnasse, 1988 - 9), 'H comme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Translated by Charles J. Stivale as *Gilles Deleuze From A to Z* (Cambridge and New York, 2012), 'H as in History of Philosophy'.
  - 13 Daniel W. Smith, 'Gilles Deleuze', in *Poststructuralism and Critical Theory's Second Generation*, ed. Alan D. Schrift (London and New York, 2014), p. 91.
  - 14 同上, p. 93.
  - 15 Deleuze, *Negotiations*, p. 6.
  - 16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p. 109.
  - 17 Michel Serres, cited in Smith, 'Gilles Deleuze', p. 92.
  - 18 Deleuze, *Negotiations*, p. 122.
  - 19 Alan D. Schrift, 'French Nietzscheanism', in *Poststructuralism and Critical Theory's Second Generation*, p. 39.

- 20 Deleuze and Parnet, *Dialogues II*, p. 14.
- 21 Deleuze, *Negotiations*, p. 125.
- 22 同上, p. 84.
- 23 德勒兹将自己的博士论文于答辩前出版是因为博士论文答辩原计划于1968年秋天举行, 而因德勒兹的病情却不得不将其延后。对此我会在第五章再细说。
- 24 Bianco, *Après Bergson*, pp. 291 - 2. 这本书全面地描述了柏格森对德勒兹哲学的影响。
- 25 英文版(“Bergson’s Conception of Difference”)收录于 *Desert Islands and Other Texts*, 1953 - 1974, ed. David Lapoujade, trans. Michael Taormina (Paris, 2004).
- 26 Gilles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trans. Paul Patt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4), p. 330.
- 27 Deleuze, *Negotiations*, pp. 60 - 61.
- 28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p. 366.
- 29 Deleuze, *Negotiations*, p. 125.
- 30 同上, p. 138.
- 31 Deleuze and Parnet, *Dialogues II*, p. 10.
- 32 见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MN, 1997), p. 188 n. 1.
- 33 摘自 Deleuze and Parnet, *Dialogues II*, pp. 10, 109.
- 34 Félix Guattari, *The Anti-Oedipus Papers*, ed. Stéphane Nadaud, trans. Kéline Gotman (New York, 2006), p. 308. 其余谈及范妮影响的例子还包括: “我原则上不会写出这样的东西, 除非这是笔杆它自己的意愿, 一定要将此写到纸上。我只好让自己远离这种‘通过我的笔’(au flu de la plume)来写作

- 的模式,其原因就在于:我自以为自己记得,这就是恼怒范妮的那种表达模式”(第 354 页)。
- 35 Deleuze and Parnet, *Dialogues II*, p. 18.
- 36 Deleuze, *Negotiations*, p. 10.
- 37 瓜塔利写下一些关于范妮逝世的梦,这让他与德勒兹之间变得更加亲昵,还让瓜塔利有更多合适的机会来帮忙照看德勒兹的孩子们(第 322 页),并容许范妮将自己的写作视作无功(第 353 页)。“那么,这是不是必须的呢?”他扪心自问道,“我是不是必须从这些范妮之死的幻象中看到一种报复心理,鉴于我和吉尔的关系,这种心理又是否必然和一种同性恋选择相关?辅以理论便会让我承认:你想为了父亲-丈夫之爱去杀害母亲-妻子。但我压根不这么想!”(第 322 页)。他一度试图将她排除于其生活之外,但这似乎立刻又拉大了他和德勒兹之间的距离——“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写出德勒兹,而不是吉尔。不要再出现范妮了。神灵显现(epiphany)。欲望之空穴(A cavity of lack)”——但这也就那么两三行话,他最终不能不做出让步,把他们俩再拉回来:“我会继续将这些文本献给范妮,以及这链条尾端的吉尔”(第 400 页)。所有引用参考均出自 Guattari, *The Anti-Oedipus Papers*.
- 38 Deleuze and Parnet, *Dialogues II*, p. 35.
- 39 Schrift, ‘French Nietzscheanism’, pp. 24 - 5.
- 40 戴维·拉普雅德指出,一些额外的文本(例如写于 1953 年之前的文章和之前未出版或者是死后出版的文本)并未收集在内,这都是为了尊重德勒兹为出版所定的条件。见 David Lapoujade, ‘Introduction’, in Gilles Deleuze, *Desert Islands and Other Texts, 1953 - 1974*, ed. David Lapoujade, trans.

- Michael Taormina (New York, 2004).
- 41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pp. 116 – 17. “他回答了所有人的问题并且总是回答得非常妙”(Il avait réponse à tout et avec des renversements suprenants); François Dosse, *Gilles Deleuze et Félix Guattari: Biographie Croisée* (Paris, 2007), p. 145.
- 42 Alain Badiou, *Deleuze: The Clamor of Being*, trans. Louise Burchill (Minneapolis, MN, 2000), p. 1.
- 43 Michael Hardt, *Gilles Deleuze: An Apprenticeship in Philosophy* (Minneapolis, MN, 1993), pp. xx – xxi.
- 44 Véronique Bergen, ‘Deleuze and the Question of Ontology’, in *Gilles Deleuze: The Intensive Reduction*, ed. Constantin V. Bounda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9), pp. 7 – 22.<sup>①</sup>
- 46 ‘S’ils n’ont pas été mangés’ (if they have not been eaten by then). Gilles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ed. David Lapoujade (Paris, 2015), p. 34.
- 47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p. 177.
- 48 Deleuze in *L’Abécédaire*, ‘G as in Gauche’.
- 49 Charles J. Stivale, *Gilles Deleuze’s ABCs: The Folds of Friendship* (Baltimore, MD, 2008), p. 6.
- 50 ‘Mon orgueil en ressort cuisant’ (This is a serious blow to my pride).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p. 59.
- 51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p. 347.
- 52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erjam, ‘Translators’ Intro-

---

① 译者注:原书无第 45 条注释。



- duction', in Deleuze and Parnet, *Dialogues II*, pp. xi - xii.
- 53 Badiou, *Deleuze: The Clamor of Being*, p. 2.
- 54 关于这些冲突和事件的详细描述, 参见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pp. 347 - 50.
- 55 同上, p. 350.

### 3 一段友谊

- 1 Gilles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II*,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New York, 2007), p. 17.
- 2 Alain Badiou, *Deleuze: The Clamor of Being*, trans. Louise Burchill (Minneapolis, MN, 2000), p. 1. 关于德勒兹与巴迪欧之间政治分歧和矛盾的详细描述见 Giuseppe Bianco, *Après Bergson: Portrait de groupe avec philosophe* (Paris, 2015).
- 3 Gilles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ed. David Lapoujade (Paris, 2015), pp. 24 - 5, 我自己的翻译。
- 4 Charles J. Stivale, *Gilles Deleuze's ABCs: The Folds of Friendship* (Baltimore, MD, 2008), p. xiii.
- 5 同上。
- 6 Gilles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 *L'Abécédaire de Gilles Deleuze*, dir. Pierre-André Boutang (Video Editions Montparnasse, 1989 - 9), 'F comme fidélité'. Translated by Charles J. Stivale as *Gilles Deleuze from A to Z* (Cambridge and New York, 2012), 'F for Fidelity'.
- 7 Gilles Deleuze, *Proust and Signs: The Complete Text*, trans. Richard Howard (London and New York, 2008), pp. 60 - 61. 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 德勒兹找到了对这种友谊的批判, 这同

时也是一种对哲学的批判,因为它创造了与符号的遭际,同时超越了友好关系。通过普鲁斯特,他发现,建立于“与事物、词语还有观念之意义显性一致的好心好意”之上的友谊对哲学而言大有裨益,这就好像一位哲学家“在其自身预先设定了思想的善意,与此同时,他将对真理的自然之爱归结于思想,又将经由思想油然而生的明晰决心归结于真理”(第 20 页)。

- 8 Stivale, *Gilles Deleuze's ABCs*, p. 3. 德勒兹对于友谊的理解也受其终生好友莫里斯·德·冈蒂亚克的影响,斯蒂瓦尔对此有相关说明,第 12 页。
- 9 同上,pp. 1 - 2.
- 10 Gilles Deleuze, *The Fold: Leibniz and the Baroque*, trans. Tom Conley (Minneapolis, MN, 1993), p. 19.
- 11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trans. Graham Burchell and Hugh Tomlinson (London, 1994), p. 3.
- 12 ‘En fait, il y a seulement rhizome entre Félix et moi’ (There is only a rhizome between Felix and me).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p. 78.
- 13 同上,pp. 35 - 6.
- 14 同上,pp. 40 - 44.
- 15 ‘Pourquoi êtes-vous amené à donner un privilège apparent à l’expression du point de vue de l’agencement? Il faudrait que vous m’expliquiez avec patience’ (Could you explain to me with patience, Why you give apparent privilege to expression [over conten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assemblage?).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p. 55.
- 16 Gilles Deleuze, ‘Letter to Uno: How Félix and I Worked To-

- gether’, in Deleuze, *Two Regimes of Madness: Texts and Interviews*, 1975 – 1995, ed. David Lapoujade, trans. Ames Hodges and Mike Taormina (New York, 2007), pp. 238 – 9.
- 17 François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Intersecting Lives*, trans. Deborah Glassman (New York, 2010), p. 7.
- 18 ‘Vous êtes un prodigieux inventeur de concepts «sauvages»’ (You are a formidable inventor of raw concepts).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p. 56.
- 19 在 Dosse 的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第 8 页, Guattari: ‘Cette collaboration n’est pas le résultat d’une simple rencontre entre deux individus. Outre le concours de circonstances, c’est aussi tout un contexte politique qui nous y a conduits. Il s’est agi, à l’origine, moins de la mise en commun d’un savoir que de cumul de nos incertitudes, et même d’un certain désarroi devant la tournure qu’avaient prise les événements après Mai ’68.’ Deleuze: ‘Si nous avons essayé de dépasser cette dualité traditionnelle, c’est précisément parce que nous écrivions à deux. Aucun de nous n’était le fou, aucun le psychiatre, il fallait être deux pour dégager un processus... Le processus, c’est ce que nous appelons le flux.’ (François Dosse, *Gilles Deleuze et Félix Guattari: Biographie Croisée* [Paris, 2007], p. 19)。
- 20 Gilles Deleuze, ‘Letter to Uno on Language’, in Deleuze, *Two Regimes of Madness*, p. 201.
- 21 Deleuze, ‘Preface to the American Edition of *Dialogues II*’,

- in Deleuze, *Two Regimes of Madness*, p. 311.
- 22 Félix Guattari, *The Anti-Oedipus Papers*, ed. Stéphane Nadaud, trans. Kéline Gotman (New York, 2006), p. 399.
- 23 同上, p. 400.
- 24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p. 13.
- 25 Deleuze, ‘Letter to Uno: How Félix and I Worked Together’, p. 239.
- 26 Stivale, *Gilles Deleuze’s ABCs*, p. 10.
- 27 Deleuze, ‘Letter to Uno: How Félix and I Worked Together’, p. 240.
- 28 ‘Et là le centre serait pour moi la recherche d’une réponse toute claire et simple à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At the centre for me would be to search for a clear and simpl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philosophy?)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p. 55.
- 29 出自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p. 4. ‘D’avoir à vous recontrer quand cela vous sera possible constitue pour moi un événement déjà présent rétroactivement à partir de plusieurs origines’ (Dosse, *Biographie croisée*, p. 15).
- 30 ‘Moi aussi, sens que nous sommes amis avant de nous connaître’ (I too feel that we have become friends before having actually met).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p. 35.
- 31 分别见多斯的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第 6 页: (“他们之间从未变得亲昵”) 和第 16 页 (“他们所有的好友都意识到了这段友谊的炽热。‘我从未见过两个人像吉尔和菲利克

- 斯这般挚爱又珍重彼此”’。
- 32 这是一个很难翻译成英文的表达；大致可以等同于“*I embrace you strongly*”。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p. 54.
- 33 Guattari, 引自 Stéphane Nadaud, ‘*Love Story between an Orchid and a Wasp*’, 收录于 Guattari, *The Anti-Oedipus Papers*, p. 14.
- 34 引自 Stivale, *Gilles Deleuze's ABCs*, p. 132.
- 35 Guattari, *The Anti-Oedipus Papers*, p. 323.
- 36 Deleuze, *Negotiations*, p. 7.
- 37 同上。
- 38 Stivale, *Gilles Deleuze's ABCs*, p. 135.
- 39 ‘*Vos notes encore sont extrêmement belles et moi, je suis de plus en plus lent*’ (Your notes are extremely beautiful while I am slower than ever).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p. 46.
- 40 Deleuze, ‘*Letter to Uno: How Félix and I Worked Together*’, p. 237.
- 41 Deleuze and Parnet, *Dialogues II*, p. 16.
- 42 Gilles Deleuze, ‘*For Félix*’, in *Two Regimes of Madness*, p. 387.
- 43 Deleuze, *Negotiations*, p. 83.
- 44 同上。
- 45 John Marks, *Gilles Deleuze: Vitalism and Multiplicity* (London, 1998), pp. 108–9.
- 46 同上, 第 109 页。另见 Michel Foucault and Gilles Deleuze, ‘*Intellectuals and Power: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ichel Foucault and Gilles Deleuze*’, 再版于 Foucault, *Language*,



-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 Donald F. Bouchard (New York, 1977), pp. 205 - 17.
- 47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pp. 310 - 12.
- 48 Eleanor Kaufman, *The Delirium of Praise: Bataille, Blanchot, Deleuze, Foucault, Klossowski* (Baltimore, MD, 2001), p. 80.
- 49 考夫曼整本书的研究(*The Delirium of Praise*)致力于分析诸如此类的交流。其中,她还着重研究了乔治·巴塔耶、布朗肖和克罗索斯基。
- 50 Deleuze, *Negotiations*, p. 107.
- 51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p. 68.
- 52 ‘À la fois j’ai l’impression que vous me comprenez pleinement, et que en même temps vous me dépassez. C’est donc le rêve’ (I feel that you both fully understand me and surpass me. This is a dream).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p. 68.
- 53 Deleuze, *Negotiations*, p. 102.
- 54 引自 Stivale, *Gilles Deleuze’s ABCs*, p. 71.
- 55 Michel Foucault, ‘Theatrum Philosophicum’,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pp. 165 - 96.
- 56 Marks, *Gilles Deleuze*, p. 79.
- 57 Deleuze, *Negotiations*, p. 4.
- 58 Kaufman, *The Delirium of Praise*, p. 122.
- 59 Marks, *Gilles Deleuze*, p. 110.
- 60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p. 315.
- 61 ‘Tout est bien noir, et l’histoire du Liban m’a paru insupportable’ (Everything is dark, I find what is happening in Lebanon

- intolerable”).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p. 56.
- 62 这四篇<sup>①</sup>文章都再版于 Deleuze, *Two Regimes of Madness*.
- 63 Deleuze,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rafat’, in *Two Regimes of Madness*, pp. 242, 244.
- 64 “请不要如此荒谬”,在回应他之所以抵制新哲学家是否属于对他们攻击他和瓜塔利的回应时,他便如此回答。Deleuze, ‘On the New Philosophers (Plus a More General Problem)’, in *Two Regimes of Madness*, p. 139.
- 65 Gregory Flaxman, *Gilles Deleuze and the Fabulation of Philosophy* (Minneapolis, MN, 2012), pp. 249 – 50.
- 66 Deleuze, ‘On the New Philosophers’, p. 147.
- 67 同上, p.139.
- 68 ‘Ma petite force, c’est de n’avoir jamais répondu à rien ni participé à une polémique’ (My small strength is never to have answered or participated in any polemic).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p. 242.
- 69 Deleuze, ‘On the New Philosophers’, p. 140.
- 70 Flaxman, *Gilles Deleuze and the Fabulation of Philosophy*, p. 253.
- 71 在一次与多斯的访谈中,德勒兹的好友雅克·东泽洛(Jacques Donzelot)回忆德勒兹的原话如下:“雅克,你觉得米歇尔是不是彻底疯了,真理这个陈旧的概念会是什么?他正将我们带回到这个陈旧的概念之中,真言(veridiction)!哦,这不可能!”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p. 318.

---

① 译者注:作者实际只列出了三篇。

- 72 François Ewald, 'Editorial Foreword', in Gilles Deleuze, 'Desire and Pleasure', trans. Melissa McMahon (1997), [www.artdes.monash.edu.au/globe/delfou.html](http://www.artdes.monash.edu.au/globe/delfou.html) # 1, accessed 25 November 2016. Translation of Gilles Deleuze, 'Désir et plaisir', *Magazine littéraire*, 325 (October 1994), pp. 59 - 65.
- 73 Deleuze, 'Desire and Pleasure', in *Two Regimes*, p. 133.
- 74 Ewald, 'Editorial Foreword', n.p..
- 75 对德勒兹和福柯关于性欲概念更为深入的分析见 Frida Beckman, *Between Desire and Pleasure: A Deleuzian Theory of Sexuality* (Edinburgh, 2013).
- 76 Ewald, 'Editorial Foreword', n.p..
- 77 Dosse, *Biographie croisée*, p. 328.
- 78 Deleuze, *Negotiations*, p. 94.
- 79 Stivale, *Gilles Deleuze's ABCs*, p. 72.
- 80 Deleuze, *Negotiations*, pp. 85 - 6.
- 81 Deleuze and Parnet, *Dialogues II*, p. 11.
- 82 Gilles Deleuze, *Foucault*, trans. Seán Hand (London and New York, 2006), pp. 79 - 88.
- 83 Deleuze, *Negotiations*, p. 98.
- 84 Gilles Deleuze, 'May '68 Did Not Take Place', in *Two Regimes of Madness*, pp. 233 - 6.
- 85 Paul Patton, 'Introduction', *Deleuze and the Political* (London, 2000), p. 1. 然而,正如帕顿所编的《德勒兹与政治》合集所示,对德勒兹进行政治化解读的方法有很多。
- 86 Ian Buchanan and Nicholas Thoburn, 'Introduction: Deleuze and Politics', in *Deleuze and Politics*, ed. Paul Patton (Edin-

- burgh, 2008), pp. 3 – 4.
- 87 同上, p. 1.
- 88 Gregg Lambert, *Who's Afraid of Deleuze and Guattari?* (London and New York, 2006), p. 4.
- 89 Michel Foucault, 'Preface', in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R. Lane (Minneapolis, MN, 2005), p. xiv.
- 90 Stivale, *Gilles Deleuze's ABCs*, pp. xiv – xv.
- 91 Schrift, 引自其 2016 年 5 月与作者的往来邮件。
- 92 Stivale, *Gilles Deleuze's ABCs*, p. 92.
- 93 同上, p. 96.
- 94 同上, p. 84.
- 95 Kaufman, *The Delirium of Praise*, p. 7.
- 96 Derrida, 'I'm Going to Have to Wander All Alone', *The Work of Mourning*, ed.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as (Chicago, IL, 2001), p. 192.
- 97 同上, p. 193.
- 98 Stivale, *Gilles Deleuze's ABCs*, p. 81.
- 99 Derrida, 'I'm Going to Have to Wander All Alone', p. 192.
- 100 Deleuze and Parnet, *Dialogues II*, p. 6.
- 101 'Toutes ces bêtises' (all this stupidity).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p. 61.
- 102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R. Lane (Minneapolis, MN, 2005), p. 363.

- 103 Daniel W. Smith, “The Inverse Side of the Structure: Žižek on Deleuze on Lacan”, *Criticism*, XLIV/4 (2004), p. 648.
- 104 拉康对德勒兹的积极回应还包括德勒兹自己讲述的与拉康的遭际, 史密斯都有进行讨论, 参见 ‘The Inverse Side of the Structure’, p. 636.
- 105 对此的清晰概述, 请见 Eugene Holland, ‘Desire’, in *Gilles Deleuze: Key Concepts*, ed. Charles J. Stivale, 2nd edn (Durham, 2011), p. 56.
- 106 Deleuze and Guattari, *Anti-Oedipus*, p. 26.

#### 4 一次实践

- 1 Deleuze, cited in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Gilles Deleuze, *Cinema 1: The Movement-image*,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and New York, 1986), pp. xv – xvi.
- 2 François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Intersecting Lives*, trans. Deborah Glassman (New York, 2010), p. 90.
- 3 Gilles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II*,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New York, 2007), p. 74.
- 4 Gilles Deleuze, *Cinema 2: The Time-image*,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Robert Galeta (Minneapolis, MN, 1989), p. 280.
- 5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trans. Graham Burchell and Hugh Tomlinson (London, 1994), p. 164.
- 6 Gilles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ed. David Lapoujade



- (Paris, 2015), p. 65.
- 7 Gilles Deleuze, *Francis Bacon: The Logic of Sensation*, trans. Daniel W. Smith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p. 160 – 61.
  - 8 Alain Badiou and Barbara Cassin, ‘Preface to the French Edition’, in Deleuze, *Francis Bacon*, p. viii.
  - 9 见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p. 405.
  - 10 同上, p. 441.
  - 11 Gilles Deleuze, ‘Hot and Cool’, trans. Teal Eich, in *Desert Islands and Other Texts, 1953 – 1974*, ed. David Lapoujade, trans. Michael Taormina (New York, 2004), p. 247. 再版于德勒兹死后出版的早期文集, 原标题未变, ‘Hot and Cool’是德勒兹为弗罗芒热名为 *Fromanger, le peintre et le modele* (Paris, 1973)的展品目录所作。
  - 12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p. 441. ‘Alors, il ne s’agit pas de noircir la toile mais de la blancher...’ (So it’s not about blackening the canvas but about whitening it...) (François Dosse, *Gilles Deleuze et Félix Guattari: Biographie Croisée*, Paris, 2007), p. 520.
  - 13 Deleuze and 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p. 204.
  - 14 Deleuze, *Francis Bacon*, p. 160. 关于德勒兹对培根这本书和感觉概念的讨论, 参见 Jennifer Daryl Slack, ‘The Logic of Sensation’, in *Gilles Deleuze: Key Concepts*, ed. Charles J. Stivale (Durham, 2011).
  - 15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2), p. 38.
  - 16 Deleuze, *Cinema 2*, p. 25.

- 17 同上, p. xi.
- 18 Gilles Deleuze, *Negotiations*, trans. Martin Joughin (New York, 1995), pp. 38 - 9.
- 19 ‘C’est d’une grande médiocrité, il faut qu’on mêle.’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p. 55.
- 20 在1982年给阿诺·维拉尼的一封信中,德勒兹写道,他渴望写作,但是他却失算了,他未曾料到电影课程的授课竟让他更为焦虑,其工作量也远远超出了他的预计。(‘Mon rêve, ce serait d’écrire, mais de ne pas parler du tout. Je me suis flanqué cette année dans un cours sur le cinéma, tel que je pensais avoir une année sans peine, et il se révèle que jamais un cours ne m’a donné plus de souci et de préparation. J’ai raté mon calcul.’)同上。
- 21 对于文学作品的涉及同样大量出现在他和瓜塔利的合著之中。罗纳德·博格(Ronald Bogue)指出,他们的《千高原》提及了超过75位作家。参见 Ronald Bogue, *Deleuze on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 1.
- 22 Deleuze, *Negotiations*, p. 100.
- 23 同上, p.143.
- 24 Gilles Deleuze, *Masochism: Coldness and Cruelty*, trans. Jean McNeil (New York, 1991), pp. 13 - 14.
- 25 Gregg Lambert, ‘O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Literature for Life: Gilles Deleuze and the Literary Clinic’, *Postmodern Culture*, VIII/3, 1998), para. 1.
- 26 Gilles Deleuze,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MN, 1997),

- p. 141.
- 27 Gilles Deleuze, *Proust and Signs: The Complete Text*, trans. Richard Howard (London and New York, 2008), p. 59.
- 28 Deleuze and Parnet, *Dialogues II*, p. 74.
- 29 Deleuze,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p. 4.
- 30 Deleuze, *Negotiations*, p. 128.
- 31 Deleuze and Parnet, *Dialogues II*, p. 74.
- 32 Deleuze, *Negotiations*, p. 100.
- 33 Deleuze,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p. 4.
- 34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neapolis, MN, 1986), pp. 16–18.
- 35 同上, p. 26.
- 36 Ronald Bogue, *Deleuze on Music, Painting, and the Art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p. 2–3.
- 37 ‘Si l’on pouvait faire de la galopade et de la ritournelle deux complémentaires, cela m’arrangerait beaucoup’ (If we can make the gallop and the refrain work together, this would suit me very well).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pp. 24–5.
- 38 Deleuze and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rian Massumi (London and New York, 2004), p. 343.
- 39 Ian Buchanan, ‘Introduction’, in *Deleuze and Music*, ed. Ian Buchanan and Marcel Swiboda (Edinburgh, 2004), p. 16.
- 40 关于德勒兹对音乐的阐释与发展, 参见 Bogue 的 *Deleuze on Music, Painting, and the Arts*.

- 41 Deleuze, *Negotiations*, p. 137.
- 42 同上, p. 125.
- 43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p. 444.
- 44 Mark Bonta and John Protevi, *Deleuze and Geophilosophy* (Edinburgh, 2004), p. 12.
- 45 Alan D. Schrift,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Philosophy: Key Themes and Thinkers* (Malden, MA, and Oxford, 2006), pp. 75 - 8.
- 46 Gilles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 *L'Abécédaire de Gilles Deleuze*, dir. Pierre-André Boutang (Video Editions Montparnasse, 1988 - 9), 'M comme maladie'.
- 47 Deleuze, *Negotiations*, p. 137.
- 48 同上, p. 136.
- 49 François Cusset, *French Theory: How Foucault, Derrida, Deleuze, & Co. Transformed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nneapolis, MN, 2008), pp. 67 - 8. 库塞将与二十世纪六十年偶像歌手会面的场景描述得俏皮又生动, 我们不妨在这里一起来看看: “他们将他们带至金斯伯格在第十大街居住的公寓与之会面, 然后又去马萨诸塞州听了场音乐会, 在那里, 德勒兹与瓜塔利见到了鲍勃·迪伦与琼·贝兹——可惜的是, 后两位歌手从未翻过《反俄狄浦斯》, 而前两位哲学家又没有抽过大麻。”
- 50 同上, pp. 69 - 70.
- 51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p. 471.
- 52 Deleuze and Parnet, *Dialogues II*, pp. 36 - 7.
- 53 Cusset, *French Theory*, p. 282.

- 54 Alice Jardine, 'Woman in Limbo: Deleuze and his (Br)others', *SubStance*, XIII/3 - 4, issue 44 - 5; *Gilles Deleuze* (1984), p. 54. 这篇文章随后收录于贾丁的著作 *Gynesis: Configuration of Woman and Identity* (Ithaca, NY, 1986). 对德勒兹“生成-女人”的另一总结性评述, 见 Patti Sotirin, 'becoming-woman', in *Gilles Deleuze: Key Concepts*, ed. Charles J. Stivale, 2nd edn (Durham, NC, 2011).
- 55 Deleuze and Parnet, *Dialogues II*, p. 7.

## 5 一种生命

- 1 Gilles Deleuze, *Negotiations*, trans. Martin Joughin (New York, 1995), p. 143.
- 2 Laura Cull, 'Deleuze, Philosophical Diseases and the Thought of Illness', *Philosophy on Stage*, 3, n.p., <http://homepage.univie.ac.at/arno.boehler/php/?p=5360>, accessed 11 November 2016.
- 3 François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Intersecting Lives*, trans. Deborah Glassman (New York, 2010), p. 178.
- 4 Gilles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ed. David Lapoujade (Paris, 2015), p. 58.
- 5 “歌声转起, 冉冉进也, 抑或将息。这便是内在性平面上的景致之相: 多样性盈于其内, 独特性彼此相连, 过程或生成徐徐展开, 强度颧之颧之。”Deleuze, *Negotiations*, pp. 146 - 7.
- 6 Gilles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II*,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New York, 2007), p. 5.



- 7 见‘Active and Reactive’章节,收录于德勒兹的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trans. Hugh Tomlins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6)。同见 Kenneth Surin, ‘Force’, 收录于 *Gilles Deleuze: Key Concepts*, ed. Charles J. Stivale, 2nd edn (Durham, 2011)。
- 8 Gilles Deleuze,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trans. Hugh Tomlins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6), p. 3.
- 9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p. 52.
- 10 Gilles Deleuze, ‘Proust Round Table’, in Deleuze, *Two Regimes of Madness: Texts and Interviews, 1975 - 1995*, ed. David Lapoujade, trans. Ames Hodges and Mike Taormina (New York, 2007), p. 41.
- 11 见 Gilles Deleuze 的‘Nineteenth Series of Humor’,收录于德勒兹 *The Logic of Sense*, trans. Mark Lester with Charles Stivale, ed. Constantin V. Bounda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4), pp. 153 - 61.
- 12 Charles J. Stivale, *Gilles Deleuze's ABCs: The Folds of Friendship* (Baltimore, MD, 2008), p. 118.
- 13 同上, p. 122.
- 14 Deleuze and Parnet, *Dialogues II*, p. 5.
- 15 ‘C’est ce qui me dégoûte, théoriquement, pratiquement, toute espèce de plainte à l’égard de la vie, toute culture tragique’ (I am disgusted,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by any kind of complaint regarding life, by any tragic culture).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p. 78.
- 16 Deleuze and Parnet, *Dialogues II*, p. 6.
- 17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With a Prelude in*

- Rhymes and an Appendix of Songs*,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1974), section 382.
- 18 Deleuze in Gilles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 *Gilles Deleuze from A to Z*, trans Charles J. Stival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2012), ‘O as in Opera’.
- 19 Deleuze, *Negotiations*, p. 143.
- 20 Gilles Deleuze, ‘Literature and Life’, in Deleuze,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MN, 1997), pp. 3 - 4.
- 21 于此,我们需要再次唤起一个概念,那就是:生命仅仅是由各种各样的器官组成的。对德勒兹而言,经验的形成有赖于器官与非器官事件和印象之总和。所谓主体,并不是一个超越和先于其环境的实体,相反,它只是生命的全部表达所产生的一种临时且多变的效果,而这一切又无法全部以器官和人的传统概念来解释。同理,身体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它的出现是一种协力的效果,是器官与非器官实体间协力的效果,是与动物、植物、音乐或绘画的协力之效果。
- 22 Deleuze, *Negotiations*, p. 11.
- 23 Gilles Deleuze, *The Logic of Sense*, trans. Mark Lester and Charles Stivale, ed Constantin V. Bounda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4), pp. 4 - 5.
- 24 Deleuze and Parnet, *Dialogues II*, pp. 64 - 5.
- 25 同上, p. 65.
- 26 例子见 Deleuze and Parnet, *Dialogues II*, p. 12, 与 Deleuze and Guattari, *Anti-Oedipus*, p. 2.
- 27 在他们那本关于卡夫卡的著作中,德勒兹与瓜塔利同样也十

- 分明确地拒绝接受隐喻这个概念，他们反倒赞同变形 (metamorphosis) 的概念。正是注意到了卡夫卡是如何“蓄意地干掉了所有的隐喻”，他们认为这需要以恰当的意义来替换强度和解域。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neapolis, MN, 1986), p. 22.
- 28 Gilles Deleuze, *Pure Immanence: Essays on a Life*, trans. Anne Boyman (New York, 2001), pp. 28 - 9.
- 29 Deleuze, in *Gilles Deleuze from A to Z*, ‘M as in Malady’.
- 30 ‘Ma santé devient plus mauvaise, ou plutôt ce n’est pas de la maladie, c’est un état qui fait que j’ai de la peine à respirer, constamment; vous ne vous doutez pas à quel point ça change toute chose, y compris dans le travail’ (My health is getting worse, it is not an illness but a state which makes it constantly difficult for me to breathe: you can imagine how it changes everything, including work).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p. 87.
- 31 Deleuze, 引自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p. 497.
- 32 勒贝尔与弗吉尼·林纳尔 (Virginie Linhar) 的采访, 引自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p. 497.
- 33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pp. 497 - 8.
- 34 同上, p. 498.
- 35 Deleuze, in *Gilles Deleuze from A to Z*, ‘B as in Boire’.
- 36 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p. 351.
- 37 ‘Je poursuis la version définitive de *Qu’est-ce que la*

- philosophie ?* moins comme un oiseau inspiré que comme un âne qui se frappe lui-même’ (I’m working on the final version of *What is Philosophy ?* less like an inspired bird and more like a donkey striking itself).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p. 97.
- 38 Gilles Deleuze,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MN, 1997), p. 152.
- 39 同上。
- 40 同上, p. 155.
- 41 在与多斯的一次访谈中,诺艾尔·沙特莱回忆道,在德勒兹死前两周,她曾收到了其来信,信中写着,他一点都不想经历弗朗索瓦所经历过的一切。Doss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p. 497.
- 42 Gilles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trans. Paul Patt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4), pp. 322 - 3.
- 43 Deleuze, in *Gilles Deleuze from A to Z*, ‘R as in Resistance’.
- 44 ‘A Gilles Deleuze, l’inventeur, l’innocent, le rieur, le fugueur; l’adieu des philosophes’, *Libération*, 7 November 1995, n.p..
- 45 ‘Nous reprendrons la tâche.’ Jean-Luc Nancy, ‘De sens, dans tous les sens’, *Libération*, 7 November 1995, n.p..
- 46 ‘C’est ton chagrin idiot, dit-il.’ Jean-François Lyotard, ‘Il était la bibliothèque de Babel’, *Libération*, 7 November 1995, n.p..
- 47 ‘Ce n’est pas le petit plaisir d’être soi ... cette contemplation

- des réquisits propres qui produit la joie, la naïve confiance que ça va durer, sans laquelle on ne pourrait pas vivre, car le coeur s'arrêterait' (This is not the small pleasures of being oneself... a contemplation of existence that produces joy and the naive confidence that it will last and without which our hearts would stop). Giorgio Agamben, 'Sauf les hommes et les chiens', *Libération*, 7 November 1995, n.p.
- 48 'Trop à dire, oui, sur le temps qu'avec tant d'autres de ma «génération» il m'a été donné de partager avec Deleuze, sur la chance de penser grâce à lui, en pensant à lui' (So much to say about the time that was allotted to me, as to so many others of my 'generation', to share with Deleuze, so much to say about the chance to think, thanks to him, by thinking about him). Jacques Derrida, 'I'm Going to Have to Wander All Alone', *The Work of Mourning*, ed.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as (Chicago, IL, 2001), 192.
- 49 John Rajchman, 'Introduction', in Deleuze, *Pure Immanence*, p. 20.
- 50 Deleuze, *Pure Immanence*, p. 29.

## 结论

- 1 Gilles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II*,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New York, 2007), p. 5.
- 2 “将他留住就如同将他留于‘其自身’之内,制造一种‘意象上的停留’。”(De le retenir en tant que ‘lui-même’, de faire un ‘arrêt sur image’.) Jean-Luc Nancy, ‘Du sens, dans tous les



- sens', *Libération*, 7 November 1995, n.p..
- 3 同上。
  - 4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rian Massumi (London and New York, 2004), p. 13.
  - 5 'J'ai vu des cas de gens qui voulaient bien se faire le "disciple" de quelqu'un, et qui avaient certes autant de talent que le "maître", mais qui en sortaient stérilisés. C'est terrible. Travailler sur moi a deux inconvénients majeurs pour vous: ça ne vous aidera pas dans votre carrière universitaire, ce qui n'est peut-être pas l'essentiel, mais est quand même très important; et surtout vous avez à faire votre propre œuvre poétique et philosophique, qui ne peut pas supporter d'être contrainte par la mienne' (I have seen many people who wanted to become the disciple of someone, and who originally were as gifted as their masters but came out sterilized from this relationship. It is terrible. Working on me has two major drawbacks; it won't help you in your academic career, which may not be essential, but is very important nonetheless, but mostly you have to write your own philosophic and poetic oeuvre, and it cannot be constrained by mine). Gilles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ed. David Lapoujade (Paris, 2015), p. 80.
  - 6 Constantin V. Boundas, 'Introduction', in *Gilles Deleuze: The Intensive Reduction*, ed. Bounda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9), p. 1.
  - 7 Elie During, 'Blackboxing in Theory: Deleuze versus Deleuze',

- in *French Theory in America*, ed. Sylvère Lotringer and Sande Cohe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1), p. 165.
- 8 同上。
- 9 Eleanor Kaufman, ‘Betraying Well’, *Criticism*, XLVI/4 (2004), p. 651.
- 10 同上, p. 652.
- 11 During, ‘Blackboxing in Theory’, p. 170.
- 12 同上, pp. 166 – 167.
- 13 Kaufman, ‘Betraying Well’, p. 651.
- 14 Daniel W. Smith, ‘The Inverse Side of the Structure: Žižek on Deleuze on Lacan’, *Criticism*, XLVI/4 (2004), p. 637.
- 15 Elizabeth A. Grosz, *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 (Bloomington, in, 1994), p.180.
- 16 Rosi Braidotti, *Nomadic Subjects: Embodiment and Sexual Difference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y* (New York, 2013), p. 123.
- 17 ‘Un rapport énonçable’, *Deleuze,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p. 77.
- 18 Deleuze and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p. 307.
- 19 参见例如 Luciana Parisi, *Abstract Sex: Philosophy, Biotechnology and the Mutations of Desir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4), 与 Claire Colebrook, *Sex After Life: Essays on Extinction*, vol. II (Ann Arbor, MI, 2014).
- 20 Slavoj Žižek, *Organs Without Bodies: On Deleuze and Consequences* (London and New York, 2012), p. 18.
- 21 Smith, ‘The Inverse Side of the Structure’, p. 638.

- 22 Žižek, *Organs Without Bodies*, p. 18.
- 23 同上, p. 163.
- 24 Peter Hallward, *Out of this World: Deleuze and the Philosophy of Creation* (London, 2006), p. 162.
- 25 我于此处所指涉的便是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2000), *Multitude* (2004) and *Commonwealth* (2009).
- 26 对于福柯与德勒兹对生命政治的理解之间的关系, 参见 Paul Patton, ‘Activism, Philosophy and Actuality in Deleuze and Foucault’, *Deleuze Studies*, IV/10: *Deleuze and Political Activism*, ed. Marcelo Svirsky (2010), pp. 84 - 103.
- 27 见 Nicolae Morar, Thomas Nail and Daniel W. Smith, ‘Introduction’, in *Foucault Studies*, 17 (2014), pp. 4 - 10. 手稿和录音可在 [http://www2.univ-paris8.fr/deleuze/rubrique.php3?id\\_rubrique=21](http://www2.univ-paris8.fr/deleuze/rubrique.php3?id_rubrique=21) 上找到, 检索于2016年12月13日。
- 28 Rosi Braidotti and Rick Dolphijn, eds, *This Deleuzian Century: Art, Activism, Life* (Leiden, 2014), pp. 13, 34.
- 29 Marcelo Svirsky, ‘Introduction: Beyond the Royal Science of Politics’, in *Deleuze Studies*, IV/10: *Deleuze and Political Activism*, ed. Marcelo Svirsky (2010), p. 5.
- 30 同上, p. 3.
- 31 同上, p. 4.
- 32 Deleuze and Parnet, *Dialogues II*, p. 147.
- 33 引自 Eyal Weizman, *Hollow Land: Israel's Architecture of Occupation* (London, 2012), pp. 200 - 201.
- 34 Shimon Naveh, ‘Between the Striated and the Smooth: Asym-

metric Warfare, Operational Art, and Alterna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Counter Insurgency*, 瑞士国防大学 (Swedish Defence University) 会议 (丹·欧博格 [Dan Öberg] 组织), 斯德哥尔摩, 2007 年 11 月 5—6 日。在德勒兹与瓜塔利的原文中, 原话为: “通过从内部瓦解其领土, 从而对敌人完成解域” (*A Thousand Plateaus*, p. 390)。

35 Eyal Weizman, 'Walking through Walls: Soldier as Architects i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Radical Philosophy*, 136 (2006), p. 8.

36 引自 Dering, 'Blackboxing in Theory', p. 167。

37 Deleuze, *Negotiations*, p. 89.

38 John Rajchman, *The Deleuze Connections*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2000), p. 75.

## 参考书目

### 吉尔·德勒兹的文本

- ‘Description de la femme. Pour une philosophie d’autrui sexuée’,  
*Poésie*, XLV/28 (October–November 1945), pp. 28 – 39
- Empirisme et subjectivité* (1953)
- , *Empiricism and Subjectivity*, trans. Constantin Boundas (New York, 1991)
- 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 (1962)
- ,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trans. Hugh Tomlins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6)
- La Philosophie critique de Kant* (Paris, 1963)
- , *The Critical Philosophy of Kant*,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Minneapolis, MN, 1984)
- Proust et les signes* (Paris, 1964, 1970, 1976)
- , *Proust and Signs: The Complete Text*, trans. Richard Howard (London and New York, 2008)
- Le Bergsonisme* (Paris, 1966)



—, *Bergsonism*,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New York, 1988)

*Présentation de Sacher-Masoch* (Paris, 1967)

—, *Masochism: Coldness and Cruelty*, trans. Jean McNeil (New  
York, 1991)

*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Paris, 1968)

—,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trans. Paul Patt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4)

*Spinoza et le problème de l'expression* (Paris, 1968)

—, *Expressionism in Philosophy: Spinoza*, trans. Martin Joughin  
(New York, 1990)

*Logique du sens* (Paris, 1969)

—, *The Logic of Sense*, ed. Constantin V. Boundas, trans. Mark  
Lester with Charles Stival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4)

*Spinoza: Philosophie pratique* (Paris, 1970/1981)

—, *Spinoza: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ns. Robert Hurley  
(San Francisco, CA, 1988)

*Francis Bacon: Logique de la sensation* (Paris, 1981)

—, *Francis Bacon: The Logic of Sensation*, trans. Daniel  
W. Smith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Cinéma 1: L'Image-mouvement* (Paris, 1983)

—, *Cinema 1: The Movement-image*,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and New York, 1986)

—, *Cinema 1: The Movement-image*,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and New York, 2005)

*Cinéma 2: L'Image-temps* (Paris, 1985)

- , *Cinema 2: The Time-image*,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Robert Galeta (Minneapolis, MN, 1989)
- Foucault* (Paris, 1986)
- , *Foucault*, trans. Seán Hand (London and New York, 2006)
- Le Pli: Leibniz et le baroque* (Paris, 1988)
- , *The Fold: Leibniz and the Baroque*, trans. Tom Conley (Minneapolis, MN, 1993)
- Pourparlers* (Paris, 1990)
- , *Negotiations*, trans. Martin Joughin (New York, 1995)
- Critique et Clinique* (Paris, 1993)
- ,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MN, 1997)
- ‘L’Immanence; une vie’ (Paris, 1995)
- , ‘Immanence: A Life’, in *Two Regimes of Madness: Texts and Interviews, 1975–1995*, ed. David Lapoujade, trans. Ames Hodges and Mike Taormina (New York, 2007)
- Pure Immanence: Essays on a Life*, trans. Anne Boyman (New York, 2001)
- L’Île déserte et autres textes: Textes et entretiens, 1953–1974* (Paris, 2002)
- , *Desert Islands and Other Texts, 1953–1974*, ed. David Lapoujade, trans. Michael Taormina (New York, 2004)
- Deux régimes de fous: Textes et entretiens, 1975–1995* (Paris, 2003)
- , *Two Regimes of Madness: Texts and Interviews, 1975–1995*, ed. David Lapoujade, trans. Ames Hodges and Mike

Taormina (New York, 2007)

*Lettres et autres textes*, ed. David Lapoujade (Paris, 2015)

### 与菲利克斯·瓜塔利合作

*L'Anti-Œdipe* (Paris, 1972)

—,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R. Lane (Minneapolis, MN, 2005)

*Kafka: Pour une littérature mineure* (Paris, 1975)

—,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neapolis, MN, 1986)

*Mille plateaux* (Paris, 1980)

—,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rian Massumi (London and New York, 2004)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 (Paris, 1991)

—, *What is Philosophy ?*, trans. Graham Burchell and Hugh Tomlinson (London, 1994)

### 与克莱尔·帕尔内合作

*Dialogues* (Paris, 1977)

—, *Dialogues II*,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New York, 2007)

*L'Abécédaire de Gilles Deleuze*, directed by Pierre-André Boutang, Video Editions Montparnasse (1988 - 9)

—, *Gilles Deleuze from A to Z*, DVD, trans. Charles J. Stival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2011)

## 二手资料

- ‘A Gilles Deleuze, l’inventeur, l’innocent, le rieur, le fugueur: l’adieu des philosophes’, *Libération*, 7 November 1995, www.liberation.fr
- Agamben, Giorgio, ‘Sauf les homes et les chiens’, *Libération*, 7 November, www.liberation.fr
- Arendt, Hannah, ‘Heidegger at Eighty’, in *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 Critical Essays*, ed. Michael Murray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1978), pp. 293 – 303
- Badiou, Alain, *Deleuze: The Clamor of Being*, trans. Louise Burchill (Minneapolis, MN, 2000)
- , and Barbara Cassin, ‘Preface to the French Edition’, in Gilles Deleuze, *Francis Bacon: The Logic of Sensation*, trans. Daniel W. Smith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 vii
- Barthes, Roland,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in *Image-Music-Text*, trans. and ed. Stephen Heath (London, 1977), pp. 142 – 8
- Baudrillard, Jean, *Forget Foucault*, trans. Nicole Dufresne, Phil Beitchman, Lee Hildreth and Mark Polizzotri (New York, 1987)
- Beckman, Frida, *Between Desire and Pleasure: A Deleuzian Theory of Sexuality* (Edinburgh, 2013)
- Bergen, Véronique, ‘Deleuze and the Question of Ontology’, in *Gilles Deleuze: The Intensive Reduction*, ed. Constantin V. Bounda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9), pp. 7 – 22
- Bianco, Giuseppe, *Après Bergson: Portrait de groupe avec philosophe* (Paris, 2015)

- Bogue, Ronald, *Deleuze on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 , *Deleuze on Music, Painting, and the Art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 Boundas, Constantin V., ‘Introduction’, in *Gilles Deleuze: The Intensive Reduction*, ed. Constantin V. Bounda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9)
- Braidotti, Rosi, and Rick Dolphijn, eds, *This Deleuzian Century: Art, Activism, Life* (Leiden, 2014)
- , *Nomadic Subjects: Embodiment and Sexual Difference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y* (New York, 2013)
- Buchanan, Ian, and Marcel Swiboda, eds, *Deleuze and Music* (Edinburgh, 2004)
- , and Nicholas Thoburn, ‘Introduction: Deleuze and Politics’, in *Deleuze and Politics* (Edinburgh, 2008), pp. 1–12
- Colebrook, Claire, *Gilles Deleuz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2)
- , *Sex After Life: Essays on Extinction*, vol. II (Ann Arbor, MI, 2014)
- Collapse*, vol. III: *Unknown Deleuze [+ Speculative Realism]*, ed. Robin Mackay (2012)
- Conley, Tom, ‘Translator’s Foreword: A Plea for Leibniz’, in *The Fold: Leibniz and the Baroque* (Minneapolis, MN, 1993), pp. ix–xx
- Cull, Laura, ‘Deleuze, Philosophical Diseases and the Thought of Illness’, *Philosophy on Stage*, 3, <http://homepage.univie.ac.at/arno.boehler/php/?p=5360>, accessed 30 August 2016



- Cusset, François, *French Theory: How Foucault, Derrida, Deleuze, & Co. Transformed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ns. Jeff Ford with Josephine Berganza and Marlon Jones (Minneapolis, MN, 2008)
- Delpech-Ramey, Joshua, ‘Deleuze, Guattari, and the “Politics of Sorcery”’, *SubStance*, XXXIX/1, issue 121: *Spiritual Politics after Deleuze* (2010), pp. 8 – 23
- Derrida, Jacques, ‘I’m Going to Have to Wander All Alone’, in *The Work of Mourning*, ed.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as (Chicago, IL, 2001), pp. 189 – 95
- Dosse, François, *Gilles Deleuze et Félix Guattari: Biographie croisée* (Paris, 2007)
- ,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Intersecting Lives*, trans. Deborah Glassman (New York, 2010)
- During, Elie, ‘Blackboxing in Theory: Deleuze versus Deleuze’, *French Theory in America*, ed. Sylvère Lotringer and Sande Cohe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1)
- Ewald, François, ‘Editorial Foreword: Desire and Pleasure, Gilles Deleuze’, trans. Melissa McMahon, 1997 ([www.artdes.monash.edu.au/globe/delfou.html#1](http://www.artdes.monash.edu.au/globe/delfou.html#1), accessed 30 August 2016).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Désir et plaisir’, *Magazine littéraire*, 325 (October 1994), pp. 59 – 65
- Flaxman, Gregory, *Gilles Deleuze and the Fabulation of Philosophy* (Minneapolis, MN, 2012)
- Foucault, Michel,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 Donald F. Bouchard (New

York, 1977)

—, ‘What is an Author?’, in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 II: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ed. James D. Faubion, trans. Robert Hurley et al. (New York, 1998), pp. 205–22

Grosz, Elizabeth A., *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 (Bloomington, IN, 1994)

Guattari, Félix, *The Anti-Oedipus Papers*, ed. Stéphane Nadaud, trans. Kéline Gotman (New York, 2006)

Hallward, Peter, *Out of this World: Deleuze and the Philosophy of Creation* (London, 2006)

Hardt, Michael, *Gilles Deleuze: An Apprenticeship in Philosophy* (Minneapolis, MN, 1993)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2009)

—, *Empir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2000)

—,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2004)

Hickey-Moody, Anna Catherine, ‘Deleuze’s Childre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XLV/3 (2013), pp. 272–86

Holland, Eugene, ‘Desire’, in *Gilles Deleuze: Key Concepts*, ed. Charles J. Stivale (Durham, 2011), pp. 55–64

Jardine, Alice, *Gynesis: Configurations of Woman and Identity* (Ithaca, NY, 1986)

—, ‘Woman in Limbo: Deleuze and his (Br)others’, *SubStance*, XIII/3–4, issue 44–45: *Gilles Deleuze* (1984), pp. 46–60

- Kaufman, Eleanor, 'Betraying Well', *Criticism*, XLVI/4 (2004), pp. 651 - 9
- , *The Delirium of Praise: Bataille, Blanchot, Deleuze, Foucault, Klossowski* (Baltimore, MD, 2001)
- Kerslake, Christian, *Deleuze and the Unconsciou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7)
- Lambert, Gregg, 'O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Literature for Life: Gilles Deleuze and the Literary Clinic', *Postmodern Culture*, VIII/3 (1998), n.p.
- , *Who's Afraid of Deleuze and Guattari?* (London and New York, 2006)
- Lapoujade, David, 'Introduction', in Gilles Deleuze, *Desert Islands and Other Texts, 1953 - 1974*, ed. David Lapoujade, trans. Michael Taormina (New York, 2004), p. 7
- Liotard, Jean-François, 'Il était la bibliothèque de Babel', *Libération*, 7 November 1995, [www.liberation.fr](http://www.liberation.fr)
- Marks, John, *Gilles Deleuze: Vitalism and Multiplicity* (London, 1998)
- Massumi, Brian, *A User's Guide to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Deviations from Deleuze and Guattari*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1992)
- Morar, Nicolae, Thomas Nail and Daniel W. Smith, 'Introduction', *Foucault Studies*, 17 (2014), pp. 4 - 10
- Nail, Thomas, 'Review', *Foucault Studies*, XIV (2012), pp. 218 - 22
- Nancy, Jean-Luc, 'Du sens, dans tous les sens', *Libération*, 7

November 1995, [www.liberation.fr](http://www.liberation.fr)

Naveh, Shimon, 'Between the Striated and the Smooth: Asymmetric Warfare, Operational Art, and Alterna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Counter Insurgency*, conference at the Swedish Defense College (org. Dan Öberg), Stockholm, 5 - 6 November 2007

Nietzsche, Friedrich, *The Gay Science: With a Prelude in Rhymes and an Appendix of Songs*,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1974)

—, *The Gay Science*, trans.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1989)

—,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and Ecce Homo*, ed. and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1989)

—,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rans. Thomas Common (Raleigh, NC, 1999)

Osborne, Peter, 'Guattareze?', *New Left Review*, LXIV (2011), pp. 139 - 51

Parisi, Luciana, *Abstract Sex: Philosophy, Bio-Technology and the Mutations of Desir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4)

Patton, Paul, 'Activism, Philosophy and Actuality in Deleuze and Foucault', *Deleuze Studies*, IV/10: *Deleuze and Political Activism*, ed. Marcelo Svirsky (2010), pp. 84 - 103

—, ed., *Deleuze and the Political* (London, 2000), pp. 1 - 10

Pavlov, Evgeni V., 'The Banality of Genius: When Deleuze Met Guattari', *Parallax*, XVIII/1 (2012), pp. 112 - 16

Peeters, Benoît, *Derrida: A Biography*, trans. Andrew Brown

- (Cambridge, 2013)
- Rajchman, John, *The Deleuze Connections*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2000)
- , ‘Introduction’, in Gilles Deleuze, *Pure Immanence: Essays on a Life*, trans. Anne Boyman (New York, 2001), pp. 7–23
- Ramey, Joshua, *The Hermetic Deleuze: Philosophy and the Spiritual Ordeal* (Durham, NC, and London, 2012)
- Rancière, Jacques, ‘Is there a Deleuzian Aesthetics?’, trans. Radmila Djordjevic, *Qui Parle*, XIV/2 (2004), pp. 1–14
- Schrift, Alan D., ‘The Effects on the *Agrégation de Philosophie* o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Philosoph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XLVI/3, 2008, pp. 449–73
- , ‘French Nietzscheanism’, *Poststructuralism and Critical Theory’s Second Generation*, vol. VI of *The History of Continental Philosophy*, ed. Alan D. Schrift (London and New York, 2014), pp. 19–46
- , ‘Intersecting Lives’, *Symploke*, XX/1–2 (2012), pp. 341–4
- ,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Philosophy: Key Themes and Thinkers* (Malden, MA, and Oxford, 2006)
- Slack, Jennifer Daryl, ‘The Logic of Sensation’, in *Gilles Deleuze: Key Concepts*, ed. Charles J. Stivale, 2nd edn (Durham, NC, 2011), pp. 153–62
- Smith, Daniel W., ‘Gilles Deleuze’, in *Poststructuralism and Critical Theory’s Second Generation*, vol. VI of *The History of Continental Philosophy*, ed. Alan D. Schrift (London and New



- York, 2014), pp. 91 - 110
- , ‘Introduction: “A Life of Pure Immanence”: Deleuze’s “Critique et Clinique” Project’, in Gilles Deleuze,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MN, 1997), pp. xi - lvi
- , ‘The Inverse Side of the Structure; Žižek on Deleuze on Lacan’, *Criticism*, XLVI/4 (2004), pp. 635 - 50
- Sotirin, Patti, ‘Becoming-woman’, in *Gilles Deleuze: Key Concepts*, ed. Charles J. Stivale, 2nd edn (Durham, 2011), pp. 116 - 30
- , Stivale, Charles J., ed., *Gilles Deleuze: Key Concepts*, 2nd edn (Durham, 2011)
- , ed. *Gilles Deleuze’s ABCS: The Folds of Friendship* (Baltimore, MD, 2008)
- Surin, Kenneth, ‘Force’, in *Gilles Deleuze: Key Concepts*, ed. Charles J. Stivale, 2nd edn (Durham, 2011), pp. 21 - 32
- Svirsky, Marcelo, ‘Introduction: Beyond the Royal Science of Politics’, *Deleuze Studies*, IV/10: *Deleuze and Political Activism* (2010), pp. 1 - 6
- Tomlinson, Hugh, and Barbara Haberjam,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Dialogues II*,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New York, 2007), pp. xi - xiii
- Tournier, Michel, *The Wind Spirit: An Autobiography*,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London, 1989)
- Weizman, Eyal, *Hollow Land: Israel’s Architecture of*

Occupation (London, 2012)

—, ‘Walking through Walls: Soldier as Architects i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Radical Philosophy*, 136 (2006), pp. 8-22

Žižek, Slavoj, *Organs Without Bodies: On Deleuze and Consequences* (London and New York, 2012)

## 鸣 谢

开始这个写作计划的时候,我简直要疯了。当我接受这份邀请时,我就知道会是这样,整个写作的过程我都不断为这种感觉所萦绕。倘若没有这个领域中几位同事的倾力相助,我无法也不能完成这本书。查尔斯·J.斯蒂瓦尔一开始就不断给予我信心,与此同时,通过通读全文手稿的第一版,并给出反馈,他的确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查理——倘若没有你,我绝对不可能完成这本书。另外一个查理,查尔斯·布莱克,他也在不同阶段阅读了此书的一些部分,也从头到尾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查理——一如既往地感谢你。在中间部分,手稿的一位不知名读者也给予了非常有益的反馈。最后,在本书末尾,阿兰·D.史利福特不惜花时间与我进行交流,同时也阅读了最终手稿的一个版本,并提出了重要的评价和建议。阿兰——多亏了你,我最终才鼓起勇气按下“发送”键。就这本传记的主题,我也与我的好友和同事们进行了多次正式和私下的交流,其中包括了杰赛普·比安科、加利·格诺斯科、乔·休斯、格雷格·兰伯特和丹尼尔·W.史密斯。

我也希望向英语系的两位同事表示我衷心的感谢——莎拉·

布提耶与汉塔·佩尔松——感谢他们于翻译工作上所给予的协助,感谢他们弥补了我糟糕(pauvre)的法语——非常感谢(Merci beaucoup)! 裴妮拉·琼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助手——自始至终都是。最后,我还想感谢一下 Reaktion Books 系列丛书的本·海斯,正是他一开始邀请我来写这本书的。

多亏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文学作为领先研究域”的慷慨授权,我才得以获取此书收录图片的版权。